

中

华

神

秘

文

化

书

系

# 神秘的

刘筱红 著



从迷信  
中寻求  
答案



从生意  
中求  
财富



从字  
中求  
智慧



从  
神秘  
文化

广西人民出版社

# 神秘的五行

——五行说研究

刘筱红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欧薇薇

责任校对 陈红燕 韦洁琳

**神秘的五行**

—五行说研究

刘筱红 著

---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南宁铁路教育彩印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8 千字

版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219—02813—X/K · 339

定价 5.50 元

##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序言》

中华文化，不仅以其悠久、丰富称著于世，还因其浓郁的神秘性为中外瞩目。所谓神秘，内涵了神奇、隐秘之意。一切有神秘色彩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神秘文化。举凡三皇五帝、后妃妻妾、太监外戚、术士巫师、隐者仙人、善男信女、门帮会派、三教九流、三坟五典、秘籍禁书、异端邪说、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奇门遁甲、讖纬禁忌、怪习陋俗、相面测字、炼丹养生、占星堪舆、武术气功皆可包容之。

任何文化因其特质，都处于一定的坐标。中华神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那种以儒学为核心的雅文化，它可以称之为俗文化；相对于科举之类的官场文化，它可以称之为大众文化；相对于那些历代当权者倡导的主流文化，它可以称之为潜流文化；相对于与大工业联系的现代文化，它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相对于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它可以称之为本土文化。

在文化的殿堂中，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神秘文化那样引人入胜，勾人魂魄，诱人探寻，令人惊叹！梁武帝《游仙诗》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怎样“究”？怎样“测”？古今忙煞了多少文人墨客：有人从小以身许之，如《晋书·陈训传》记载（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有人成为通家硕儒，如唐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

国之说，皆所详悉。”

神秘文化是一座变幻奇特的库府，治学者从中窥见到智慧的闪光；执事者从中总结到御政的权谋；生意人从中获取到滚滚的财源；迷信者从中祈求到缚身的绳索。综观当代世风，中外忙碌于神秘文化者大有人也，不乏有益的成果。遗憾而可恨的是，喧闹声中混进了一些市井无赖之徒，他们不学无术，却编写了五花八门的油印小册子，宣传迷信，混淆视听，毒害民众，一饱私囊。小人作祟，君子焉处？一些饱学之士视神秘文化为“非学术”“贱文化”，甚至认为“狗肉不能上正席”，怕影响自己清高的声誉。任小人喧嚣尘上，君子我巍然不动。于是乎，神秘文化变得更玄乎了，更灰暗了，更不可理喻了，甚至日益堕入泥潭。

有鉴于此，我们开始了神秘文化的研究工作。

神秘的色彩最怕事实冲涤，迷信的积垢需要科学清扫。思想的雾霭不能靠利斧驱散，历史的现象需要从历史角度解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神秘文化，是光怪陆离的复杂共同体，是精华与糟粕交融的意识形态。它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有无孔不入的市场，有衰荣再生的能力。新中国建立以来，神秘文化一度受到荡涤，但它由地上转入地下，由泛滥暂处休歇。一旦开放的历史大潮奔腾向前，这股潜流就与海外及港台的民俗风气相呼应，乘机涌出，四处流布，传统的水质调入了现代的色彩，清浊难分。如果不考镜源流，不明辨是非，不正确引导群众，陈旧的风气和封建的习俗将重新在民间恢复，我们经过四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俗将被潜移默化、取而代之，这是相当危险的。为了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配合扫除六害，应当积极行动起来，研究神秘文化，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应当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

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民众服务，研究神秘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何况，神秘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高校的学者不研究，谁来研究？

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着手研究“神秘文化与当代中国”、“神秘文化与东方文明”这两大课题。适逢广西人民出版社欧薇薇同志约我们撰写《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一书，此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许多学者和工农群众来信给予好评和鼓励，希望能多出这样一些有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的书籍。为了不负众望，我们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由王玉德任主编，姚伟钧任副主编。丛书得到了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文史编辑室主任欧薇薇的具体帮助和组织。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术方法，配合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社会现实，发掘历史文献，认真研究神秘文化中的每一个问题，该批判的就批判，该继承的就继承。让渣滓永远沉淀，让腐朽化为神奇，让学术清浊分明，让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我们深感这只是我们研究神秘文化的一个开端，筚路蓝缕，任重道远。由于此项研究实属首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丛书中难免出现一些失误之处，祈望天下同仁、朋友理解我们，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共同努力！

王玉德

1990年10月于华中师大历史文献研究所

##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首批书目

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

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

神秘的占梦——梦文化散论

神秘的测字——滑入歧途的文字学

神秘的星象——冥冥天机的千古追求

神奇的武术——古代体育学觅踪

## 第二批书目

神秘的择吉——传统求吉心理及习俗研究

诡秘的权谋——传统权谋学评析

神秘的相术——中国古代体相法研究与批判

神秘的摄心术——催魂大法与心理控制研究

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探究

神秘文化典籍大观

## 第三批书目

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

神秘的八字——提示人生运动轨迹的尝试

神秘的占候——古代物候学研究

神秘的五行——阴阳五行学研究

神秘的术数——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

神秘的符箓咒语——民间自疗法研究

## 绪 论

呈献在您面前的是一本对五行进行系统述论的书。

关于五行，梁启超说：阴阳五行“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

顾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

庞朴说：“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

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透视，阴阳五行在这个文化体系中起着支撑和衔接的作用，是传统文化的骨架。对传统文化进行点的考察，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深入下去，便会触及阴阳五行这个问题。研究传统文化，不研究阴阳五行，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但是，奇怪的是，在文化研究热中，人们的心力和眼光却从五行头上滑过，落到阴阳、易学的头上。有关阴阳、易学的著作连连问世。相形之下，五行门前可以罗雀，至今为止，尚无一本全面论述五行的著作出台，即便论文也寥寥无几，五行成了一个受人冷落的灰姑娘。

五行文化受人冷落是有原因的，这个灰姑娘身上落了太多的历史尘垢。虽然它曾意气洋洋、登堂入室，在哲学的殿堂里与阴阳、气论相揖让，但它也曾居下流，不弃卑微，蹉跎在街头卖卜算卦人的地摊上。作为哲学命题，它是阳春白雪，深究它的人不多。作为俗文化，它是下里巴人，拥有广泛的市场。因而，在一般人心中，五行总是与神秘和迷信相联系。

正因为如此，在科学和理性觉醒的年代，五行便遭到了批判。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新思想洗礼的一代新型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清算，五行说作为一个讨论专题，引起了学人们的注意。古史辩派的主将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重头文章，对受五行说影响和支配的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作了清理和揭露，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专题的范围。范文澜先生在为顾颉刚喝彩时说，五行是一个“老妖物”，被顾颉刚等人“跳上去劈头揪住，顺手在路旁舀盆冰水，喳喳喳给她大洗特洗，大擦特擦，抬起腿，踢出三丈之外。呵，何等勇猛，何等爽利！”

重新评判旧文化，对蒙垢甚厚的五行说进行清洗，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但如果抬起腿，将之踢了出去，勇猛诚勇猛，爽利诚爽利，却不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当然，处于文化批判的时代，人们侧重于破除，来不及进行细致的分析处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城乡进行了破除迷信的科学教育，五行作为神秘术数的理论支柱，自然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批判。五行学说受其支流亚裔的牵连，被视为封建迷信，再也没人愿意问津了。

现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学术研究走上了

正轨，人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实事求是地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这笔遗产。洗去五行这个灰姑娘身上的污垢，让她重现光彩的时候到了。

## 二

五行是什么？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它起源于原始的宗教崇拜，又从宗教母体中脱胎而出，进入哲学思维的境界，发展成为五行哲学。

五行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物质构成。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五行相生相克，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构成了变化不居、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五行哲学构筑了宇宙生成图式，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性，但又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是一个循环流转、周而复始的过程。五行哲学对宇宙的认识，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传统哲学中居有重要地位。

五行文化是在五行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五行哲学为中心，向文化的各个领域和阶层延伸和系联，便构成了五行文化的大系统。用五行哲学指导政治，便有了天子明堂说、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等政治理论体系；用五行哲学来认识历史，便产生了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五行哲学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在中医、气象预测等方面，结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五行哲学对中国文化民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神秘术数中，五行哲学被借用为理论支柱，并根据术数需要加以改造和繁衍，从而使五行名声狼藉。总之，五行文化包罗甚广，鱼龙交杂，精华糟粕并居，对传统的中国

人影响至深，对它进行甄别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三

本书对五行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关于五行的起源，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去寻追，五行起源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原始人崇拜自然百神，随着偶像崇拜的出现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木、火、土、金、水便从百神中凸现出来，五行在人们心目中的突出地位，是由于它们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五行观念的发展，经过了商代对五方的空间方位的认同，到周代整合为五行、五方、四时、五帝、五佐神的系统模式。受五行观念影响建立起来的明堂制度，是将宗教中的五行引入政治领域，将人间政治与自然属性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哲学最初是在宗教意识形式中萌生。至殷商末年，五行观念便开始向哲学的高度升华。殷末贵族箕子叙说的《尚书·洪范》篇，将五行作为九条治国大法中的第一条，向武王陈叙，其中包含了朴素的哲学观点。因此，《洪范》篇便成为五行进入哲学思维阶段的标志。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哲学命题，指出了五行是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涉及了世界物质构成问题。

阴阳是在五行之外发展起来的另一幅宇宙构成图式，从春秋年间开始，阴阳与五行这两个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便开始接近和融合，这个融合过程至秦汉时完成。合流后的阴阳五行认为，阴阳二气化生五行，五行构成世界万物。

五行哲学除了回答了世界物质构成问题以外，它还提供

了物质运动的轨迹和模式，这便是五行生克说。五行生克说产生于春秋年间，成熟于战国中后期，它肯定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属性，但又把这种运动变化看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五行生克说的基础上，五行哲学又演绎出一系列较为驳杂的原理，如五行的制化抑扶、五行的生数成数、五行与天干、四时、五方、五色的配合、五行寄生十二宫等，这些原理后来都被五行术数所借用。

成熟后的五行哲学受到历代思想家们的重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将五行哲学导向神学，认为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宋代朱熹等理学大家则把五行哲学纳入理学的范畴，把五行看作是从属于理、体现着理的物质实体。明清时进步的思想家王夫之等人则对哲学上已走向唯心主义的五行观进行了清算，恢复了五行的本来面目。

作为政治哲学，五行在“天人感应”说中充当了“上天”使者的角色，人间的政治如不合“天意”，便通过五行灾异变化显示出天的谴责。五行政治还认为，人君的行政，必须符合五行四季的特性，将人间政治与自然规律相配合，使之具有客观的依据。五行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中，五刑比附于五行，于是五刑便蒙上了符合天道的外衣。政治思想家们还赋予五行以道德属性，五行与“仁、义、礼、智、信”五伦的配合，给封建的道德观念找到了神圣和天然的依托。在五行哲学指导下的五行政治，一方面通过天意对人间君主有所约束，另方面又为封建统治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作为历史哲学，五行生克说演变为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的改朝换代是按五行生胜的秩序循环流转，人间每一朝代的统治者一定要居五行中一行的德运，并为上天

显示符应予以提示和认可，当其所居德运衰落，便由胜克其德或由其德生化的另一行的德运居有者起而代之。社会历史由天命支配，依五行生胜次序周而复始运行。五德终始说由战国思想家邹衍创立，秦始皇首先付诸于实践，从此以后，历代的帝王或以相生或以相克来推衍五德，确定自己的德运，表明自己顺应天命、承受大统的神圣性。直到元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变更，五德终始说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逐渐冷落下来。

五行哲学中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用于预测气象变化的运气学说，便是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应用五行思想来说明天象气候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以及在变异中保持稳定性的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还是中国医学的理论支柱，中医运用五行原理进行病理辨证和药学辨证，在世界医学界独树一帜。此外，五行学说用于养生学、地理学以及原始化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记载了大量天灾人祸和怪异现象，是我们探究自然奥秘的重要资料。

起源于原始宗教的五行学说，虽然已进入哲学的殿堂，却始终难以摆脱神秘性的阴影。上层统治阶级赋予它以天意的代表，下层的神秘术数也借它以高其术，因此，在各种术数中，五行都以通神通灵的面目出现。要整理、研究、批判神秘文化，一个首要的任务，便是要对五行学说及其原理有全面的了解。

本书是全面系统研究五行文化的初步尝试，希望它是一枝报春的红杏，引起学者和读者们对五行文化的关注，推出更多有关五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待到山花烂漫时”，本书虽被淹没，也会在丛中含笑。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五行的起源.....	(1)
一、五行的源头——原始自然崇拜.....	(1)
二、五行的演化——与五方的认同.....	(5)
三、五行的整合——五行体系的形成 .....	(11)
四、天子坐明堂——五行与明堂之制 .....	(17)
第二章 五行的哲学轨迹 .....	(22)
一、《洪范》中的五行哲学.....	(22)
二、五行杂以成百物 .....	(25)
三、阴阳与五行的合流 .....	(27)
四、五行生克说的产生 .....	(29)
五、五行的对应系统 .....	(32)
六、辨五行以观天道 .....	(35)
七、五行相资以为用 .....	(37)
第三章 五行原理 .....	(40)
一、五行的生克制化抑扶 .....	(40)
二、五行的生数成数 .....	(44)
三、五行与天干地支 .....	(46)
四、五行与四时五方五色 .....	(51)
五、五行寄生十二宫 .....	(53)
六、天干地支的刑冲害化合 .....	(55)

七、纳音五行 .....	(58)
<b>第四章 五行与政治</b> .....	(66)
一、五行与灾异 .....	(66)
二、政治法律文化中的五行 .....	(71)
三、思孟五行说 .....	(75)
<b>第五章 五德终始说</b> .....	(78)
一、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	(78)
二、秦汉皇帝对德运的追寻 .....	(83)
三、魏晋南北朝逼禅的借口 .....	(93)
四、隋之后的春兰秋菊 .....	(116)
<b>第六章 出神人化说五行</b> .....	(129)
一、五行与五运六气 .....	(129)
二、五行与食物养生学 .....	(137)
三、五行与中国医学 .....	(140)
四、五行与炼丹术 .....	(148)
五、五行与古代地理学 .....	(149)
六、《五行志》与自然的奥秘 .....	(152)
<b>第七章 通神通灵五行术</b> .....	(159)
一、五行与占星术 .....	(159)
二、五行与相术 .....	(165)
三、五行与风水术 .....	(173)
四、五行与测字 .....	(181)
五、五行与择吉 .....	(187)
六、五行与算命术 .....	(194)
七、五行与战争术数 .....	(199)

# 第一章 五行的起源

遥望蓬莱，

一半儿云遮，

一半儿烟霾。

——元·张养浩

## 一、五行的源头——原始自然崇拜

五行文化是如此古老，回头遥望她的来处，只见一片云烟渺渺。

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骨架，追寻五行文化的源头，又是一个破谜探奥的富有魅力的课题，它吸引了近代以来许多文化哲人的心力和目光。

于是乎，关于五行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或曰五行起源于先民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或曰五行产生于伟大的治水斗争；或曰五行源于商代的四方观念；或曰五行起于商人的龟卜，或曰五行起源于古代占星术……人们在书山学海中辛苦跋涉，去寻找那个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五行源头。虽然这些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顺五行之流而上，在向五行的始源一步步地逼近，只是前进到某一阶段便错把流误认为源了。

追寻五行的起源，其源头在人类童年的智慧泉中。童蒙

中的先民认识周围世界，其思维方式是近取诸身，推己及物，将自己与自然界万物混同，以为所有的认知对象都和自己一样具有情感和灵性。然而，在经历了自然的风刀霜剑、突发灾异的历练以后，先民们感到自然界中某些物质具有人或其它物所不能有的神秘力量，于是便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

我国古代文献透漏了人类的童年虔敬自然神祉的消息。《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而天、地、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山林川谷丘陵皆属百神之数。《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腊之祭，“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崇饷之……曰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秦皇汉武以前，天子祭祀天地山川百神的仪式，都可称为封禅，《史记·封禅书》称，其仪式“旷远者千有余载”。始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的上泰山封禅，正是从古代祭祀天地名山大川百神的典礼发展而来，追其源始，则是原始人对自然物的崇拜。

当然，先民最初对百神（包括土、木、火、水）的尊崇礼拜，都还附着于具体的物体上，他们生活活动区内的某一棵树、某一块石头、某一块土地、某一条河流，都可能成为他们崇拜的具体对象。土、木、火、水的具体物象与其它百神并列，并没有特别组合归纳在一起，也不具有特殊的地位。

土、木、火、水的地位从百神中凸现，实赖于两种因素。其一是偶像崇拜（或称祖先崇拜）的出现和抽象思维的发展。随着先民智慧的提高，以自然物作为自己图腾的意识逐渐升华为“人——图腾”合一为神的观念，现实人中功勋卓著的领袖，以及被人们口口相传的先人，被看作是具有某种图腾的神秘力量而被神化，成为取代这一自然神的超人。于是，土、木、火、水便相继有了自己的人格代表。由自然崇拜进入偶

像崇拜阶段，一位偶像可能成为某一类物质的总代表，它促进了人类抽象物质分类概念的思维发展，原来万物百神逐渐归纳为几个大的部类，于是，土、木、火、水的类概念便从具体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中抽绎出来了。

其次是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原始农业的进步，土、木、火、水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使它们在先民心中占据了愈来愈大的比重。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土地乃是先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它孕育万物，也养育了人类。先民们将土地视为母亲，立“社”以礼敬之。然而，地可观者，莫过于木，木是一切植物树木的总称，是土地生长万物的标志，故先民立“社”，必在社土之上树木作为标识。鲁哀公曾就“社”的问题询问孔子弟子宰我，宰我回答说：“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也就是说，凡建邦立社，必在社土上栽种其土所宜的树木，这种社树便是“社”主，也即社主，因此，木便具有了神圣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先民崇尚木是出于宗教原因，然其实质是木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木耒、木耜是原始农业中的重要工具，树果树叶又是先民重要的衣食之源。

火的使用，在先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又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刀耕火种和熟食都离不开火。然而火若震怒，山火燎燃，转眼之间，将一切化为灰烬，又令先民敬畏，于是将火作为神来礼拜。水可滋润万物，生长百谷。然洪水泛滥，又将一切席卷而空，因而水神受到先民的祭祀。

由于土、木、火、水与人们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逐渐从百神中脱颖而出，成为先民崇拜的主要对象。在商代甲骨卜辞中，记载了埋、沉、燎、卯四种祭祀方法，分别

用以向土、水、火、木诸神敬献牺牲。这四种祭法流传后世，各有遗存。如《礼记·祭法》中云：“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犍”，便是将牛马埋入土中祭土地。秦始皇南巡，沉王璧于长江，汉代武帝至黄河瓠子决口，沉白马玉璧，均是礼祭水神。殷人燎烧女巫以祓旱情，是敬火神。卯，原是将牲畜挂在削尖的树枝上，以祭木神，至今乡民将红布条挂在树枝上来礼拜树神，乃是卯祭的变种。这四种祭法反映了先民礼敬土、水、火、木诸神的习俗。

人们对金的崇拜晚于前四类。考古成果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便开始人工冶铜，大汶口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至商朝，中国的青铜器生产便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金属的出现，引起人类生活的巨大变革，映照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因而倍受人们的珍视。最初的铜器主要是用作箭簇和礼器，在国家大事唯祀与戎的上古，被高置于祭台之上的青铜器，其神圣意义自不言而喻。

对土、木、火、水、金以及气的崇拜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作为与人类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自然物，它们几乎是各个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在印第安主要部族间，能够找到崇拜地、水、火、风的踪迹。”而古代印度文明则将地、水、火、风视为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古希腊的哲学家恩培多克提出了万物的本源是水、火、土、气四元素。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世界想象为诞生于一团混沌的洪水之中。而印度古籍《梨俱吠陀》中，天神往往是树木、森林的化身。同时，它还声称金属乃“孕育宇宙的金胎”。在世界古老文明中，都曾经历过对地、水、火、气（或风）的崇拜阶段，对木和金也有过不同程度的礼敬，它们都起源于人类初级阶段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从自然崇拜到偶

像崇拜，从万物有灵到物质归类抽象，形成土、水、火、气以及木、金等主神祭祀，孕育着人类认识宇宙构成的哲学幼芽。世界各民族对这些自然物的共同推崇，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共性特征。

当然，由于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对自然物的崇拜又各具本民族的个性特征。古希腊人对水特别崇拜，被西方称为科学之父的泰利士，提出水为万物的始基，这与他们置身于地中海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五行将木提高到印度、希腊所没有的高度，反映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对树木植物的偏爱。

## 二、五行的演化——与五方的认同

五行排列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体系提出来，是在商代。商人将五行与五方的空间方位相认同，使纯客观的空间方位具有了价值范畴和相对固定的原型意义。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跨入文明社会门槛已久的殷人，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偶像崇拜的遗俗。他们既事奉自己的社神，又贞于四方之帝。四方之帝对殷人如此重要，是因为殷人是一个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并屡事迁徙的民族。迁徙的方向是否贞吉，是需要询问主管这个方向的神灵。在殷人看来，空间方位是一个实而虚，虚而实，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神秘“东西”，它一定各自有一位大神来主持，这些大神有何特性呢？殷人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将之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

东方最明显的特征是它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汤谷的地方，生长着一株扶

桑树，又称若木。十个太阳都居住在这棵树上，一个太阳出行返回后，另一个太阳方才出发，因而这棵树便具有不死与再生的神秘力量：太阳是从东到西运行不定的，而太阳栖息的若木却是固定在东方，故若木不仅成为东方的象征，而且还被殷人尊为主管东方的大神。太阳落于西方，是衰亡的象征，西风起时，万木萧杀，将之与金的刑杀特征相联系，于是金便做了殷人主管西方的大神。

四方迁徙的殷人发现，越往南走，气候便越炎热，因而他们猜想居住在极南方的一定是一位火神。而北方气候寒冷，冰天雪地，冰雪还原成为水，因而殷人便认为主管北方的大神是水神。

何以证明殷人已将东南西北与木火金水相配呢？请看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土的殷武丁时的两片甲骨：

其一：东方曰析，风曰叠。

南方曰炎，风曰光。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戩。

其二：贞帝于北方曰元，风曰戩。

贞帝于南方曰光，风曰。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叠。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曰夷。

这是殷人祭祀四方之神与四方之风的甲骨，其中某方曰某是方的神名，风与风通，是四方神——帝——的使者。

将甲骨卜辞证之于古代文献，在《尚书·尧典》和《山

《海经》中也有大致相同的名称记载，以《尧典》为例：

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夏，厥民因，鸟兽希革；秋，  
厥民夷，鸟兽毛毳；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这里的“民”当是“名”字笔误，而鸟兽当作凤鸟解。说明《尧典》和《山海经》中的一些记载，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

中国字是象形会意字。人们在造字之初，便灌输了该字原始意义的信息，这将帮助我们破译甲骨卜辞的真实含意。东方析在甲骨卜辞中写作“𣎵”或“𣎵”，象征着一棵树旁站着一个人，或树上挂着一把斧子。表明“析”这个神一定与树木有关。由木和人或斤组成的“析”字，木是该神的原始自然属性，而人或斤则是它的人格神属性，析为木神，主管东方，东方便具有了木的价值意义。

南方𣎵在甲骨卜辞中写作“𣎵”，始释“𣎵”字为𣎵的是丁山先生，这个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从音读上说，《尧典》中的“其民因”，“因”与“𣎵”读音相近，因两字古音同在真部，故《尧典》才会音误为因。从字意上说，《说文》解释“𣎵”字为“兵死及牛马之血为𣎵，𣎵，鬼火也。”甲骨卜辞上的𣎵，其象形是从火从大，大，人也。从北，北犹背，人死为背，表明是人死之火。由于𣎵火是自发之火，又只有在夜间方能看见，具有人工取火所没有的神秘性，所以被看作是火神的化身。从字形的流变看，甲骨作𣎵，周初的穆公鼎中𣎵字作𣎵，与甲骨字相去不远，是其初变，小篆中𣎵字写作𣎵，是其再变。证之于古赤字𣎵炎，赤字也从大从火，与𣎵字字形相似，都与火有关。大表示人神，火表示该人神的自然属性。

西方𣎵或夷，二字在古籍中可以互相通假。如《周礼·

春官》中说“灌用鸡彝”，《礼记·明堂月令》则云“灌尊，夏后氏以鸡夷”。《诗·大雅·烝民》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中引用此句则写作“民之秉夷”。卜辞中风名与神名互异，可能在商代这两个字便相通假。尽管它们很早便可通假，但两字的原始意义并不相同，古彝字从鸡从卩，毛（鸡）像鸡冠、鸡翼和鸡尾，它被造出来作为“鸡彝”的文字符号——𠩺。鸡彝的外形三足、长颈、尖嘴，像一只引项而歌的公鸡。因为它是作为祭祀的礼器而被使用，故古人又将祭祀用的礼器通称为彝器。至于它为什么可以与夷字通假，有人解释说，鸡彝最先产生于东方，所以称为夷。夷字的原形𠩺，像一人身背一把大弓，古人将东方狩猎为生的民族称为“东夷”。

以彝或夷来称呼主管西方的金神，取自于彝和夷的各自原意。青铜器制作之初，是用以作祭祀礼器和箭簇。礼器是祭祀那些已经死去，又在天堂获得再生的祖先或神，它与西方是太阳下沉而再重新轮回同一道理。夷作为大弓和弓上的箭簇，所具有的杀伤之义，与西方肃杀的特征是相同的。彝与夷是金的一物两用，这两用恰恰与西方的特征相类同，故彝或夷便做了西方的金神。

北方曰窀或元，这二字读音相近，而《尧典》中“厥民曰隤”，《说文》：“奥，窀也。”《尔雅·释音》：“隤，忼也。”可见隤字与窀、元音义均相近。那么这个称作元、窀、隤的北方神，其原型是什么呢？

它便是远古与龙并称的鼃。鼃形似龟，体形巨大而十分罕见，当是龟类中的巨龟，它超长的寿命和罕见的神秘性，使它受到古人的礼拜。鼃是黄帝族的图腾，《国语·周语》中有“我姬氏出自天元”的说法。这个说法被考古成果所证实。1991


年美国华盛顿《国家地理》10月第180卷第4号刊登了布鲁洽·约瑟的论文《奥次顿哥》，介绍了奥次顿哥村的易洛魁人保存的鹿皮画《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其中《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正中上方便是轩辕氏的图腾——天鼋，它头向西北，尾向东南，这种指向的龟在殷商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天鼋下甘霖降洒，承受甘霖的正是一位酷似名画《父亲》中父亲形象的轩辕酋长；他昂首向天，双臂高举，直视苍天，雨露围身，胸前左有三矢示狩猎；右有三犁，一耙一镰示农耕；腹为龟腹甲状，说明他是天元鼋族人。


仔细分析画面，轩辕酋长礼天祈年，祈求的主要对象是天鼋，而天鼋之下是雨水，轩辕酋长身体周围也是雨水，正说明天鼋是主管雨水的水神，而轩辕酋长向它祈求的是风调雨顺。鼋乃出身水族，又是水族中具有神奇耐受力的长寿者，以之作为水神的代表，不亦宜乎！证之于殷商甲骨，甲骨文中的鼋字，恰恰也是将雨与龟字组合，这决不是巧合，只能说明在当时人的思想中龟与雨水的紧密联系。

《史记·天官书》说，轩辕十七星主雷雨。如果将轩辕十七星联结起来，其画面与殷甲骨文龟（𪚩）字十分相似，实际上也就是说是龟神主雷雨，这种说法渊源有自，正是上古天鼋是水神的遗存。

天鼋作为水神，是周族祖先黄帝族的图腾，同时作为水神，它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崇拜，正如火是炎帝族的图腾，同时又受到其他族团的祭祀一样。考古实物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传世的青铜器中，有一个鸡彝上也铭有“天鼋”字样，“鼋”即“鼋”字。一般认为鸡彝是夏文化的特征，说明夏人也尊崇天鼋。天鼋既是水神，殷商人将之尊为具有寒水

特征的北方，成为主管北方的大神。

殷人将土与中央相配，因为土即社，是国家的象征，甲骨文的土字写作，正是在地上起坛，予以礼拜的象征。自盘庚迁殷以后，经武丁、帝乙、乃至商纣，都以武力东征西讨，形成“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以商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商人在卜辞中，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商。以土配中央，表明了殷文化尚土的观念，考之于殷商之“易”书，殷商的易书命名为《归藏》，意即万物归藏于土，其以坤为首，故又称之为《坤乾》，坤为地为母，万物生于斯，长于斯，又归藏于斯，故受到殷人推重，作为中央之神来礼拜。

土、木、火、水、金，作为百神之一，经历了自然崇拜阶段，走向偶像崇拜，成为与日、月、气、风等神平列的主要神祇。以后又经过殷人将之与五方认同，终于从诸神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称为五行。最早记载五行的比较可靠的古代文献是《尚书·洪范》，它是由殷末贵族箕子所陈说，他所说的“天乃锡洪范九畴”，其中之一便是“五行”。这说明至迟在箕子时，五行的观念便已很明确。之所以称“土、木、火、水、金”为五行，行的最初含义当如罗振玉所释为四通衢，在甲骨文中“行”字写作，正是从中央至四方的意思，表明了与东南西北中五方认同的木火金水土五神。因为五行之神——风——是御气流而运行，于是“行”便有了后起的运行之义。再以后便又有了行列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后话。

五行与五方的认同，对五行自成体系是一个促进，它是五行演变中的一个重要中间站。

### 三、五行的整合——五行体系的形成

武王伐纣，取殷而代之，对殷商文化有所损益地加以吸收，同时也保留了本族的文化传统。在体现先周文化的周原甲骨中，没有发现五行崇拜的痕迹。周立国之初其自然崇拜是否已经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五行崇拜，尚无确凿资料加以证明。《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待旦，前歌后舞，假如上下。咸曰：‘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是为人用。’”以此看来周人对五行的了解已相当深入，但《尚书大传》写作年代较晚，其记载是否可靠，尚无其它材料来佐证，因此，对西周这一阶段五行发展的情况，在此只能阙而不论。

进入东周以后，文献材料中有关五行的记载便逐渐多了起来，其中系统或零星地叙述了周人的五行与五方神的模式。如：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姓氏，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左传·昭公十七年》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

《山海经》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

《左传·昭公十七年》

这些记载到了《吕氏春秋》时，便被整合为整齐有序的五方、五帝、五佐神的模式，并且还加进了四时的概念。

春，其帝太昊，其神句芒。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中央，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秋，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冬，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周朝所形成的五行、五方、五帝系统，其模式与殷商相同，而名称各异，内容上也有所发展。其名称对照如下表：

商		周
·东:	析木、轸	太昊、句芒
西:	奎、夷	少昊、蓐收
南:	井、鬼	炎帝、祝融
北:	元、戌	颛顼、玄冥

仔细研究商、周二朝五帝五佐神的名字，不难发现在周朝人的五方帝、神系统中，有相当部分是从商人的五方神中

演化过来的，有一些是周人自己原有的神祉，还有一些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在整合这个五行五方系统时，临时拉来凑数的。

木神句芒其原型是析木或若木。句者屈也，句芒之意是树木生长弯屈而有角杈。作为木神句芒也有其原型的不死和再生的神秘力量，在先秦典籍中，它是一个给人赐福延寿的生命之神。据《墨子》中记载，当年秦穆公曾在日中之时，于庙中见到一位鸟身素服的神人进得门来，立于左边。秦穆公惊恐奔走，被神人所阻，神说：“别害怕，帝接受你的明德，派我锡你十九年寿命，使你国家蕃昌，子孙繁茂。”穆公连连向神人叩拜，请问神的大名，神告诉他说：“我是句芒。”在《随巢子》中，句芒人面鸟身，降福于正在与三苗作战的夏禹。由于木神句芒又是生命之神，与春天万木回春，开始一个新的轮回的特征相同，因此，它在周朝又成了春天之神。

正因为句芒的原型来自殷商人的东方木神析木，而殷商人的地理位置又在周人之东，故句芒的造形特征便具有了商人图腾的形象：“鸟身、素服、玄纯”，如同玄燕，也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

而东方木帝太昊则是临时被拉来凑数的神祉，在《吕氏春秋》以前，太昊并没有与东方、春天、木发生什么联系，只是由于与之相对的少昊做了西方金帝，所以他才被《吕氏春秋》的作者安放在春天木神的位置上。

炎帝被安放在南方火帝的位置上，是受了商人南方模式的影响。炎帝又作赤帝，前面讲过，赤与彘其古字形相似，意义相通，而炎与彘古音相近，一声之转。故本为西方姜水流域炎帝族领袖和祖先神的炎帝便被转移到南方火帝的位置上。

当然，炎帝族的确是以火为图腾的。《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传说中炎帝的头是锐形，正是火向上燃烧的形状，其以炎为名，意为火向上焚烧。《管子·轻重》载，炎帝钻燧生火，煮熟荤臊一类食品，民众吃后，没有肠胃等病，从此天下人都用火熟食了。可见炎帝及其族团在人工取火方面，可能较之他族为先。而炎帝族与周人的祖先黄帝族关系十分密切，世代互相婚配，在宗教、心理和文化上，发生了全面的融合，炎帝便也成为炎黄族团的火神。

炎帝的佐神是祝融（朱明），先秦文献上对祝融的记载比较混乱。《左传》说祝融是颛顼之子，名犁，做了火正，称为祝融。而《国语·楚语》则说火正黎是颛顼的臣子，受颛顼的指派“司地以属民”。《国语·郑语》又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高辛氏即炎帝。在《山海经》的《大荒西经》和《海内经》中，祝融又被分别认定为颛顼的孙子和炎帝的第四世孙。同时祝融还是南方楚人的祖先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楚的属国夔国因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便受到楚人的责备。有关祝融的记载如此混乱，其原因只有一个，即祝融之名是各族管火官的荣誉称号，黎因为火管得好，光照四海，其功大矣，才被命名为祝融。黎的名气太大，故在他之后获得祝融称号的人，都被黎的名气所吞并，附到了他的名下。颛顼地处北陆，炎帝远在姜水，楚人居处南方，然他们都与祝融有关。他既参加了对水神共工的大战（据《山海经·海内经》说，共工是祝融的儿子）；又奉天帝之命诛杀了另一位治水不力，盗天帝息壤的水神鲧（鲧是夏禹的父亲）。并且由于祝融出现在崇山，夏朝得以兴盛；商汤伐桀，祝融在夏都城西北隅燃起火光，帮助汤灭夏桀。可见祝融是当时跨

文化的火神，受到众多族团的崇拜。将火神炎帝、祝融与南方，夏天联系在一起，是将火神炎热的神格特征与时间平面上最炎热的季节同空间平面上最炎热的地区彼此等价认同，它的依据是人们的感观经验。

西方帝少昊原是东方民族的祖先神，少昊族以鸟为图腾，故少昊为鸟师。《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周成王将伯禽（鲁国开国国公）封于少皞（即少昊）之墟，以管理商奄之民。《尸子·君治》说：“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所谓穷桑，其地在东方。何以东方族团的祖先神少昊反成了主西方的大帝呢？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少昊的母亲皇娥晚上在璇宫织布，白天则常乘舟到处游玩，在穷桑的沧茫之浦遇到了美貌的少年，这位少年便是西方白帝之子，也即太白之精。俩人坠入爱河，皇娥后来生了少昊，因为生于东方的穷桑，故叫穷桑氏，因为父亲是太白金星，所以又叫金天氏。这个神话试图解释少昊为什么两栖于东西两方，故事虽然美丽，却出于太白做了金星以后人的编造。太昊之所以称金天氏，是因为他在原始神话中是主司日反影的西方日落之神，受殷人西方属金思想的影响，他便被称为金天氏。取代彝或夷做了西方金帝。

少昊的佐神蓐收很早就被周人尊为金神——金正，其原因可能是蓐收及其族人在制铜方面的卓越贡献，在《山海经》中，金神蓐收居住在渤山之上，长着人的面孔、虎的爪、白色的尾巴，手里拿着大斧。正说明炼铜人在山中采矿，在山中冶炼，炉火熊熊，炼铜人将白布反系在身后，便被描绘成白尾，手中拿的铜制工具便成了虎爪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原始神话中，蓐收是少昊之子，也司掌“日之所入”，所以成了西方金的佐神。在殷人的五方观念中，夷是具有刑杀特

征的金神，周人继承了这一观念，这样蓐收又成了“天之刑神”，手里拿着铜斧，司掌伐罪吊民。《国语·晋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虢国国公曾做一梦，梦见自己在庙中，有一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边。虢公惊惧逃走，神说：“不要走，天帝命令说：‘使晋袭你于门！’”虢公向神叩拜。梦醒以后，虢公召史嚣占梦，史嚣回答说，这个神是天之刑神蓐收。六年以后，虢国果然被晋国所灭。在这个故事里，蓐收所扮演的正是刑杀神的角色。由于秋天是万物萧杀的季节，故而秋天遂与西方、金帝、金神联结在一起。

玄冥是北方水帝的佐神，它脱胎于殷人北帝元。元与玄在上古相通，在很多场合元便是玄、玄便是元。玄的象征是鼃，玄冥又称玄武，武与冥在上古音相通。玄武在四象中是一只神龟，孔颖达在解释《礼记·曲礼》中玄武一词时说：“玄武名武者，龟有甲，能御侮。”把“武”的“勇武”之义引入玄冥的神话，这个解释被后人接受，宋高似孙《纬略》说：“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玄冥或玄武从字音字义到神的形象都保留了殷人北方神元的原型意义。

颛顼是周人的北方神，《国语·周语下》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左传·昭公八年》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復由。”这些记载说明，在周人眼里颛顼是北方天神。在古籍记载的上古传说中，颛顼英武雄恣，具有起死回生的奇能，他领导了中原各族对另一位水神共工集团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一度成为天下的共主，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由于北方气候寒冷，所以北方帝颛顼与佐神玄冥又

与四时中气候最冷的冬天认同。

殷人的五行五方观念经过周朝人的整合充实，整个体系已宣告完成，这个五行五方模式在秦汉时的著作《淮南子》中得到完整地表达：

东方木，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

#### 四、天子坐明堂——五行与明堂之制

明堂之制的源始，可以上溯到殷商。根据甲骨文记载，殷王的宫室分寢寝，东寝、盟室、南室，商王春宅于东寝，夏居于南室，秋告于盟室，冬出于寢寝。随着时令的变化而更换居室。周承殷制，周人的明堂之制便由此而来。《周书·明堂》说：

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庙，以左为左个，右为右个也。

较之殷商文化，后发展起来的周文化“郁郁乎文哉”，明堂制度不仅完善，而且名称也格外文质彬彬。但到春秋末年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明堂制度受到冲击，渐而湮没不行了，故到汉武帝时在汶上造明堂，已不知古代明堂的确切造型，只有资取方士的图画。

然而，尽管明堂的建筑造型的图纸失传，但明堂的五行制度却随着五行说的成熟而日益完善，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便详细地记载了明堂的制度，《礼记·月令》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月令》说：

在春天的三个月里，天子穿的是青衣，佩的是苍玉，吃的是麦与羊，祭祀的是太昊和句芒。轮流居住在青阳左个（个即厢房）、青阳大庙、青阳右个。立春之日，盛德在木，在春天，天子行政的总体精神是崇尚和爱惜生命，他要率群臣至东郊迎春，行藉田礼和施惠于民，养幼存孤，省刑止讼。同时他还要以大牢之礼（全牛、全羊、全猪）祭祀生殖神高禘，在高禘之前，天子后帅嫔妃以酒礼敬天子妻妾中有孕者，并投之以弓矢，以求得男。

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天子穿的是红衣，佩的是赤玉，吃的是菽与鸡，祭祀的是炎帝和祝融。轮流居住在明堂左个，明堂大庙、明堂右个。立夏之日，盛德在火，天子率群臣至南郊迎夏。夏天是万物茂盛繁荣的季节，天子行政的总体精神是重视农作物的生长，不可以兴土功、合诸侯、起兵动众，以妨碍农时。

在季夏月戊巳日里，便是中央土当令的日子，这一天的主神是黄帝和后土。天子衣黄衣，佩黄玉，吃稷和牛。居住在大庙大室。土性静，故以静为主。

在秋天的三个月里，天子穿白色衣服，佩的是白玉，吃的是麻和犬，祭祀的是少昊和蓐收。轮流居住在总章左个、总章大庙、总章右个。立秋之日，盛德在金，天子率群臣至西郊迎秋。秋天的特征是刑杀，故天子行政的总体精神是任命将帅，选士练兵，以征不义。整顿法制，审断决狱，斩杀必当。

在冬天的三个月里，天子穿黑色的衣服，佩玄玉，吃黍和藟，祭祀的是颛顼和玄冥。轮流居住在玄堂左个、玄堂大庙、玄堂右个。立冬之日，盛德在水，天子率群臣至北郊迎冬。水性严肃冷峻，冬日天地之气闭寒，故天子行政以小心谨慎、修补完善为要务。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钥，去声色，禁奢欲，养精蓄锐，为下一个农时的到来作准备。

《月令》所记的明堂制度当然是经过当时人加工杜撰，周初的明堂未必有如此完密的讲究，尽管如此，明堂制度与殷商五方、五帝、五行系统的密切联系和一脉相承是十分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明堂制将宗教中的五行引入政治领域，将五行的特性与行政联系起来，将人间政治与自然界的五行素质、宗教中五行神喻相结合，将人与自然、天意统一起来，使君主的行为有了符合天意，契合自然的解释，从而也就神圣不可动摇了。五行思想在明堂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明堂制度时断时续地沿续着，但它的据五行顺时令的主旨从东汉开始一成不变地为历代封建帝王所承袭。东汉光武帝刘秀继王莽之后，在洛阳兴造明堂。汉明帝则下诏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又按《月令》所言，颁发时令，迎接四季五气，祭祀五方神。汉章帝元和三年仲春，因要去中山，特地下诏道：“现在方春季节，所过地方不得有所砍伐。天子虽尊贵，但在不适当的时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顺天，也就是不孝。巡行之际，凡车马可以避开的，便要避开。”春天忌杀生成为惯例，故处决罪犯则一般都在秋冬进行，过了秋冬死囚犯人便加额相庆，又可以多活一段时日了。西汉酷吏王温舒被升迁为河内太守，九月至郡，尽行诛杀郡中豪猾，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郡中已无犬吠之盗，余下盗贼都逃到其他郡中去了。王舒温下令追捕，正好

春天到了，王温舒顿足叹道：“哎呀！假令冬月延伸一月，则我的事情便可以完成。”

唐朝立国之后，太宗、高宗多次议立明堂，皆由诸儒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不能统一而止。至武则天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明堂制度，不问诸儒，遂在原乾元殿旧址上起造明堂，任命自己的亲信加情夫薛怀义负责这项工程，动用工役数万人。明堂建成以后，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上圆下方，上下三层，以珠玉黄金为饰。命名明堂为万象神宫。太后便在这万象神宫内祭享天帝祖宗、称帝、处理政务。在明堂的北面，又建天堂，天堂内建作巨大的佛像，其小指中便可以容纳数十人。费用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但是，负责这项工程的薛怀义见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璆，心怀妒嫉，便在夜里放火烧毁天堂，火焰延及明堂，城中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明堂失火，引起群臣议论纷纷，武则天只得以明堂火告庙，下令征求意见。后来武则天又下令建起新的明堂，号称通天宫，大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足见明堂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

对明堂制度顾颉刚先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介绍，所谓明堂即说：

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这屋子的总名叫做明堂，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又各有两个厢房。天子每一个月应当换住一地方，穿这一个月应穿的衣，吃这一个月应吃的饭，听这个月应听的音乐，祭这一个月应祭的神祇，办理这一个月应行的时政；满十二月转完这一道圈子。这大院子的中间又有一个厅，是天子在季夏之月里去住的；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所

谓“土王用事”)去住的。这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和时令的“春、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金、水”的运行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体的表现。

可见明堂不仅是一所皇家建筑，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乃是传统文化中的骨干——五行思想的体现。

## 第二章 五行的哲学轨迹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 一、《洪范》中的五行哲学

五行思想起源于原始宗教崇拜，至殷朝末年便花开两朵，各据一枝，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它原有的宗教观念被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它又试图与原始宗教观念的母体分离，走上哲学思维的道路。

中国上古文献中，最早谈到五行的是《尚书》中的《甘誓》和《洪范》，据《史记·夏本纪》说，夏启即天子位时，有扈氏不服，启兴兵讨伐有扈，大战于甘地，作《甘誓》以誓军。《甘誓》中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故夏启恭行天命，讨伐有扈氏。但《甘誓》的文字晓畅平易，经学者考定，并非夏代文字，而是出自后人的追述。

《尚书·洪范》篇出自殷末贵族箕子。箕子出身王族，可能是商纣王的叔父，也可能是他的庶兄。商纣王倒行逆施，箕子劝谏纣王，而不被纣王接受，有人劝箕子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箕子说：为人臣批评君主不被接受便离君而去，是彰显君主的恶德，自己取悦于民心，我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他披散头发，假装疯癫，自愿为奴。周武王克殷后，寻访到了箕子，将他带回镐京，向他询问安国大法，于是箕子向他陈述了《洪范》，武王听了，非常满意。便将箕子分封到朝鲜。

箕子向武王提出了九条治国纲领，其中首要的一条便是五行，箕子说：

我闻在昔鲧陞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日五行。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从前鲧采取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因而扰乱了天帝所创造的五行的规律；于是天帝大怒，不把九种大法给他，于是治国安民的常理遭到破坏，鲧也在流放中死去。禹于是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继续治理洪水，天帝便把九种大法传授给了大禹，因而禹就运用这九种大法使治国安民的常理得到恢复和推行。九种大法的第一条是五行。

箕子在这段话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客观事物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为人所发现、掌握和利用，而不能为人所抗拒和违背。鲧未能认识水、土的特性，用土堵水，致使治水事业的失败。夏禹变堵为导，依水能润下的规律疏导洪水，变洪荒为陆地，获得成功。在这里大自然被人格化为天帝，凡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便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联系到前

面所提到的《甘誓》，也说有扈氏威侮五行，即侮慢五行，不按五行变化运动的规律办事，所以夏启才恭行天罚去讨伐他。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五行的运行规律是天与人的中介，天或天帝既体现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又表达人间主观世界的道德价值取向。而在《洪范》里，客观的自然法则更起着主导作用，鲧因不按五行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所以才引起治国常理的混乱。

箕子接着说，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箕子将水火金木土合称五行，具有明确的抽象概括意义，将这五种物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比较，箕子又分辨出它们之间不同的属性和功用。如水向下浸润，火向上燃烧，木可弯可直，金可以锻炼变形，土可以种植庄稼，五行的属性在运动中得以表现，并且，这种深入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五行，为进一步认识五行的本质开辟了道路。

在分析了五行属性以后，箕子又企图把与五行属性在某一方面有关联或相近似或仅仅是在感觉上有某些近似的事物与五行建立起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向五方辐射的大系统，如五味、五事、五纪、五庶征、五福等，试图用五行来包容万物组成系统的思想在这里已露端倪。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洪范》里，五行不再以神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五种物质功用呈现在人们面前。五行原本是与先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在自然崇拜阶段被神化，经历了漫长的弥漫着神风妖雾的演变阶段，至箕子的时代，以

《洪范》为开端，在一个新的思维层次上，将神化的五行还原为它的本来面目，重新肯定了它的物质功用，这对它在一个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洪范》中关于五行的叙述，虽还没有涉及到世界的物质构成问题，但它却将原始五行说中的科学成分与宗教神话分离，赋予五行以哲学的含义，是五行思想从信仰和幻想逐步升华至自然哲学高度的一个阶梯。

## 二、五行杂以成百物

以《洪范》为标志，五行进入哲学思维的阶段，至西周末年，动荡的社会生活促使人们的思想向更深刻的境界发展。史伯的“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命题，便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史伯是周幽王的史官，当时郑桓公任周幽王的司徒，甚得西周和京郊以东百姓的人心。见西周危机四伏，便向史伯请教自己避乱的良策，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了逃亡处所后指出，周朝已经接近于衰败，因为周王不与贤人共同合作，而和坏人营营苟苟。史伯接着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史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善相济能生万物，同恶相济则不能发展。用一物均和另一物叫和，所以能丰富发展，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用相同的补益相同的东西，只能是用尽了之

后便没有了。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杂合而生成万物。

分析史伯这段话，与《洪范》中的五行思想相比较，可见这一时期的五行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史伯朴素地回答了世界的物质构成问题，指出了五行是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基本元素，突破了《洪范》对事物简单的多样性的认识，上升到探讨世界物质起源和构成的哲学高度，通过物质的内在联系来把握物质的质的规定性，使五行学说具有了重要的哲学意义。其二，《洪范》的五行说，说明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固有的性质和功用；而史伯则更进一步，力图从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去寻找世界无限多样性的统一，这个自然界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便是五种性质的物质的结合体——“实”。

在《洪范》里，五行是以水为首，而史伯则将土从五行中提出，加以重点强调，至《管子》时，水的地位又显著上升，在《管子·水地》篇里，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一种物质为万物之本源的思想。

那么，在《管子》那里，水与五行的关系如何呢？《水地》篇说：“水，具材也”。根据吕思勉的解释，这里的“材”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中的“材”，水为具材，也就是说水是其它四行火、木、金、土的原始形态。水生火、木、金、土，然后相杂成百物。如“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之于地，犹人体之血气和筋脉，离开了水，土地便不具有活力。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草木的生长依赖于水的滋润，草木之根靠水来养济，花靠水才繁茂，果靠水才丰硕。至于人，也是水所生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凝蹇

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人是水凝蹇而成，构成人的形体和精神。

沿着传统的思维路线，《管子·水地》篇同样也是始于自然而归于人伦，水不仅是世界的物质本原，同时它还是社会精神道德的母体。《水地》篇说，水“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是各种生灵之祖宗，是美好、丑恶、贤德、不肖、愚蠢、俊杰等各种品质道德产生的基地。《水地》篇举例说，齐、楚、越、秦、晋、宋各国的水质不同，故其人民所表现出的风格便不同。所以圣人教化世道，其根本的解决在于变更水质。管子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糙，水质对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会有一些影响，但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

### 三、阴阳与五行的合流

在传统文化中，阴阳与五行水乳交融，混然一体，然在其发生发展的初期阶段，二者则是独立并行，自成体系。

阴阳最初只是表示具体物象的一个词汇，阳光的背向便称为阴阳。给这一概念赋予哲学意义的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据学者考证，这位谈论阴阳的伯阳父便是前面提到的史伯——“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命题者。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解释地震的原因是天地之气失序，使阳伏不能出，阴迫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与《易经》震卦有明显的血缘关系，《易经》震卦的卦画是两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表明阳伏於下，阴迫在上，阳气不能蒸腾，故引起震动。伯阳父比《易经》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已明确地将天地之气命名为阴阳。但在既谙阴阳又晓五行的伯阳父那里，阴阳与五行仍各自独立，阴阳自阴阳，五

行自五行，互相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揭示出来。

到了“不出于户，不窥于牖”的老子手里，阴、阳成为化生万物的根本元素。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宇宙的本原，它派生出阴阳，阴阳交合，化生万物。这是在五行之外发展起来的另一幅宇宙构成图式。

于是，摆在春秋时人面前的关于宇宙物质构成的回答便有了两种——阴阳和五行。为了解决两种回答的矛盾，春秋时期便出现了“六气”与“五行”这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经之以天”，五行则“纬之以地”，六气属天，五行属地，分别为天与地的物质本原。

至战国年间，以气为世界万物的基本原素的思想占了上风，五行开始向气转化。《管子·四时》篇说：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阴生火与气，……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肤，……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生金与甲，……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

在这一幅气与五行相结合的宇宙图式中，明确提出了五行是气之所生。在《管子·侈靡》篇中又说：“天地精气为五，不必为沮。”这里的天地精气便是五行精气，五行转化为五种精气。

进入秦汉以后，五行的五气进一步演化为二气，西汉董

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乃阴阳二气所生，五行是阴阳二气的物质形质。五行内包含着阴阳，阴阳通过五行得以体现。按照《云笈七签》的说法：阴阳生成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火性炎蒸，木性刚直，金性坚强，火性涌滋，土性和柔，分别体现体内的阴阳本性。

五行范畴进入气和阴阳的范畴，为我们构筑的宇宙图式是，阴阳二气化生五行，五行构成世界万物。用唐朝李鉴的话来说便是：“天地则阴阳二气，气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阴阳之用也，万物从而生焉。万物则五行之子。”五行与阴阳的合流，圆满解决了关于世界物质本原的两种不同学说的矛盾，使原来各自有些单薄的理论丰满充实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构架，支撑着传统文化的宏伟殿堂。

阴阳学说既与五行学说合流，五行学识中也就渗透了阴阳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的重点就在于生生不已，而生生不已的动因，就在于事物阴阳两个方面的运动，阴阳运动，以冲气为和，才能化生万物，所以阴阳的正道处于阴阳和谐之处，即“阴阳合德”。五行既由阴阳二气化生，因此它在构成了万物时，也强调五行和合，不主张某一行太盛而至天地失和，五行或生或克，最终以达到五行之间互相扶补，互相依赖，密切配合的动态平衡的格局为目的。

#### 四、五行生克说的产生

五行生胜（克）学说产生于春秋年间，成熟于战国中后期，它标志着人们对五行认识已从表象深入到它的内部结构和交互作用，力图依据某种特定的原则或机制，探求五行之

间的相互依存或排斥的关系。

五行相生相胜说的灵感来源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人们拓荒开地，首先要用火烧荒，于是木燃烧为火，火过之后是宜于耕种的灰烬沃土；矿土炼出金属；金属溶解为水；水滋润了树木。因而产生了五行相生的循环。即：

水→木→火→土→金→水……

除了五行相生，人们还观察到五行相胜相克的功能，如水能灭火，火能溶金，金能伐木，木能垦土，土能塞水。这就出现了五行相胜的循环，即：

水→火→金→木→土→水……

当然，五行相生相克学说虽然来源于人们生产生活经验的启示，但它被系统地总结和提炼则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反映春秋史实的《左传》中，时时闪耀着五行生克思想的火花，但零散而不成体系。《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晋国于辛亥那一天发生了日食，恰巧那一天晚上赵简子梦见一小男孩赤裸着身子，合着音乐节拍舞蹈，于是赵简子便请史墨占梦，解释日食的原因。史墨回答说，六年以后的这个月，吴军进入楚郢都，但最终不能占有楚国。因为“庚午之日，日始有谿，火胜金，故弗克。”六年后的庚午，吴果然在柏举打败楚，进而攻入楚都，于是便发生了伍子胥掘墓鞭尸，申包胥哭于秦庭的故事。《左传·哀公九年》，郑武子的嬖臣许瑕请求给他封邑，郑武子已没有邑土可封，于是许瑕请求出师从他国夺取土地，郑武子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兵去夺宋国的

雍丘，结果宋国军队包围了郑军，将郑军全部歼灭，并移师讨伐郑国。晋国的赵鞅为救不救郑这件事求诸于卜，遇水适火。史墨解释这个卦象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水胜火，伐姜则可。”也就是说，这个卦象兆示可以伐姜姓国家，但不能伐子姓的宋国。卜占如此，晋国便没有出兵救郑。史墨在对这两件事的分析中，都应用了五行生胜的思想，如“火胜金”“水胜火”等。

稍后一些的《孙子》、《墨经》中，五行生胜的思想更为突出，《孙子·虚实篇》说：“故五行无常胜”，便是说五行处于生胜转换的运动中。《墨经》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宜当为多字）”。“合水土火，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五行由生到死，运动不居，彼此生克，只看量的多少，火盛克金，水盛克火，体现了物质运动变化的思想。

《墨子·贵义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子北行到齐国去，路上遇见了一位占日者，占日者说：“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的面色黑，不可以出行北方。”墨子不听日者的话，继续向北行，至淄水，不得渡，只得返回。日者见到墨子说：“我说先生不可以北行吧！”墨子回答说：“南方的人不得北行，北方的人不得南行，这些被阻滞的人中，有的色黑，有的色白，为什么都不能成行呢？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原文没有此句），据学者考证此句为佚文，故增加），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听先生的话，则禁止天下的旅途中人，这是违心害理之说，先生的话不可听。”

从墨子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确定至墨子时，五行相生的序列已经完成，东方木生南方火，南方火生中央土，中央

土生西方金，西方金生北方水。墨子以喜欢言五行著称，对五行也有一定的研究，故为五行生克学说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墨子之后，邹衍将五行相胜的理论引入历史领域使之与政治结合，将原本表示属性和本质的五行之德改造为天道必然的天命或者说规律，“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继火之后就是水德，历史便是根据五行相胜的次序来循环演进的，这便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五德终始说是一个运动不居的，循环往复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取法于自然现象，人类在数以万年的劳动生息中把握到的大自然的韵律，是这种思维循环模式的基础，春华秋实，四季轮回，生生不已，循环往复，这种自然法则明显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法则的思考。特别是我们这个农业民族，季节与植物的循环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与之类比而具有周期性变化特征的五德终始说一旦问世，人们便深信难移了。

## 五、五行的对应系统

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学术上的活跃氛围，给五行学说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五行观念逐渐扩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方面，人们以经验为依据，以观象取类为方法，用五行思想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进行整理和把握，建立起一个似是而非的五行大系统，其中以《吕氏春秋》的表述最为典型。

在《吕氏春秋》里，与五行相对应的系列有天干、五帝、五神、五方、五色、五音等等，如下图：

五行 对应物	木	火	土	金	水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太昊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音	角	征	宫	商	羽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膾	焦	香	腥	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祀	户	灶	中	门	行
五祭先	脾	肺	心	肝	肾
季节	春	夏	季夏	秋	冬

从表中可以看出,《吕氏春秋》所对应的诸项,并非以纯认知的理论为基础,这就难免陷入主观臆测,形而上学的比附。但它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对应性、互补性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另外,在《吕氏春秋》的五行对应系统中也不乏其合理成分。如木为春,农耕始举,王布农事,万物滋生,禁伐木杀兽,不称兵以误农事。火为夏,五谷茂盛,农时正忙,政令毋兴土功,毋发大众,劳农劝民,不失农时。金为秋,五谷收获,政令是修囷仓,增墙垣,补城郭,伐薪为炭,劝种麦。水为冬,严寒将至,捕渔伐木,整修农具,备办武器,备边境,完要塞等。这个依据季节实施的政令,是符合动植物生长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据此规律而制定国家政

令，不碍农时，不乱捕滥伐，依时而动，井井有条。人们把长期生产管理经验的总结概括纳入五行系统，使之规范化、一元化。其实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秦汉时期，五行系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取法于自然社会转向近取诸身，把人体的各部分器官和心理情感、生理功能与五行对应。其典型的表述在《黄帝内经》：

五行 对应物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气	风	暑	湿	燥	寒
五时	平旦	日中	日西	日入	夜半
五应	生	长	化	收	藏
五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腑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五体	筋	脉	肉	皮毛	骨
五官	目	舌	口	鼻	耳
五志	怒	喜	忧	悲	恐
五脉	弦	洪	濡	浮	沉
五声	呼	笑	歌	哭	呻
五谷	麦	菽	稷	麻	黍

从表象上看，将五行与人体各部分相对应似乎也说不出很多道理，为什么一定是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肾的配置而不是别的呢？但这种配置绝非主观臆断的产物，它是祖国医学对人类自身的观察和治疗中得出来的并经过验证了的结论。五行与人体的对应是建立在异质事物因结构位置相同而可以互相影响的基础上，按照功能相近和类似的原则，被组合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并按照这个框架结构的运动机制

——五行的生克制化进行运动调节，达到人体的动态平衡。因此，《黄帝内经》中所具有的直观理性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 六、辨五行以观天道

以倡导“天人感应”学说著名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再次把五行学说导向神学。董仲舒把“天”说成是创造万物的最高神祉，它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于是，已经皈依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学说，又被纳入了神学思想体系。董仲舒说：

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来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明阴阳以观天志，辨五行以观天道，人间统治者便是通过体察阴阳五行来领会天的旨意。

董仲舒还进一步赋予五行以道德属性，他写道：

天有五行，……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董仲舒把五行由自然、人事的对应推向道德意识结构，具

有了忠孝道德的内涵，这个结构并非五行自身的客观法则的再现或系联，而是强加在五行之上的神的意志。神意与五行的自然法则相结合，忠孝道德观念便有了神圣和天然作为依托，从而找到了理论依据。

东汉的谶纬神学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五行理论，在《白虎通·五行》篇里，详细解释了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又提出了“五行休王说”作为王朝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循环规律，同时，又把被严重伦理道德化的五行关系进一步演化为君尊臣卑，夫尊妻卑的等级关系，文中说：

五行者……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

在君命与父命发生冲突时，臣子要放弃父命，服从君命，其理论依据便是五行的“天地之性”。即：

不以父命废王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

金由土生，土是金的父辈，而火则是金的君，所以金怕火而怕土。《白虎通》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更精致地区分了忠与孝的主次，在忠孝不能双全的情况下，则应舍弃孝而实践忠。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以反传统为其特色。玄学家们一扫汉代谶纬神学迷雾，标新立异，开哲学思辨之风气，被汉儒固定化了的五行之学受到冷落，五行学说除了五德终始说仍在王朝更替时发挥作用，在道教典籍和具体科学中应用发展外，从整个思潮来说，已显沉寂。

隋唐文化上承汉代，政治文化繁荣昌盛，但哲学思辨方

面却没有什么突破。五行学说虽在疏汉注之中有所涉及，但囿于疏不破注的陋习，仍以沿袭解说为主，看不到新的起色。

## 七、五行相资以为用

较之魏晋玄学的空灵放诞，两宋的理学就显得庄严实际，它再一次把思维的焦点转向人生。五行作为天理与万物的中介，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宋史·五行志》阐述了宋人的五行观念：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于理而究于诚。

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五行的妙用。譬如人，得五行之气而有了形体、有了精神，有了五种情感，引发各种事件，也就有了祸福。五行之气和则吉祥，气乖则有变异。把五行看作是五气、五种物质元素，用五行气的和与乖来论吉祥变异，这无疑有唯物的思想因素包含在内。

宋明理学的先导周敦颐认为是阳变阴合，而生五行，五行之气顺布，便有了四季的运行。阴阳二气与五行的交感凝合，化生天地间万物。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与万物化生论的思想渊源于道教。周敦颐之后，在五行观上有所阐发的是王安石，王安石也认为是阴阳两气变合而生五行，阴极而生寒，

寒生水；阳极而生热，热生火；阳动以散而生风，风生木；阴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这五种物质元素相互作用，千变万变，构成了世界万物万象。

在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那里，五行仍然具有其物质性。朱熹说：“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天地生物，五行独先，何事而非五行，七者袞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既是生物的材料，其生物的过程便是：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天体地质由五行生成，人也同样是阴阳五行之气的作品，“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人的精神品质，是由所禀的阴阳五行气质决定的。阴阳调和，五气全备，就成为圣人。偏重不全，就在精神品质上有偏至。这种气质影响人的性情、资质、以及社会地位、寿命长短等。朱熹的这种说法为星命术数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的五行学说虽然肯定了五行的物质性，但他又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不依赖于物质世界而独立永恒存在的“理”，它才是物质世界的根源。五行从属于理，体现着理。因此朱熹的五行学说最终被纳入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至于他关于人体阴阳五行气质决定了人一生的前途命运的说法，则更是唯心臆测了。

走向唯心臆测的五行观，到明清时便遭到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清算。王廷相的批判重点在于五行生克与五行对应

结构中的非理性成分。针对“金木之气生人”的观点，王廷相说：“仆尝谓天地之间无非气之所成。故人有人之气，物有物之气，则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如五金有五金之种，草木有草木之种，各各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王廷相在这里指出，人与物（金、木）的物质构成是两不相干的事情，金木生人说是没有道理的。至于五行配四时，更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谬论，王廷相质问道：“春止为木，则水火土金之气孰绝灭之乎？秋止为金，则水火土木之气孰停留之乎？”五行与四时的配置原本是主观类比的产物，对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深层的联系，这是五行家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王夫之比王廷相更进一步，他在批判了五行说中的神秘术数色彩后，指出：五行就是五种物质元素，它们相资为用，各有其功利。“有木而后有车，有土而后有器，车器生于木土，为所生者为之始。”但是，仅有五行是不足以化生万物的，譬如鸟兽虫鱼都不资于火和金，所以五行在化生之时也有其局限性。

综上所述，五行在宋代以后的哲学史上，始终保持了它的物质属性，但它被宋明理学纳入唯心主义体系，被看作是理的产物，受理所主宰。至明清时经进步思想家们的辩证，它才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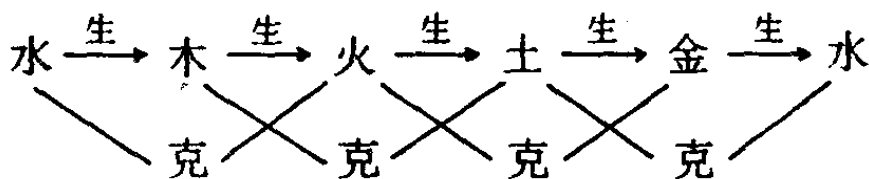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五行原理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两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兰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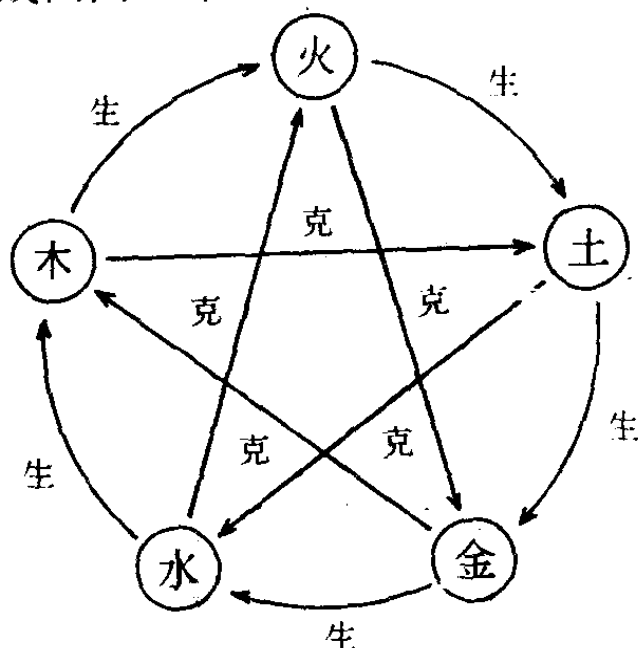
#### 一、五行的生克制化抑扶

作为一种学说体系，五行哲学有自己的一系列原理。这些原理既对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它又被传统科学和传统神学术数借作理论基础，在同一台历史剧中身兼正反二种角色，传统科学和神秘术数在流传发展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因此，古人不加区别地统称之为术数。

五行原理中最基本的是五行生胜学。仔细分析五行相生的序列，我们不难发现“五行相生，隔一致克”的规律，用图来表示即：



将五行生克排成圆圈，即：



从上图可以看出，将五行生克直线排列是一个平行稳定的模式，图形排列，生是无始无终的循环，克是一条不断重复的五星运行路线。

在五行生胜说的基础上再深入，人们发现五行之间还存在相制相化的交互作用。所谓相制即通过相生来制服克我之物，如金能克木，但木能生火以制服金；火能克金，但金能生水克火；水能克火，但火能生土制水；土能克水，但水能生木克土；木能克土，但土能生金制木。这是一个克服与反克服的循环，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生物链。所谓相化，即通过相生之物来解化相克之物的矛盾，如金克木是一对矛盾，但金通过生水，水能生木，来解化金与木的对立立场；水克火，但水能生木，木能生火，故木能调解水火的对立；木克土，但木能生火，火能生土，故火便充当了木与土之间的调解者；火能克金，但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土便是火金矛盾的化解者；土能克水，但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故金又化解了土与水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所克者实乃我所生者之子，所

以我与我克者又存在一种间接的依存关系。

除了相制相化外，古人还将五行的相生比作母子，如土生金，则土是金母，金是土子，按照封建的人伦关系，儿子对母亲有孝养顺从的义务，母亲对儿子有教育训抑的权利，故子行遇母行则处于被抑制的地位。在五行中，凡相生也相抑，木抑火，火抑土，土抑金，金抑水，水抑木。反过来，如果母行遇到子行，则可得到儿子的扶助，水生木则木扶水，金生水则水扶金，土生金则金扶土，火生土则土扶火，木生火则火扶木。扶者吉而抑者凶。当然，封建伦理讲求父慈子孝，父母对儿子的训诫虽抑而应无害，故母行处于王相季节，则表示父母尚健在，对儿子的训抑是正道而无害，如果母行处于囚死的季节，则为鬼神，鬼神作祟而有害。

进一步追寻，五行之间还可以寻出更复杂的关系。比如水克火，火克金，置金于水火之间则相济；木克土，土克水，植木于水土之间则相资；火生于木而焚木，金生于土而锄土，木克土而土养木，土克水而水泽土，相生中有相克，相克中有相资。金虽受克于火，但金无火炼，不能成器，因此，人们把金与火这对冤家又比作互相依存的夫妻，夫主妻从，金顺火制，故火为金夫。同样，木受金伐，但木离开了金的砍削制造，也不能成材。因此，木遇金虽然受制，但又不见得是件坏事。

五行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客观世界万物对立统一、依存转化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生生不息、新陈代谢、千变万化的运动过程。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就像金不伐木，木不成用，火不炼金、金不成器一样。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

行之气在起作用。天生万物正是想使万物相为用，故不得不使相克相害。王充的这段话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均衡的状态，才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

五行生克制化思想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性，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当然它所提供的万物发生论与宇宙变化论是以经验为基础，包含了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因而，它一旦被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所利用，其辩证唯物思想的光芒便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反而成为神秘术数的理论支柱。

五行生克制化的思想在几千年的流传中，已经深刻地嵌入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古人不仅用它来解释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而且还被运用到许多具体事物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以小说《红楼梦》为例，贾宝玉本是一块补天不成的石头，在五行属性上属金。林黛玉则是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因生得十分娇娜可爱，被宝玉日以甘露灌溉，遂脱了草木之胎，幻化成人形，因此，黛玉的本性在五行上属木。薛宝钗名为宝钗，钗属金，同时，她也有道士所送玉石一块，因此，薛宝钗与宝玉同类为金。从五行属性上看，宝玉和黛玉是金克木，注定不能成眷属。而宝玉与宝钗五行属性相同，同类为比肩，虽然可以结合，但总免不了相斥的一面，故也难以合谐。作者在安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命运时，显然参照了五行生克的原理来设计，以昭示他们之间的情缘纠葛实乃命定。

古人还偏爱用五行相生来命名，如明代皇帝从明成祖朱棣到明思宗朱由检，十五任十一代无不是按五行的偏旁部首

来命名：

朱棣（木）—朱高炽（火）—朱瞻基（土）—朱祁镇（金）—朱见深（水）—朱祐樞（木）—朱厚照（火）—朱载堉（土）—朱翊钧（金）—朱常洛（水）—朱由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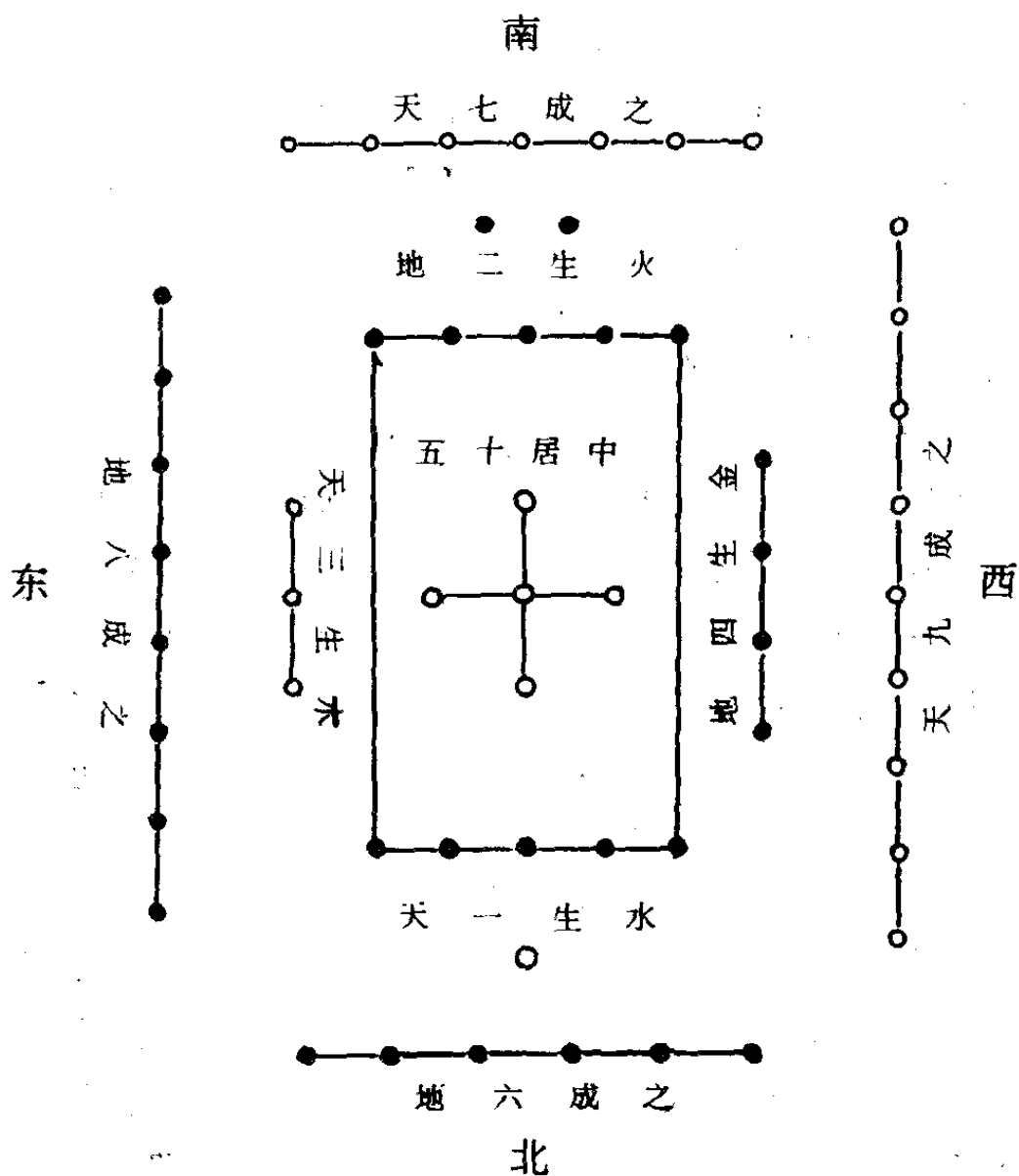
朱氏皇帝的命名透露他们的心声，他们希望借五行的相生来达到朱家皇位代代相传、世世昌盛、传至万世的愿望。皇家如此，民间同样想沾五行相生的吉祥，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祖孙五代也是严格按五行相生之义取名：

朱松（木）—朱熹（火）—朱塾（土）—朱鉴（金）—朱潜（水）

以五行相生取名，其潜台词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后代生生不已，繁衍昌盛。它表明，五行生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心态，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意识中。

## 二、五行的生数成数

五行生成数是以河图、洛书为依据的。河图、洛书一直被古人看作是神书，称为天苞，地符，它的图案数理相当高深（当然也可能是故弄玄虚），以河图为例：



图中以白圈为天为阳，黑点为地为阴，白圈黑点的数字奇偶配合，其分布为：

一与六共宗居下为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二与七为朋居上为南方，因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三与八为友居左为东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与九同道居右为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与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河图中，将一、二、三、四、五称作五行的生数，在五数的基

础上可以生出千数万数,故生数为主居于图内。生数用阴阳来配偶,导出五行的成数,方法是将生数加中数五便为成数,故成数为配居于图外。土的生数是五,居中为主,五行皆得中五土而生成万物,所以土居中宫以象太极临御四方。一为北方水,是阳气开始发生的地方,生数一加中五为成数六,有生必有成,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样水中既有阳数一,又有阴数六,阴阳奇偶配合,表明水乃阴阳二气交感而成。二为南方火,是阴气开始生起的地方,生数二加中五为成数七,也是由阴阳配合而成,即“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三为东方木,是日出的地方,在这里阳气逐渐增长起来,生数三加中五为成数八,阴阳配合为木,即“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为西方金,是日落的地方,这里阴气渐长,生数四加中五为九,金中也包含了阴阳二气,即“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中央土生数加中五得成数十,即“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五行生、成数用数字来表现宇宙的形成和生命的产生经历了生与成的两个过程,奇数所代表的是天,是阳,偶数所代表的是地、是阴。天地氤氲,阴阳冲气交和,生成万物。将五行生成数相加,天数(奇数)是二十五,阴数(偶数)是三十,天地数合起来是五十五。五十五数包括了天地自然之数,天地万物尽在其中。洛书表现的五行生成数与河图一样,只是在方位上的设置略有不同,这里就不赘述了。

### 三、五行与天干地支

五行与干支的关系十分密切,古人很早就将五行与干支相配,使干支具有与五行相同的属性。

干原是古人用以纪日的单位,支是古人用以纪月的数据。

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干支又分别称为天干和地支。

天干有十个，它们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有十二个，它们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古人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六十为一周期，称为六十甲子，即：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  
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  
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推而无穷。干支组合纪日的方法在商代已经完成。后来人们还用它来纪年。六十年一个循环，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地支用于纪月和纪时。用以纪月则以冬至所在的月为子月，依次下推，与农历对照，十二地支月分别为：

月份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地支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地支纪时则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古人把半个时辰称为“小时辰”，也就是现在的“小时”。子时始于夜里 23 点至次日 1 点，依次类推为：

十二时辰：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现代钟点：23-1、1-3、3-5、5-7、7-9、9-11、11-13、13-15、15-17、17-19、  
 19-21、21-23、

古人用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来解释天干地支的命名。所谓干者即树木主干，处于主导地位，十天干中，甲象嫩芽破壳出土；乙为幼芽抽轧，柔软弯曲；丙象炳阳，阳光充沛；丁象木成长壮大；戊象草木茂盛；己为成熟；庚为果实已收，更待来年；辛为新的生机开始酝酿；壬为新的生命孕育；癸为宿根待发，幼芽已孕育成形。地支犹树的分枝，处于枝辅地位。子意味着生命孳萌；丑为幼芽曲伸将要冒出地面；寅为生机寅然；卯为生长渐茂；辰为茂实之状，巳为阳气盛壮；午为阴阳相交，孕育果实；未为果实初成；申为收获；酉为阴盛阳衰，万物衰老；戌为生物尽收；亥为阴盛于外，阳藏于内。这样，干支就不仅是抽象的纪时单位，而且意味着宇宙万物生化的秩序和过程。

将天干与五行搭配，它们的对应关系是：

木	火	土	金	水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再加入阴阳概念,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则甲为阳木,乙为阴木,丙为阳火,丁为阴火,戊为阳土,己为阴土,庚为阳金,辛为阴金,壬为阳水,癸为阴水。由于五行在天干上阴阳刚柔不同,古人作了如此的区别:

甲木——栋梁之木  
乙木——花果之木  
丙火——太阳之火  
丁火——灯烛之火  
戊土——城墙之土  
己土——田园之土  
庚金——斧钺之金  
壬水——江河之水  
癸水——雨露之水

地支与五行相配,有两套系统,第一系统的配法是:

木	火	金	水	土
寅卯	巳午	申酉	亥子	辰戌丑未

这个对应系统就没有按照地支之序来排列,也不完全按地支纪月法农历建寅之月的顺序,古人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地支也同样有奇偶阴阳之分,其中子、寅、辰、午、申、戌属阳,是阳支;丑、卯、巳、未、酉、亥属阴,是阴支。

地支的第二套系统的配法是:

木	火	金	水	土
---	---	---	---	---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辰戌丑未

这里寅是初生之木,卯是极盛之木,辰是渐衰之木。巳是初生之火,午是极盛之火,未是渐衰之火。申是初生之金,酉是极盛之金,戌是渐衰之金。亥是初生之水,子是极盛之水,丑是渐衰之水,而辰、戌、丑、未四支不仅属衰木、衰金,衰水、衰火,同时又都属土,而且还是四库,丑本是衰水,水由金生,故丑又是金库,生亥子(水)而克寅卯(木);辰为水库,生寅卯(木)而克巳午(火);未为木库,生巳午(火)而受金(申酉)克;戌为火库,克申金而受水(亥子)制。这样,辰、戌、丑、未又称杂气。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地支中,每支还包含着与之相对应的天干之气,作为本气,有的还包含着其它与之相生相克的天干之气,如丑土,除了本气巳土外,由于土生金,土克水,故丑土中又包含了辛金和癸水;寅木中除了本气甲木外,还有木所生的丙火和木所克的戊土。对于地支所藏本气和其它天干,有一首歌诀如下:

子宫癸水在其中,丑癸辛金巳土同。  
寅宫甲木乘丙戊,卯宫乙木独相逢。  
辰藏乙戊三分癸,巳中庚金丙戊丛。  
午宫丁火并己土,未宫乙巳丁共宗。  
申位庚金壬水戊,酉宫辛字独丰隆。  
戌宫辛金及丁戊,亥藏壬甲是真踪。

将歌诀变为表格,看起来就更清楚些: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	---	---	---	---	---	---	---	---	---	---	---	---

所含本气	癸水	己土	甲木	乙木	乙木	丙火	丁火	乙木	戊土	辛金	丁火	壬水
其它天干之气天干		辛金	丙火		戊土	戊土	己土	丁火	庚金		戊土	甲木
		癸水	戊土		癸水	庚金		己土	壬水		辛金	

地支与五行相配的两套系统,分别为不同的术数所用。

天干地支与五行相配,赋予了干支以五行的功能,五行所具有的属性干支也全部具有,这种天干地支和五行的正规配合,称为“正五行”。

#### 四、五行与四时五方五色

五行与四季相配,也有两种配置方法,其一是在夏的后面增加一个季夏,形成木主春,火主夏、土主季夏,金主秋,水主冬的对应。其二是将春夏秋冬四季之末的 18 天分割出来(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的各 18 天),由土来统属,这样一年 360 天被分为五等分,五行各主 72 天。

五行在自己所主的时间里处于“旺”的状态,而在其它时段里分别处于“相”、“休”、“囚”、“死”的状态,这就是五行的“旺相休囚死”。

什么叫旺、相、休、囚、死呢?旺即处于旺盛状态;相即处于次旺状态;休即休然无事,即将退休;囚即衰落被囚,死即被克制而生气全无。

由于五行与四时有两种配置方法,因而它的旺相休囚死的对应也各有不同,下面用两种表格分别表述。

	木	火	土	金	水
春	王	相	死	囚	休
夏	休	王	相	死	囚
季夏	囚	休	王	相	死
秋	死	囚	休	王	相
冬	相	死	囚	休	王

	木	火	土	金	水
春	旺	相	死	囚	休
夏	休	旺	相	死	囚
秋	死	囚	休	旺	相
冬	相	死	囚	休	旺
四季	囚	休	旺	相	死

表中的季夏即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四季则表示四个季节末尾的18天。上面这两个表格虽略有不同，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令者旺，我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以木为例，春天是木当令的季节，所以木旺；木生火所以火为相；木被水所生，所以水休；木被金克，然木正处强旺之势，金已无力克伐，所以金被囚在一旁；木克土，土在强敌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了。其它都依次类推。

由于干支也具有五行的功能，故干支在四季中也有旺相休囚死，其情况如下图：

	王	相	休	囚	死
春	甲乙寅卯	丙丁巳午	壬癸亥子	庚辛申酉	戊己辰戌丑未
夏	丙丁巳午	戊己辰戌丑未	甲乙寅卯	壬癸亥子	庚辛申酉

季夏	戊己辰戌丑未	庚辛申酉	丙丁巳午	甲乙寅卯	壬癸亥子
秋	庚辛申酉	壬癸亥子	戊己辰戌丑未	丙丁巳午	甲乙寅卯
冬	壬癸亥子	甲乙寅卯	庚辛申酉	戊己辰戌丑未	丙丁巳午

五行与五方五色的对应为：春木东方，春天万木争荣，一片新绿，故木的颜色为青，太阳从东方升起，温暖由此而来，故木性温。夏火南方，南方天气炎热，骄阳艳艳，故火的颜色为赤，火性为热。秋金西方，西方太阳西沉，阴气始生，万木霜天，故金色白，其性凉。冬水北方，寒气从北方而来，水严峻深刻，故水色黑，水性寒。在五行中土位于中央，统御四季四方，地位最尊贵，土色黄，性味平和。

五行与季节、方位、颜色的配合，在神秘术数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后面的具体术数中我们将要谈到。另外，这种配合对我国的民俗也有很大影响，如土在五行中为尊，故土的黄色被用作皇帝的专用服色。因为夏天万物生长茂盛，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故红色为喜庆的吉服。秋天和冬天是万物衰老，死亡的季节，故民间的丧服从白从黑。至于春天的绿色被用作生命的象征，其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 五、五行寄生十二宫

五行寄生十二宫实际上就是将天干中的五行放到十二地支月中，看每个具体的五行在十二个月中从生长到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分为十二个阶段，称为十二宫，即：

**绝：**又叫受气或胞。“以万物在地中，未有其象，如母腹空空，未有物也”。

**胎：**就是受胎。“天地气交，氤氲造物，其物在地中萌芽，始有其气，如人受父母之气也”。

**养**:就是成形。“万物在地中成形,如人在母腹成形也”。

**长生**:即生长。“万物发生向荣,如人始生而向长也”。

**沐浴**:又叫败。“以万物始生,形体柔脆易为所损”。

**冠带**:喻人或物初步长成。“万物渐荣秀”,人已冠带行成人礼。

**临官**:人或物处于事业初成始而成用的阶段。“如人之临官”,进入仕途。

**帝旺**:达到荣华富贵的顶点,“万物成熟,如人之兴旺”。

**衰**:开始下滑。“万物形衰,如人之气衰也”。

**病**:衰而至病。“万物病,如人之病也”。

**死**:终结。“万物死,如人之死也”。

**墓**:归于库墓。“以万物成功而藏之库,如人之终归于墓”。

以甲木为例,它在亥月初生,故寄居长生宫,在子月处沐浴宫容易受损败之地,在丑月渐荣秀,在寅月至临官趋于成熟,是甲木最好的时节,在卯月甲木便运行至帝旺,是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甲木便依次进入衰病死墓绝胎养各宫,然后顺次轮回。

五行寄生十二宫的具体情况可参看下表:

十 宫	干 支	五阳干顺行					五阴干逆行				
		甲木	丙火	戊土	庚金	壬水	乙木	丁火	己土	辛金	癸水
长生	亥	寅	寅	巳	申	午	酉	酉	子	卯	
沐浴	子	卯	卯	午	酉	巳	申	申	亥	寅	
冠带	丑	辰	辰	未	戌	辰	未	未	戌	丑	
临官	寅	巳	巳	申	亥	卯	午	午	酉	子	
帝旺	卯	午	午	酉	子	寅	巳	巳	申	亥	
衰	辰	未	未	戌	丑	丑	辰	辰	未	戌	
病	巳	申	申	亥	寅	子	卯	卯	午	酉	

死	午	酉	酉	子	卯	亥	寅	寅	巳	申
墓	未	戌	戌	丑	辰	戌	丑	丑	辰	未
绝	申	亥	亥	寅	巳	酉	子	子	卯	午
胎	酉	子	子	卯	午	申	亥	亥	寅	巳
养	戌	丑	丑	辰	未	未	戌	戌	丑	辰

古人忌讳物尽极端，因为旺极则衰，所以在十二宫中，最有发展前途，方兴未艾的是“临官”宫，天干五行行至临官，便称“坐禄”。而处于旺盛顶峰的“帝旺”宫，反因预示由盛转衰而成为不祥之地了。

## 六、天干地支的刑冲害化合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天干地支与五行相配，也就具备了五行的功能。五行千变万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古代术士们为了高深其术，又在天干地支中派生出刑、冲、害、化、合，使五行的演变更为复杂化。

刑就是彼此刑妨，互不相让，它主要发生在十二地支中，十二地支共有三刑，即：子卯相刑，寅巳申相刑，丑未戌相刑。子水卯木本应相生，为什么反相妨碍？寅木巳火申金、丑土未土戌土之间为什么失和？我们也不得而知其中究竟。但是，刑并不一定是不吉之兆，在算命术中，君子得刑为吉，小人得刑为凶，所谓“君子不刑定不发，若居仕途多腾达。小人到此必为灾，不然也被官鞭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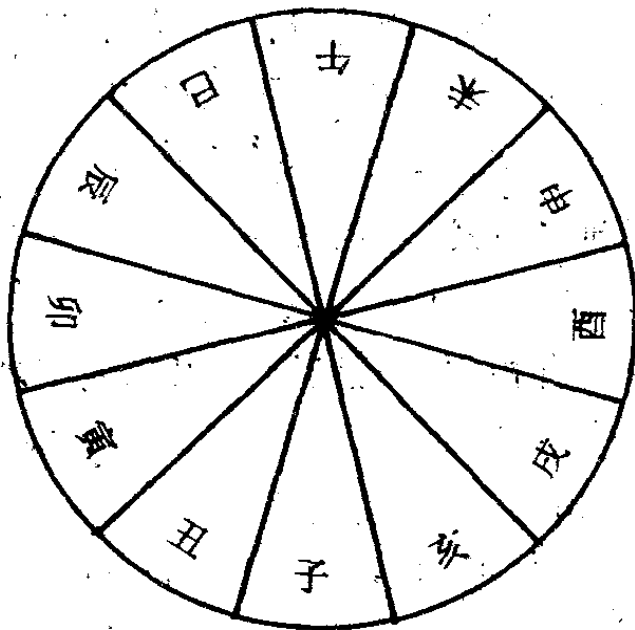
冲即二气对冲而有相犯。它同时发生在天干地支中。天干相冲的有甲庚、乙辛、壬丙、癸丁四对。它们相冲有三条理由，其一是它们五行相克，甲木受克于庚金，乙木受克于辛金，壬水被丙火克，癸水被丁火克。其二是它们方向上相对，东甲

西庚、东乙西辛，北壬南丙，北癸南丁，方向对立，性质截然相反，所以对冲。而天干中丙庚、丁辛虽然彼此间有相克的关系，可是丙居南庚居西，丁居南辛居西，方向并不相冲，所以只克不冲。其三是它们同性相斥，甲木庚金都属阳，乙木辛金俱属阴，壬水丙火都属阳，癸水丁火俱属阴，阴阳各不相让，不比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即使相克，然而克而不冲，是可以化合而成夫妻的。

十二地支相冲有六对，即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对冲的排列规律是每隔六位相冲。故称作六冲。六冲的原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将十二地支分为前六支属阳，后六支属阴，阴阳相冲，即：

阳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对冲						
阴支：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另一种说法是，六冲从方位上说相对。见下方位图：



而六冲的五行不是相克便是相重，如子水克午火，寅木受申金克，卯木受酉金克，巳火被亥水克，丑土与未土重，辰土与戌土重，相克固然不好，相重也陷於偏枯。从六冲的阴阳属性来看，奇阳偶阴，则子午俱阳，丑未双阴，同性互相排斥，故发生冲激。

害即相互损害。在十二支中，相害者也有六对，即子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酉戌相害。六害与人伦中的六亲相比附，主六亲上有损克。以辰卯为例，辰在五行中为土，卯为木，木生火化为土，它们在六亲中的人伦关系是夫妻。但在十二支中戌也属土，戌作为第三者插足，与卯配为情人，所以辰与卯便翻目成仇，是妇奸外夫的象征。寅与巳为什么相害呢？寅为木，巳为火，木生火，寅与巳为母子。但火为金夫，火巳与金申结婚后，金申克寅木，媳妇克婆母，被看作是下克上的象征。未与子相害，未属土，子属水，土能克水，君能制臣。古人对五行十二支相害的解释虽然牵强，但它也说明了一些道理，在五行的化生中，往往相生不必生，相害不必害，相生反相害，相害反相生，统一与对立总是在不断的转化。

化就是解化矛盾，使之和平共处。化主要发生在十天干中，天干相化有五种情况：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土；丁壬化木；戊癸化土。这五对天干中的五行都相克，但它们通过调解，却化合为和谐的夫妻。以乙庚化金为例，东方甲乙木最怕西方庚辛金来克，故甲木兄便将乙木妹妹嫁给阳金庚做夫人，这样便化干戈为玉帛，化仇为亲了。化的条件就是合，对立者撮合到一起，结成统一战线，便达到化而使之合谐的目的了。

合者即阴阳二气相和。它存在于十二地支中。十二地支有六合和三合。六合者，即子丑合土；寅亥合木；卯戌合火；辰

酉合金；巳申合水；午未为太阳太阴。十二地支阴阳两两相合，组成土木金火水和太阳太阴的新系列。三合者，即申子辰合水；亥卯未合木；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三合在五行中没有土，因为水、木、火、金四行都要依赖土才能形成格局，所以三合中每一组都有一个土，如辰、未、戌、丑，合成土局，使水木火金都归藏于土。

干支五行演化出如此多的条规，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讲不出很充足令人信服的道理，故在古今术士中有许多不同意见，认为所谓“刑”“害”之流乃无义穿凿，不足为凭。

## 七、纳音五行

在神秘术数中，除了干支五行（又称正五行）外，用得比较多的还有纳音五行。音即五音：宫、商、角、徵、羽。与五行相配，土为宫、火为徵、水为羽、金为商、木为角。古人认为，音由人心所感而发，听其声知其音，知其音便晓其好恶，晓其好恶便了解其为政的治乱。宫为君，宫声乱则君荒淫骄奢；商为臣，商声乱则臣道败坏；徵为政事，徵声乱则政事纷乱；羽声象征财物；羽乱则财力匮乏；角为民，角乱则民怨；五音不乱则天下和平。这种说法牵强附会，没有道理。

古人为了补充术数中仅用正五行的不足，将五音与六十甲子相配，组成新的五行系统，称为纳音五行。其配合的方法是把六十甲子和五音十二律结合起来，其中一律含五音，总数为六十。但这个方法比较复杂，比较简单的配合方法是，按金火木水土的顺序反复排列，每隔三字剔除一字，形成：金火木（水）土金火（木）水土金（火）木水土（金）火木水（土）……，然后与六十甲子配套，每字统属两个干支日，即甲子乙丑金、丙

寅丁卯火、戊辰己巳木、庚午辛未土……。五行之中，干支各有分工，干寓其气，支寓其位，气的始壮盛衰不同，位的生养死绝不一，故六十甲子中便有了不同程度和品位的金木水火土。对此，古人有个歌诀加以区别：

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炉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  
庚午辛未路旁土，  
壬申癸酉剑锋金，  
甲戌乙亥山头火，  
丙子丁丑涧下水，  
戊寅己卯城头土，  
庚辰辛巳白腊金，  
壬午癸未杨柳木，  
甲申乙酉泉中水，  
丙戌丁亥屋上土，  
戊子己丑霹雳火，  
庚寅辛卯松柏木，  
壬辰癸巳长流水，  
甲午乙未沙中金，  
丙申丁酉山下火，  
戊戌己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灯火，  
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甲己酉大驿土，  
庚戌辛亥钗钏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  
甲寅乙卯大溪水，  
丙辰丁巳沙中土，  
戊午乙未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  
壬戌癸亥大海水。

对于纳音五行为什么这样搭配，前人也有解释：

甲子乙丑海中金，

子属水，又为湖，乃水旺之地，加之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金死，所以是“海中金”。

丙寅丁卯炉中火，

寅为三阳，卯为四阴，火既得位，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时天地开炉，万物始生，所以叫“炉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

辰为原野，巳为六阳，木至六阳则枝叶繁茂，以繁茂之林木而生于原野之间，所以称为“大林木”。

庚午辛未路旁土，

以未中之木，生午未之火，火旺则土于斯受刑。土之所生，未能自物，犹路旁土也。

壬申癸酉剑锋金，

以申、酉金之正位，兼临官申，帝旺酉，金即生旺，则诚刚矣，刚则无过于剑锋，所以名为“剑锋金”。

甲戌乙亥山头火，

以戌亥为天门，火照天门，其光至高，所以称作“山头火”。

丙子丁丑涧下水，

因为水旺于子，衰于丑，由旺而衰，难以成江河，所以称作“涧下水”。

戊寅己卯城头土，

天干戊、己属土，寅为艮山。土积为山，故为“城头土”。

庚辰辛巳白腊金，

金养地在辰，长生于巳，其形质初具，未能坚利，所以名为“白腊金”。

壬午癸未杨柳木，

木死于午，墓于未，甲木既已死墓，虽有天干壬癸之水相生，也只能是柔木，所以说是“杨柳木”。

甲申乙酉泉中水，

金临官申，帝旺于酉，金立于旺盛之地，水自然得生，但水于方生之际，一时还不洪大，故称作“泉中水”。

丙戌丁亥屋上土，

丙丁属火，戌亥为天门，火既炎上，土则生于上，故称为“屋上土”。

戊子己丑霹雳火，

子属水，丑为土，水居正位，而在纳音五行中它们又都与火相配，成为水中之火，是龙神手中的“霹雳火”。

庚寅辛卯松柏木，

木的临官在寅，帝旺在卯，木气正旺，所以称为“松柏木”。

壬辰癸巳长流水，

辰为水库，巳为金的长生之地，金能生水，又逢水库，泉源不断，故称之为“长流水”。

甲午乙未沙中金，

午为火旺之地，火旺则金败，未为火衰之地，火衰则金冠带，败而冠带，金力不足，只能是“沙中金”。

丙申丁酉山下火，

申为地户，酉为日入之门，太阳之火到此光辉敛藏，故名之为“山下火”。

戊戌己亥平地木

戌为原野，亥为生木之地，大木生于原野，称为“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丑虽土家正位，而子乃水旺之地，土见水多则流，只得称为“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寅卯为木旺之地，木旺则金羸，加之金绝于寅，胎于卯，此时金气无力，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灯火，

辰为食时，巳为隅中，日之得午，艳阳之势光于天下，故比之为“覆灯火”。（另一种解释是辰土掩覆，故称覆灯火）

丙午丁未天河水，

丙丁属火，午为火旺之地，然水从火出，阴阳之根，非银河不能如此，故谓之“天河水”。

戊申己酉大驿土，

申在八卦为坤，坤为土；酉在八卦为兑，兑为泽，戊己之土加在坤兑之上，非浮薄之土可以同日而语，所以叫“大驿土”。（另一种解释为戊土病于申，己土长生于酉，都是休养歇息之地，故称为“大驿土”。）

庚戌辛亥钗钏金，

金遇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当然柔弱，故命名为“钗钏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

子属水，丑为金库，水方生木，斧金伐之，就像桑柘木方生，便伐远扬，所以名为“桑柘木”。

甲寅乙卯大溪水，

寅为东方，卯为东方正位，川涧池沼由西东流，称为“大溪水”。

丙辰丁巳沙中土，

丙丁之火冠带于辰，临官于巳，火来生土，尚未大旺，所以说是“沙中土”。

戊午己未天上火，

午为火旺之地，未中之火又复生之，火性炎上，又逢木库助之，故喻为“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

申为七月，酉为八月，这时木气已绝，只有石榴木结果，所以名为“石榴木”。

壬戌癸亥大海水。

水冠带在戌，临官在亥，水力雄厚，所以称作大海水。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纳音五行中，五行与六十甲子的排列组合并没有什么依据，对它的解释也多有牵强。故《性理会通》中便说，纳音五行甚无道理，“疑末世术家猥琐之所为也”。但纳音五行直接与六十甲子相配，每甲子的五行属性一目了然，使用起来也很方便，故在神秘术数中应用十分广泛。

## 第四章 五行与政治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南唐·李煜

### 一、五行与灾异

五行与灾异联袂，其中介是“天人感应”思想。古人将木金火水土五行与人君貌、言、视、听、思五事相联系，凡人君在五事上有缺失，五行相应失和，天就会降灾异来予以谴责。

以《汉书·五行志》为例。《汉书·五行志》认为，人君的貌不恭则伤木气，木性曲直，可规可矩，君主的外貌也应有节有度。君主貌无威仪，在上无威，在下无敬，臣不敬君则阴气胜，木气受伤则生木之水过剩，于是上天会以常时间的降雨来表示惩罚，常雨饥寒至，则民心不稳，会出现鸡祸，龟孽，社会风气发生变化。

《汉书·五行志》举例说，鲁桓公十三年，楚国派大将屈瑕去讨伐罗国，大夫斗伯比去送行。斗伯比在回来的路上对驭手说，屈瑕此行必败，因为他举止失重，心不沉稳。斗伯比立即驱车去见楚君，告诉他这些情况，楚君派赖人去追屈瑕，没有赶上。结果，屈瑕因轻敌不设防备，被罗国军队击败，屈瑕也自缢而死。应该说，斗伯比的分析是对的，屈瑕在出师之时，已表现

出趾高气昂，浮躁轻敌的情绪，所谓骄兵必败是也。但到了汉代班固手中，便将之与貌不敬伤木的神秘意识联系起来，这就使本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偏离了客观的轨道，进入了用唯心思想构筑起来的五行五事的因果模式中。

貌不敬伤木的庶征（气象表现）是恒雨。春秋时，鲁隐公因鲁桓公年幼，代而摄政，公子翬见隐公居位已久，便劝他正式即君位，隐公不许，翬惧而改变计策，遂与桓公合谋杀死隐公。恰好在此前三年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故刘向认为，这正是上天给予鲁隐公的预告，而隐公却不觉悟，终于在两年后被杀。

人的不敬，使五行中木受到伤害，除了气候出现异常外，动物也会有相应的怪异出现。首先是与东方木认同的鸡便有怪事发生，如雄鸡自断其尾，雌鸡变为雄等，应在人事上，则是佞臣秉政，女主专权。此外还有鼠异，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国有鼠衔着自己的尾巴在王宫的端门中舞蹈，燕王刘旦往视之，鼠舞如故。刘旦令下属以酒和干肉敬献祠之，鼠仍然舞蹈不休，一日一夜死。当月，燕王刘旦以谋反罪伏辜。于是这两件本没联系的事情，便被班固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燕王旦以下谋上，大为不敬，伤木之象，故天以鼠变来警告。

凡大室朽坏，城门自倾，大船自覆等现象，在《汉书·五行志》中，都被看作是金沴木，引起木变动的结果，它的起因仍是人事。《五行志》中记载说：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格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

古人的附会和想象能力，真非今人所能思议，他们用天人感应、五行灾异的思想去看问题，竟能很自然地将本不相干的事奇妙的凑合在一起，虽然没有道理，却能自圆其说。

《汉书·五行志》认为，言之不从是病金气。金性从革，可锻可治，人君也应可谏可说，从善如流，听得进批评意见。君主若刚愎自用，则失去民心，政令不行。表现在五行上是金气受伤，阴气不附和，阳气太旺盛，因而百谷受损，蝗虫为害，有犬祸，口舌之疾等。

病金气的庶征为恒阳，天大旱。鲁昭公十六年，昭公的母亲归氏死，昭公没有哀容，又在比蒲举行大型的田猎活动，晋国的大夫叔向评论道：“鲁有大丧而不废蒐，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亡惑容，不顾亲也。殆其失国。”这年九月，天大旱，于是班固便认为这是上天对鲁的惩罚。

金有所伤应在牲畜身上，便是犬祸。鲁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国人追逐疯狗，疯狗逃入华臣氏家，国人也追随进了华家。华臣氏的哥哥华阅为宋国的卿，华阅死后，华臣杀死华阅的家宰，霸占了嫂嫂。宋平公听说后，准备驱逐华臣，左师向戒劝谏道：“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宋平公这才罢休。华臣自此忐忑不安，这时见大队人马突然闯入他家，吓得慌忙逃到陈国去了。《五行志》说：“华臣炕暴失义，内不自安，故犬祸至，以奔亡。”

金受到伤害应在物上，便是玉石有变。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洶洶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行立起，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基。石立之处，有白鸟数千飞集其旁。这时便有一个喜欢谈天人感应的名叫眭孟的人出来说，这是当有庶人为天子的象征，结果被政府所诛

杀。昭帝死后，继位为皇帝的汉宣帝，的确曾流落民间，沦为平民。至于金属器物的自行毁坏或震动，则被《五行志》认为是木沴金，木气克金气的结果。

视之不明是病火气。火性炎上，光明照人，君主也应明辨奸贤，如果君主昏庸暗昧，有眼无珠，便损伤了火气，表现在自然界是冬天气温偏暖，夏日天气炎热，草木生长太过、相应就有虫灾、羊祸、目疾等。

《五行志》中例举了春秋至西汉以来冬日无冰的年份，并将之与人事行为相联系。火盛而草妖，树木植物便会出现异常现象。《五行志》举例说，汉昭帝时，上林苑中的一株大柳树原本折断倒扑在地，忽一日自行起立，再生枝叶，有虫在树叶上啃出“公孙病已立”的字样。汉昭帝后以英年去世，几经周折，由汉昭帝的侄孙，原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继承了皇位，是为汉宣帝。此外，《五行志》还记载了天雨草的异常现象，将之作为视之不明伤火气的天人感应现象。

听之不聪是病水气。水性润下，君主应体察下情，偏听偏信，下情阻塞便会伤害水气，自然界就会气候寒冷，不生百谷，有猪祸，耳病等。

《五行志》举秦为验。秦始皇即位时年龄尚幼，委政于太后，太后淫于吕不韦和嫪毐，封嫪毐为长信侯，参与国事。秦始皇加冠亲政后，嫪毐作乱，始皇平定叛乱，斩首数百级，大臣二十人皆车裂示众，夷灭宗族，迁四千余家至房陵。这年四月雨雪、天寒地冻，民有冻死者。这便是听之不聪病水气的天象。

水气受伤便有豕祸。春秋时，齐襄公与妹妹鲁桓公的夫人私通，派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又杀死公子彭生向鲁道歉。后齐襄公在贝丘狩猎，见到一野猪，从者说是公子彭生的化身，

于是齐襄公发怒要射杀之。野猪像人一样立起身来嚎叫，齐襄公吓得从车上掉下来，脚部受伤，鞋子也掉了。不久，公孙无知率领怨恨齐襄公的人攻打齐襄公于狩猎时的住所，齐襄公藏在门背后，脚从门下露出来，被人发现，将之杀死。齐襄公荒淫无道，死是其罪有应得，但将之与水气受伤的豕祸连在一起，则没有道理。

思为五事之主，与五行之主土相配，土吐纳万物，万物归藏于土，相应君主的思想也应宽宏大量，包容臣下，如果君主偏狭刻薄，便是病土气，自然界会出现大风天气，有花为孽，有牛祸，有心腹之病。

鲁僖公十六年正月，宋国刮起了大风，有六只鹄鸟被大风刮得倒退飞行，经过宋都。《五行志》认为，这种现象应在宋襄公身上，宋襄公刚愎自用，不听司马子鱼的劝告，与楚国争夺霸主地位。此后六年，在宋楚泓之战中，被楚军俘虏。六只鹄鸟正好应六年之数。《五行志》的附会联想令人感叹。

秦文惠王初都咸阳，扩建宫室，南临渭水，北达泾河，“思心失，逆土气”，于是到秦孝文王五年时，便有人献上五足牛。刘向认为，这便是牛祸，“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将致危亡”。但秦并没有停止营建咸阳，后来又修阿房宫，耗费巨大财力人力，遂使民众怨声载道，起而反抗。牛生五足是动物的异常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是可以解释的，它与五事中的“思”，五行中的“土”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班固的《五行志》综合记载了谈天人感应、五行灾异的三家之言，即董仲舒、京房、刘向父子。三家之中，班固比较推崇董仲舒的观点。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说的与《汉书·五行志》略有不同。《春秋繁露》说，人君对臣下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木之气为风，故夏天多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

金气汇集化为霹雳，故秋天多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火气集而为电，故秋多闪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水气为雨，故春夏多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穡无收，土气受伤，秋天多雷。

古人对人君—→五行—→自然界灾异的认识是基于一种观象取类的联系比附基础上的，既无科学作依据，也无经验作依据，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主观臆测。如五行中的金与五事中的言相配，又与五畜中的犬相应，人君言不从则金不从革，会发生犬祸，对于金、言、犬之间除了在表象上有一点似是而非的联系外，它们内在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相应发生变化，古人是不去穷究的，事实上也无法穷究。

## 二、政治法律文化中的五行

作为中国人的思想律，五行很早便渗透到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尚书》中的夏书《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故“天用剿绝其命”，因违背五行而遭天刑。商书《洪范》则将五行作为九条安国大法之首。这些表明，五行文化很早便具有浓厚的政治法律色彩。

春秋至秦汉是中国法律文化阴阳五行化的重要时期，五行理论已被用于解释法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吕氏春秋》云：“刑罚不可偃于国，笞怒不可废于家。”国家不能没有刑罚，家庭不能没有呵斥和笞打。“故五刑之属三千，莫不本乎五行。”根据五行制定的刑罚，首先是五刑。《周书》曰：“因五行相克，而作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等。对于五刑与五行的关系，《五行大义》解释说：

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泆。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

五刑与五行生克理论相比附，为上古残酷的刑罚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进步，从汉文帝始，逐渐革去了肉刑，如剕、劓、宫等刑，而代之以鞭笞。但墨刑和大辟却流传下来；《水浒》中的武松，被刺配沧州，受张团练的陷害，不得不血溅鸳鸯楼，杀死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一千人，然后一走了之。在蜈蚣岭遇见张青夫妻，张青夫妇安排酒食送武松去二龙山宝珠寺落草，临行前，孙二娘要武松乔装打扮：

孙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处都有文书，出三千贯倍赏钱，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

于是张青建议在武松脸上贴两个膏药盖住金印，这个方法显然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只好依孙二娘之计，扮着一个头陀，把头发剪了，披下来遮住额上的金印。至于大辟——死刑，更是沿用至今，只不过行刑的方法越来越文明一点而已。

至迟在秦汉时，中国古代法律便已确定了春夏“省圜圉”“事毋刑”和秋冬“戮有罪，严断刑”的规定，实行秋冬行死刑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与五行四季相比附产生的。春夏万物生长，忌讳杀生。秋冬归藏，金性诛伐，水性严峻深刻，正与刑罚之意相同。秋冬行死刑一条在唐代被写入《唐律》，规定“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这一精神被唐以后的封建朝代所继承。

把五行理论引入政治法律领域，淡化了法律文化的政治

性和阶级性,更确切地说,是遮盖了封建社会法律的政治目的和阶级利益,为之披上了天道的外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

也就是说,王者的统治,国家的法律,都是效法天道,依据阴阳五行的特性制定的,它代表上天的意志,符合自然的规律,所以必须为人们所遵守,抗拒它便是与天意、自然相悖,受到法律的处罚,是天地所予的报应,必须毫无怨言地承受。五行学说嵌入政治法律,转移了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不满的视线,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封建统治者在实施具体的行动计划或策略时,往往还利用五行术数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北魏孝文帝为了实现南下迁都中原的计划,便召集公卿到清徽堂,向他们宣布南下伐齐的计划,并说:近来方术之士们都说,现在前往征伐,一定能够取胜。借助术数,魏孝文帝终于达到了南下的目的。在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拓跋焘时,南方边防守将上疏要求增加兵力,以抵抗南方刘宋部队的进攻。拓跋焘准备批准这一要求,被他的重要谋臣崔浩劝阻,崔浩分析天象说:

今兹害气在扬州,一也;庚午自刑,二也;日食昼晦,宿值斗、牛,三也;荧惑伏于翼、轸,主乱及丧,四也;大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事,先修人事,次尽地利,

后观天时，故万举万全。今刘义隆新造之国，人事未洽；灾变屡现，天时不协；舟行水涸，地利不尽。三者无一可，而义隆行之，必败无疑。

孝文帝和崔浩在这里都扯五行术数的虎皮来作大旗，为自己的意图张目。这在五行思想深刻地积淀于中国民众思想之中的时代，无疑起到争取人心的作用。这是心理战术在政治上的巧妙运用，所利用的正是人们对五行的普遍信仰心理。

封建王朝被推翻后组建的辛亥革命政府，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中国人对五行普遍信仰的顽强表现。1912年1月10日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决议，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五色正好与五行色吻合。决议对此进行了说解，之所以用五色旗是因为“中国习惯则‘五色’二字早已贯彻人民心理”。同年六月，就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公布决议，五色旗被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旗。所以，梁启超先生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说：“中华民国国旗实为此种观念（阴阳五行观念）最显著之表象”。

作为理论工具，五行学说既可以服务于封建统治，也可以为反统治者的人们所利用，它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和模糊性，给人们提供了随意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余地。而它在民众中的普遍信仰，又使它具有极大号召力。对立的对方都可以利用它来攻击对方，抬高自己。五行学说显然具有不利于统治者的一面，既要使它为己所用，又要防止它反戈一击，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便将五行学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利用五行学说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行为严惩不贷。东汉政府是一个迷信谶纬的政府，但它对那些不利于政府的预言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北魏时多次规定，禁止百姓“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术之

书”，违者要“以大辟论”。《唐律》把不利于统治者的阴阳五行言论和书籍统称为妖言妖书，对传播和制造者予以绞、徒、杖等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分别在《刑律》中设立“造妖书妖言罪”，“凡造讖纬妖书妖言及使用惑众者，皆斩。”这正是对五行学说的负面效应进行严格防范的措施。

### 三、思孟五行说

孔子的儒学传人子思、孟子，曾“案往旧造说”，建立了自己的五行说，此五行说遭到了荀况的激烈批判。荀况在《非十二子》中说思孟五行：

……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嚵嚵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思孟五行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荀况在这里没有提及，更遗憾的是，思孟们论及五行的著作，在辗转传抄中，被逐渐佚失，及至千年之后的唐代，杨倞在注《荀子》时，便感到要对思孟五行作个简短的注释，“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或许，这在当时只是一个一点即明的问题，故杨倞没有作更多的说明。

当历史的车轮再碾过千年，进入现代的门槛，关于思孟五行说又再度成为人们注目的问题。著名学者章太炎、梁启超旧案重稽，认为思孟五行说，不简单地就是五常，而且还含有君臣、父子等五伦的内容。刘节和顾颉刚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思孟与五行说的关系，认为是荀子乱点鸳鸯，错把邹衍的五行当作

孟轲的学说来批了，而孟轲又受业于子思门人，从而累及子思，受此冤屈。郭沫若不同意前两种说法，他认为“在思孟书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面，而五行系统的演化确实是存在着的。”思孟五行说就是“仁义礼智诚”。

由于缺乏材料证明，以上各家虽都言之成理，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关于思孟五行说的谜底，究竟谁家更接近于真相呢？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推动这项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甲本《老子》卷后佚书中，提到了四行和五行的问题。其四行是“仁义礼智”；五行是“仁义礼智圣”。佚书中的“仁义礼智圣”与汉儒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有所不同，但据学者考证，佚书中的“圣”，的确脱胎于《孟子》，思孟五行说就是“仁义礼智圣”。这里的“圣”的含义是“君子”品德，并不具有超人的意义。

但是，由于“圣”字逐渐被赋予了“超人”的意义，用“圣”作为道德教条去要求常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汉代的儒生们便将之改造成为“仁义礼智信”，用“信”取代了“圣”。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便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推出前台，成为封建政府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可见董仲舒的五常说，其前身便是思孟五行说。

思孟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有何关系？有学者认为，它是借鉴和改造了原始数术观念中的“五声昭德”说。用“礼乐生于仁义”的新观点，对西周思想文化遗产予以继承和改造。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五音与思孟五行说建立了联系。此种观点当可自成一家之言。

虽然思孟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的关系，限于资料，尚需存疑。但它的后继者，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与五行的联系却是昭然

纸上，他用五行来论证三纲，说：

天有五行……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  
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  
……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他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又将木火土金水与仁智信义礼相配，把仁智信义礼说成是木火土金水固有的品德。董仲舒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证明三纲五常的“天经地义”性，作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法规，既与神秘化了的五行宇宙构成图式相统一，那么道德观便与宇宙观结成了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系，否认这个道德观便是否认天道。

董仲舒的五常说确立以后，思孟五行说便被其取代，逐渐被人遗忘，以至后人在解释思孟五行说时，便直接用五常来注说。如东汉的郑玄在注孟子的《中庸》时，便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以此来暗示思孟的五行说，实则是对思孟五行说有所篡改。

## 第五章 五德终始说

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唐·刘希夷

### 一、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继思孟五行说以后，邹衍将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观，加进阴阳五行的内容，完成了五德终始说。它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同时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术数。

邹衍是战国末年齐国人，原以儒家学说求用于世，但不仅不被见用，且受到当权者的打击，在邹衍二、三十岁时，曾做过燕惠王的臣下，尽心尽力，反被燕惠王左右的人谗言陷害，燕惠王下令将邹衍系之于狱。据说，邹衍当时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邹衍仕途不得意，遂返回齐国。

在齐国，邹衍成为稷下学宫中的一员。较之中原其他国家，齐国的学术有其自己的特色。齐国原是殷民故地，周灭殷后，封姜太公治理齐，姜太公对殷民采取了“简其君臣礼，从其俗”的政策，殷人的五行思想得以承袭和发展，同时，齐学在发

展过程中,大量接受了南方道家思想,“修道术,尊贤智”,因而道家的阴阳观念为齐学所用,到邹衍时,稷下学宫的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列为齐学的重要内容。

邹衍以儒学于世受到打击,便转而接受稷下阴阳五行学说,将之与思孟学说的天人合一的唯心世界观、循环论的发展观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派,其主要内容是:

其一,完整地提出了五行相胜的系统,并用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他将五行之气说成是五种德性,五德按五行相克的顺序循环往复,而朝代的更迭正是在天意的作用下,按照这个循环运行。邹衍认为,人的各项活动都与五行相互感应、相互影响,人间每一朝代的统治者一定要居五行中的一德,并为上天显示的机祥符应予以提示或认可。当他所居的德衰落了,那么得居胜其德的另一德者就会起而代之,历史的改朝换代就是这样按五行相胜的秩序循环流转。五行向五德的转移,为朝代的更替提供了理论支点。为了引证自己五德终始说的正确,邹衍还对以前的历史按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解释,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邹衍的后学对邹衍这段话进行了更具体的发挥,《吕氏春秋·应同篇》说,黄帝时出现了大蚯蚓,蚯蚓土中所生,黄色,这是土德兴旺的象征,故黄帝朝是土德,尚黄,文物制度依照土的德性制定。夏禹将君临天下时,天降的瑞应是草木秋冬不死,这是木气盛的表现,草木色青,故夏禹尚青,文物制度依照木的德性制定。商汤取夏桀而代之,天先见金,这是金气旺的标志,金色白,故商朝尚白,文物制度依照金的特征制定。及商周更替之际,天先现火,赤鸟衔着丹书飞集于周人的社稷,这是火气胜的征兆,故周文王尚赤,文物制度按火的德性制定。将五德气化相克理论用于政治兴亡,邹衍在各诸侯面前确立了自

已政治预言家的地位。

其二，邹衍深观“阴阳消息”，依据古天文学中观察、验证的方法，把阴阳五行与天道四时相配合，强调自然界出现的一切灾异现象与人间朝代兴衰更替的直接联系，所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者兹。”由于邹衍的学说往往以“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方法，将人间的异常现象与政治治乱、天道四时扯在一起，显得神秘而迂大，故齐人称之为“谈天衍”。

其三，与五德终始说相配合，邹衍还提出了“大九州说”，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很明显，邹衍是在为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提供理论依据。

邹衍的以上理论其实用价值是，既然朝代是按五德循环流转，那么继周火德之后，必有一水德者取而代之，战国诸雄中，谁能应用水德政治制度，谁就能统一天下。这种理论在战国末年统一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功利幻想，因此，邹衍也时来运转，受到各国诸侯的隆遇。在齐国，齐王嘉之，为开第康庄大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去梁国，梁惠王亲至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去赵国，平原君侧行陪伴。到燕国，燕昭王手执扫帚为之清道，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拜邹衍为师。

但是，从本质上说，五德终始理论只是一种政治术数，而非治国安邦的治本良方，它虽能提出某种预言，但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这在当时强国正忙于吞并弱国，一统天下，小国正忙于保存自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情况下，政治重心是在得天下，而不是得天下的政治理由。故邹衍生前虽受到隆遇，但其理论并未被诸侯所用，“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对此《吕氏春秋》曾幽默地说，邹衍之术是函牛之鼎不能用于烹鸡。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后世影响深远。首先,从秦开始,历代王朝的建立都力图从五德终始说中寻找理论依据,其文物制度也根据各自所依据的德行来制定,因为五德来自天意,为了说明自己的君权来自天授,统治者们附会牵强五德五行,演出了一幕幕荒唐的闹剧,直到明代以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

其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儒家思想所兼容吸收,形成汉代的“天人合一”和谶纬说。《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的“天人三策”,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灾异谴告”为内容,其原始形式正是邹衍的机祥符应的思想。除了说明君权神授以外,董仲舒还利用天的意志通过自然界或人间的灾异来显现对君王的训诫的说法,来对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加以约束。董仲舒的学说完成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全面结合,推动了儒学向神秘化、谶纬化方向发展,原来具有理性主义光辉的儒家学派,至此蒙上了神秘主义的灰尘,此后的儒臣们大多都热衷于察机祥、候星气,根据天象的变化向皇帝提出行政意见。西汉成帝绥和二年,火星在心宿徘徊不去,这种星象在古代占星术中是皇帝将有死亡之灾的征兆。宰相府议曹李寻上书宰相翟方进,要求他牺牲自己以转移凶险。宫廷禁卫官贯丽,精明天文星象,也说大臣应代替皇帝,身当大祸。于是汉成帝召见翟方进,要求他自杀。翟方进回府后,还没来得及决断行动,成帝又赐册和牛酒,逼他立即自裁,翟方进此时除了死路一条,别无退路。实际上,不仅汉代有这样的悲剧,汉以后的各朝类似的悲剧一直作为正剧在不断的上演着。

其三,由于邹衍的学说具有过分玄虚、神秘的特征,它流入民间,为方士巫道术数所用。就连邹衍本人在后人的眼中也

成了具有神秘法术的超人。《列子·汤问》篇张湛注中说：“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邹衍吹律便能使大地回春，这个邹衍显然已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邹衍，而是被神化后的邹衍。《史记·封禅书》说：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遇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邹衍之后，燕、齐方士纷纷以方术干世，求得人间富贵，而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君主却也对此尊宠不绝。秦始皇多次派方士们入海求仙，汉武帝先宠李少君、文成等方士，后又宠方士栾大，封其食邑二千户，赐给他甲第、奴仆千人，金十多万斤，拜为五利将军，又将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汉武帝还亲自到五利将军家探望。栾大在数月间便身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但神仙毕竟是一种虚妄，秦皇、汉武耗费巨资求仙，结果都一样为方士所骗。五利将军虽然一时贵极人臣，但因其方多不验，被汉武帝以诬妄的罪名腰斩。神仙方术附会阴阳五行，在中国流传三千多年，所以梁启超说它是“二千年来迷信大本营”，不是没有道理的。

汉代儒学吸收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并对其“符应”“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理论上的缜密加工和完善，使合流后的儒学神学化和正宗化，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至于其五德流转的观点更成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 二、秦汉皇帝对德运的追寻

邹衍身后，秦始皇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在秦始皇着手建立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时，五德终始说便派上了用场。按照邹衍的预言，代周火德者水也，秦便以水德自居，其统一天下完全是顺从天意。为了寻找秦朝水德的瑞应，人们便把眼光上溯到距秦始皇两百多年的秦文公身上，秦文公有一次出猎，“获黑龙”，黑者水也，这便成为秦为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始皇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讨论帝号和改变文物制度。他更名黄河为德水；水德旺于十月，所以秦朝历法便以十月为岁首；水色黑，秦尚黑色，衣服旌旗之类纯用黑色；水的成数为六，秦的符信、法冠等皆长、高六寸，车宽六尺，驾车用六马，以六尺为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水气阴，主刑杀，水德的性格刚毅深戾，秦既以水为德，其政治便以酷刑苛法为特征。秦法中，弃灰于道上，便要处以斩手之刑，刑法极为苛严，致使秦朝“赭衣半道”，穿着囚服的刑徒占去了道路的一半，整个国家实际上成为一座大监狱。秦始皇遭到人们的反对也就成为必然。

秦始皇三十六年，火星运行至心宿便徘徊不前，这时刚好有颗陨星落在东郡，老百姓中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秦始皇知道后派御史追查此事，没人招认，于是就将陨石旁的居民尽行诛杀。这年秋天，朝中的使者从关东回来，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手持玉璧挡住使者说：“请替我把这块玉璧交给滹池君。”并预言秦始皇今年死。使者问其原因，这个人突然不见了。滹池君本是水神的名字，由于秦始皇自居水德，故以水神称之。使者将玉璧交给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府的人查看这块玉璧的来历，原来是秦始皇以前渡江时所沉的玉

璧。次年，秦始皇出游死于途中。秦朝不久也就崩溃了。

经过长期的逐鹿，汉王朝终于在秦朝的废墟中建立起来。在刘汉政权建立前后，刘邦对于自己所居德运颇为踌躇，有迹象表明，刘邦曾一度以火德自居，其原由来自于刘邦本人的神话。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诞生便不同凡响，他的母亲刘媪曾在大泽之陂小息，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刘邦的父亲前去寻找刘媪，见蛟龙卧于其上，已而刘媪便有了身孕，生下刘邦。后来刘邦做了亭长，押送刑徒去骊山，途中刑徒多亡，刘邦自度，到了骊山刑徒也逃得差不多，于是，他干脆放走所有刑徒，自己也从此逃亡隐居。徒中有十多壮士愿跟从刘邦，夜里，刘邦一行在大泽中走小径，走在前面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大蛇挡道，不如往回走。刘邦醉中拔剑向前，击斩大蛇。行数里，刘邦醉卧，后来的人走到刘邦斩蛇处，见一老妪夜哭，问其原因，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当道，现在被赤帝子斩杀。”这种有关刘邦出生和他的化身的神话，神化了刘邦，有利于他号召众人，刘邦自然愿意加以利用。当他做了沛公后，便祠蚩尤蚩鼓旗。做了汉王后，则以十月为岁首，而色尚赤。祭祀蚩尤，据学者考证，蚩尤即炎帝，是火神，旗帜尚赤，也是火德的表示。但又以十月为岁首，便是继承秦水德的迹象。这种矛盾的做法，表明刘邦对自己所居德运的犹豫心情，按刘邦起家的神话，汉当然居火德为好，但火德与秦的水德、周的火德在五德相胜的链条中衔接不上，不符合五德终始的说法。

于是，两年后，刘邦又宣称自己是黑帝水神，《史记·封禅书》说：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于是汉的德运又改变为水德。水德尚黑，所以汉代的礼服一般都是黑色，包括新婚庆典中的新娘，也是身着绣花的黑衣裙。汉定为水德，直接承袭周朝的火德，否认秦朝的正统。

至汉文帝时，便有人对汉的德运提出疑问，鲁人公孙臣上书提出，秦得水德，汉继秦而起，推终始传，汉当为土德。但公孙臣的上书被当时的丞相张苍所驳回，张苍好律历，认为汉乃水德，黄河在金堤决口，便是其符应。过了三年，一条黄龙在成纪出现，被解释为汉家土德的象征，汉文帝遂召公孙臣拜为博士，让他主持研究改德的事宜，张苍不得不自黜辞职。

正当文帝饶有兴趣地领导改德事宜顺利进行时，方士新垣平指示人手持玉杯至皇宫门外贡献，新垣平则在宫内煞有介事地对汉文帝说，宫门外有宝玉气来。文帝派人去查看，果然有献玉杯者。杯上刻有“人主延寿”的字样。新垣平又说，他预测不久将出现日西偏后又回到日中位置的天象。后果如其言，于是文帝下令改元和天下人宴会庆祝。不久有人上书揭穿了新垣平所言气神事都是欺诈，于是将新垣平下狱诛夷。此后，汉文帝便怠于改德的事情。于是，汉的德运问题便搁置起来了。

汉武帝时正式确立了汉的土德制度。德运的改变，实际上意味着汉朝统治制度的改变。汉武帝之前，汉朝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经统治了六十余年，天下安定，文臣儒士希望天子依凭雄厚的政治经

济实力,有所作为,改黄老的清静无为为儒学的积极进取作为指导思想,招用贤良,封禅和改德运。然汉武帝此时还受制于窦太后,窦太后好黄老之学而讨厌儒术,于是大臣赵绾、王臧、卞敖等人便鼓动汉武帝摆脱窦太后的控制。窦太后派人私下侦伺赵绾等人的过错,逼迫赵、王等人自杀,他们的诸所兴为也皆废弃,直到六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真正大权在握,逐渐把汉朝的统治思想转向儒学。他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以之作为汉朝国家治政的法典。

儒学之区别于黄老之学,在于它对政治的积极态度;儒学区别于法家,在于它鼓吹王道德治。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又加进了神学的内容,他全盘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的自然观和五德终始的政治观,用天人感应来证明君权神授,又用灾异谴告来限制君主的肆意妄为。每一朝的君主施政都应体现天意,其具体表现是“正德位,改正朔,易服色”,即制定出与所居德运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天文历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正朔”问题。每年的首月为正月,上古夏、商、周三代分别以不同的月为首月。夏历是以现在农历的正月为岁首,商历则是以现在农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周历则是以现在农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朔,即朔日农历每月初一日,朔日有从平旦、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由于夏、商、周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历法,因此,古人称之为“三正”。董仲舒将三正改造为三统,以农历正月为岁首的是夏正,称为黑统,采用夏正的新王朝就应当尚黑色。如果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的是殷正,称为白统,新王朝应尚白色。如果采用农历十一月为岁首的是周统,称为赤统,新王朝应尚赤色。这就是“正三统”。董仲舒将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相配,认为每一个新王朝上台,都必须确定自己的德运,改用新的历法,变易服色,以应天命。

遗憾的是，历法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联，不好轻易改动，由于夏正比较符合农时，所以除了个别朝代个别时间曾经采用过周正或殷正外，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朝代都用的是夏正，所谓改正朔只是一句空话。顶多是对夏正进行调整，或者给历法改个名称。

公元前104年，即太初元年，汉武帝颁布了《太初历》，以夏历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以五为纪（土的生数和成数都是五），官家的印章都以五字为限。次年，汉武帝举行祭祠土神后土的仪式，下令天下大宴五日。汉的土德正式确立。土德仁厚，故汉武帝以尊崇儒家王道德治为旗帜。

然而，汉家火德说依然没有被人忘记，且时时被人提出。汉武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由霍光摄政。公元前78年，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立，上林苑的枯柳回春，虫在柳叶上啃出“公孙病已立”的字样。符节令眭弘便上书说：“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眭弘的意思是，既然有这么多自然异常，表明当有皇帝从平民中起，而汉朝刘氏是唐尧的后裔，唐尧居火德，汉家也居火德，那么就象唐尧传帝位给虞舜那样，将帝位禅让给贤人，自己退居小小的封地里，以顺应天命。这个建议显然不能为刘氏王朝所接受，眭弘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诛。5年以后，昭帝英年去世，没有后嗣，几经周折，霍光等人找到流落民间成为平民的汉武帝重孙子、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立为汉宣帝。

宣帝之后，汉成帝荒淫好色，公元前18年，汉成帝私自出宫，路过阳阿公主家，见舞娘赵飞燕轻盈美貌，就将之带回皇宫，大为宠爱，赵飞燕又将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赵合德

初入宫时，“姿性尤醖粹”，美艳绝世，纯粹无瑕，左右侍从见之，皆啧啧嗟赏。汉宣帝时的宫廷女官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汉成帝的身后，唾口水说：“她是祸水，定会把火扑灭。”淖方成将赵合德喻之为水，正是基于汉朝德运为火的基础上。

约在昭、宣年间，巨鹿人路温舒依据天文历数作了一个预言：“汉厄三七之间”。也就是说，汉朝的厄运在三七二百一十年之际。元、成之世，这个预言演变成“赤厄三七”的著名讖言，赤为火，意即汉朝的火德在二百一十年前后就遇厄劫。这虽然是借天立言，却反映了泱泱汉朝已由盛转衰，出现了危机。汉宣帝出身平民，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位后力图有所作为，汉朝出现中兴的局面，但在他之后，子孙不肖，皇帝一任更比一任昏庸。汉成帝宠爱赵合德和男宠张放，整日沉溺在欢宴淫乐之中，丧心病狂到自己的亲子也不放过。女史曹宫怀孕后，被贬至中宫令舍，生下一男孩后，成帝便赐毒药命曹宫自杀，刚刚生出11天的儿子被成帝三次手诏害死。许美人怀孕生下一男孩，成帝下令将孩子抱至赵合德的居处，屏退所有侍从，自己关门闭户，将孩子处死。后来汉成帝又死于春药。汉哀帝刘欣有男宠之癖，宠爱年青貌美的董贤，封之高官厚禄，为之兴建豪华住宅，赏赐给他武库中最锐利的武器，和御用库房里的稀世珍宝，皇家第一流的贵重物品都集中在董家，刘欣自己所用的，也不过第二流物品。刘欣任人唯亲，听信谗言，憎恨忠良，政治更为黑暗。因此，成、哀之世，“更受命于天”的说法，又被方士们提出。

汉成帝时，齐人方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书，预言汉朝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中垒校尉刘向指控方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方忠可被下狱病死。至汉哀帝时，方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再次提出更受命的说法，建议汉朝改

元易号,以挽救汉朝德运中衰的局面。汉哀帝接受了夏贺良的提议,于公元前5年下诏道: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家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于是改元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用改元来代替改变德运,用改皇帝称号,加上一个陈姓来表示再受命,这是古人的厌胜之术,实则是的道的国粹“精神胜利法”。但这种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夏贺良等人也以“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究”而下狱伏诛。

汉哀帝去世后,王莽把握政权,处心极虑地向皇帝位逼进,他所利用的武器便是谶纬和德运之说。公元5年,也就是汉立国214年,王莽篡汉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他的授意和鼓励下,伪造的谶纬和符命此起彼现。有人报告说,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红色的八个大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莽便应天命做了“假皇帝”。

王莽做了3年的代理皇帝,便想做真皇帝,于是他又奏告太后王政君曰:

陛下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事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王莽借口汉厄三七,当改换朝代的谶言和符命,向王政君提出

了当皇帝的要求，王莽的野心毕露。素无行，好大言的梓潼人哀章见机投机，假造符命，他做了一个铜匱，两个图签，其一上写：“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二上书：“赤帝玺刘邦传予皇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当为真天子，刘氏王朝的皇太后应遵从天命。在图和书中皆写王莽的辅政大臣的姓名，除了王莽身边的亲信旧臣八人外，又编造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王兴、王盛，再加上自己的名字，一共有11人。趁天黑，哀章身着黄衣将铜匱送到高庙。王莽借此机会诏告天下，说承受天命，汉赤帝（火德）禅让帝位给黄帝（土德），自己畏于天命，不得不接受。遂改正朔，易服色，以黄色为旄幡，建立“新”朝。王莽将汉朝原皇帝刘婴封为定安公，册封的那一天，王莽还拉着刘婴的手，流涕嘘歔的表示，自己迫于皇天威命，不得不如此。

为了表示遵从天命，王莽又按金匱图书封拜辅臣，除了原亲信八人升官外，又寻得名叫王兴、王盛者十余人，从中挑选了容貌应卜相的卖饼儿王盛，守城门人王兴，封之以高官，哀章也被拜为国将，名列上公。

王莽的女儿原是汉平帝的皇后，王莽代汉后，便将女儿改名为黄皇室主，黄者土也，意即土德帝的在室女儿，表示与汉断绝关系，欲重新另嫁女儿。王莽让孙建的儿子盛装去看望黄皇室主，黄皇室主得知父亲意思，大怒，鞭笞其傍侍御，王莽只得作罢。王莽的心腹，靠作符命起家的甄丰不满意与哀章同列的地位，他的儿子甄寻便又作符命说黄皇公主当为甄寻的妻子。王莽已功成名就，正想诛杀功臣，于是发怒说：“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下令收捕甄寻，甄丰自杀，甄寻随方士逃入华山，岁余才逮捕归案，供词牵连，数百人死于非命。

王莽的皇帝位是取于汉的禅让，因此在德运更替中，不能用相胜来解释，而应按相生来排列。在王莽的授意下，他的御

用文人刘歆便将以前按五德相胜编排的古史系统改变为五德相生的新系列：太昊木德；炎帝火德，以火承木；黄帝土德，火生土；少昊金德，土生金；金生水，故颡顼为水德；帝喾木德，水生木；唐尧火德，木生火；虞舜土德，火生土；夏禹金德，土生金；金生水，故商汤水德；周朝代殷而立，故周木德；周之后便是汉朝，木生火，故汉为火德；王莽新朝得汉禅让，不言而喻便是土德了。至于共工、秦朝，虽都有水德，但不属正统，只作闰统看，故不能列入。

为了表达自己得天命，王莽又接受方士苏乐的接议，耗费万金建起八风台，在殿中种五色禾，以表示自己耕耘五德。自王莽以后，五色之瑞便成了天命的象征。

无论王莽怎样神化自己的政权，但他倒行逆施的行为决定了他败亡的命运。天凤二年（公元15年），民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百姓奔走往观者有数万人，王莽自命土德，黄龙乃土德象征，黄龙堕死，也是预言王莽统治的灭亡，这种传言表达的是民众的心愿。不久便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农民军以恢复汉朝相号召，立刘汉皇室后裔为帝，赤眉军还将眉毛涂成赤色，其潜在的含义在于弘扬汉朝的火德。

最后完成恢复刘汉正统王朝，复兴火德的是皇族后裔刘秀。早在西汉末年，社会上便流传着《赤伏符》的谶言，谶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为了应合谶言，后来做了王莽的国师公的刘歆便改名为刘秀，心底里希望自己能做天子。后来做了光武帝的刘秀，虽然是皇族支裔，但王莽时，刘氏受到抑制，刘秀已沦落为一普通的富裕农民。刘秀的哥哥刘缤胸怀恢复汉朝社稷的志向，不事产业，广交天下雄俊，而刘秀则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农业生产，因此刘缤常讥笑刘秀，将之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兄长刘仲。一次，刘秀和

姐夫邓晨一起拜访穰人蔡少公，蔡少公通于图讖，谈起“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言，有的人说：“大概是国师公刘秀吧？”刘秀笑着说：“凭什么说不是我这个刘秀呢？”在坐的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刘秀和哥哥刘縯一起参加了农民军。在昆阳之战中，刘秀崭露头角，显示了自己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以此为起点，刘秀终于成为王莽败亡后，角逐中央政权的群雄之一。

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刘秀率部由中原向关中进发，一路夺关斩将，屡奏凯歌，于是诸将再三提议刘秀称帝，都被刘秀拒绝。行至鄯县，刘秀的旧识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以献，赤伏符预言刘秀将起兵捕逐不道，群雄云集争斗于野，而在四七之际，火德将成为天下之主。四七二十八，从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到公元 25 年，恰好虚年是二百二十八年。群臣因而复奏，再次要求刘秀遵从受命之符，登基称帝，于是刘秀命在鄯县南设立坛场，于火德旺月 6 月 28 日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燔燎告天，其祝文是：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金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卯金刀即刘字的繁体，“卯金刀德为天子”，也即刘家火德为皇帝。

次年（公元 26 年）正月，也即刘汉立国二百二十八年周年，刘秀正式建都洛阳，立郊兆于城南，祭祀五方五帝五德。

“始正火德，色尚赤”，所谓正者，据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说：“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从西汉初年便一直存在的汉家火德之说，至刘秀时才正式明文规定下来。

刘秀虽然定都称帝，但在他的地盘周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如西南的公孙述、西北的隗嚣等。刘秀以符命宣告天下，然也有不信刘秀的符命者，如隗嚣便不信刘氏当复兴之说，并与当时著名的学者班彪讨论。班彪却说：刘氏继承唐尧的基业，尧据火德而汉继之，有赤帝子之符信，故鬼神都保佑他，天下都归心他，这是天命。可见德运说帮了刘秀不小的忙。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的火德一经确立，便再无疑虑和改变，直到东汉禅位于曹魏。

### 三、魏晋南北朝逼禅的借口

东汉末年的腐败政治，引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太平道相号召，作为道教系统的太平道吸收了五行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之与反汉斗争任务相结合。太平道信仰的至尊之神是太乙，又称中黄太乙。《白虎通》说：

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黄帝、土德、中央，在五帝、五行、五方中为至尊，而按五德循环，汉火德之后应是土德，故太平道信奉中黄太乙，并在其起义口号中表达了“黄天当立”土德将王的思想。

黄巾起义失败后，其余部还在各地坚持战斗，声势最为浩大的是青州黄巾军，他们转战于青、徐、兖、豫四州，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在寿张被曹操军所围，战斗受挫后，青州黄巾军移书曹操说：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能所能存也。

曹操见信，呵骂者数，又设计伏击了青州黄巾军，最后在济北，将三十万青州黄巾将士全部收降，号称其为“青州兵”。曹操的实力也由此而大大增强。

青州黄巾军的书信以天之大运来说喻曹操，说曹操当年担任济南相时，以禁断淫祀为名，禁止对刘宗室城阳景王刘章的偶像崇拜，与青州黄巾军反对刘汉王朝具有相通之处，是知“道”的表现。汉的火德德运已尽，黄家土德当立，这是曹操个人才力所不能挽救的。曹操见信虽呵骂者数，然内心深处未必不同意“汉行已尽，黄家当立”的说法。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汉献帝寄曹操篱下，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为武平侯。侍中太史令王立数言于献帝说：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使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

勿多言。”显然曹操是欣赏王立的话的，所以他表扬王立“忠于朝廷”，但面对群雄并立的局面，他不愿意过早显露“异志”，以受群起而攻之。

筹略不如曹操的袁术却自愿将自己置于众矢之下。早在东汉初年，讖书中便有“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公孙述听信讖言，自立为帝，结果被刘秀打败。两百年后，袁术又听信讖言，袁术字公路，与当涂（当途）的意思暗合，便认为自己便是代汉者。又因为袁姓的祖先姓陈，是舜帝之后，舜帝土德。以土承火，用黄色代替赤色，是五行运转的必然结果。于是，有了当皇帝的念头。这时，进军洛阳的孙坚于井中得汉传国玉玺，袁术听说后，便逮捕孙坚的妻子，强迫夺取。意欲称天子的袁术终于四面树敌，兵败呕血而死。

曹操统一北方后，成为北方政权的实际领导者，汉室皇帝形如傀儡、空有其名而已。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遣使上书曹操，劝说曹操称帝，曹操将孙权书出示臣下，并说：“这孩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侍中陈群等启奏曰：汉已名存实亡，其“有期国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陈群的启奏与当年青州黄巾军的书信内容何乃相似，其本质上都是想借助五德终始来说明自己推翻汉政权，取而代之，实乃天命所归，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但是，曹操在众目睽睽之下，身上所负的传统包袱太重，虽然他离登基称帝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他迈不出去，他对陈群等人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也就是说，他只打算像周文王那样，为魏创下基业，至于

称帝的事，还是留给儿子去做。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去世，儿子曹丕便按照父亲的遗愿，紧锣密鼓地策划起禅让夺取帝位的事宜。臣下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率先上表，引用图讖，说明天命所归，五德运行，其德运在魏。尔后，又有一大批臣下上表劝曹丕“顺天人之望”，其说德运的言论诸如：

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

代赤者魏公子。

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

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则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

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

群臣们引经据典，为曹丕上台制造理论根据，曹丕为了大其声势，则多次在臣下的表上批文，表示自己不敢受命，给群众留下再上表、再造舆论的机会。迫于此种形势，汉献帝除了让位，别无选择。当年十月，汉帝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于魏。据袁宏《汉纪》载汉帝的诏书如下：

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今其迫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汉皇诏书下后，曹丕仍上疏辞让。于是乎，群臣们联名上表，劝进书交上，一时间，劝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汉帝只得再次册诏魏王，请他接受禅让。在这种形势下，曹丕才半推半就登上了魏朝皇帝的宝座。

热热闹闹的汉魏禅让，夺人政权者说五德天命，被夺政权者也说五德天命，前者振振有词，依天命而夺之，于理无亏；后者呢呢喃喃、依天命而予之，于心无愧。前者是强者的逻辑，后者是弱者的遁词。五德终始说为封建社会政权的更替提供了兴亡双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改变，得天命与失天命均由天意，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君主的贤能与否则可不论了。

据《汉献帝传》说，曹丕登基之始，曾下诏要臣下“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但实际上，魏除了改年号“黄初”，以应黄德外，仍行汉正朔，并没有马上明文改魏德运。这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统战的考虑，魏承汉禅让，不便立即改汉旧制，引以汉朝遗老们的反感。直到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山荏县报告说黄龙出现，大臣高堂隆认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现，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明帝接受他的建议，下诏改元，采用殷正，服色尚黄，牺牲用白。

与魏同时的蜀汉、孙吴政权，在曹丕称帝后不久也都先后称帝，作为得天命的瑞应，刘备、孙权登基前，都有黄龙出现，这是土德当运的吉兆，因此，孙权便以黄龙作为称帝改历的年号。刘备作为汉室后裔，以恢复汉朝正统为旗号，故不能丢掉汉家火德，同时，他又要应土王的德运，于是，蜀汉的黄龙便出现在武阳的赤水边，留连九日才离开，这个瑞应将黄（土）与赤（火）联系在一起，使刘备既应了土德将王的天命，又不失祖宗

的正统，这是蜀汉臣子处心积虑才想出来的调合方法，其用心真是良苦。

曹魏立国的时间并不长，公元239年，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叅病重垂危，急召司马懿还京，司马懿疾驱入朝朝见，曹叅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我把后事托嘱给你了，死也是可以强忍着推迟的，我强忍着不死以等着你，得相见，我死无遗憾。”曹叅又召养子齐王、秦王上前交给司马懿，特别将秦王曹芳指给他看说：“这就是太子，先生好好看看，不要认错了。”又教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叩头流涕，当天立曹芳为太子，明帝不一会就去世了。

明帝去世后，曹芳尚幼，另一位辅政大臣，魏宗室曹爽专权，司马懿受到排挤，遂称病不理朝政，故示老朽不堪，以松弛曹爽的警惕。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不备，发动政变，废黜了曹爽兄弟，并将曹爽家族亲党杀得片甲不留，连出嫁的姑姊妹女子也不得幸免。故后来晋明帝与大臣王导闲谈，王导说起司马懿夺曹爽之权时的旧事，明帝将头伏在桌上说：“如果真如公所说的那样，晋朝的国运怎么能长远呢！”其残忍程度连晋明帝也不忍闻。

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炎的苦心经营，至司马师时（公元265年），魏帝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禅位于晋，遂下诏书，以“历数实在尔躬”为由，让出帝位，出居金墉城。

司马炎接受禅让，改元泰始，魏为土德，土生金，故司马炎于即位之初已明定：“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于是，晋定以酉日为腊日，丑日为社日，举行祭祀仪式，酉为盛金，丑为土支又是金库，腊酉丑社也是晋金德的表示。

但是，晋政权既取之于禅让，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如同魏取之于汉一样，仍在立国初期维持魏正朔、服色不变。泰始

二年，有关部门奏报说：

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

所谓虞遵唐的惯例，是指虞舜传位给唐尧，唐尧一遵舜的旧制，没有改变德运。晋武帝司马炎表面上接受了有关部门的这个建议，但实际上仍行晋金德之实。《晋书·乐志》记晋的宫廷颂歌，其中一首名为《金灵运》：

金灵运，天符发，圣征见，参日月，惟我皇，体神圣，受魏禅，应天命，皇之兴，灵有征，登大麓，御万乘，……。

再看《晋书》中所记的符瑞，也以白龙现居多。泰始元年十二月，有二条白龙现于郡国，太康元年，白龙三次在永昌出现。金色白，白龙乃晋德运为金的征兆。

但是，以精明著称的晋初三司马之后，继承皇位的却是一位弱智的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专权。贾南风的父亲是诛杀曹魏皇帝高贵乡公的功臣。晋武帝为太子司马衷娶妇时，看中的是卫瓘的女儿，而杨皇后却属意于贾氏。武帝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嫉而少子，丑而短黑。但经不住皇后的一再坚持，武帝终于同意纳贾南风为太子妃。

司马衷继位，贾后便开始弄权，当时掌握朝政的是武帝杨后的父亲杨骏。贾后为了扫除夺权的障碍，矫诏楚王等入京，诛杀了杨骏。杨太后被软禁宫中，内外不通消息，只能题帛为书，射之城外，书中说，救太傅杨骏者有赏。这封帛书落到贾后

手中，贾后遂宣布杨太后同逆，将杨太后废居金墉城，杀太后的母亲庞氏，杨太后以婆母之尊，截断头发，低头向儿媳贾后称妾，请求救母一命，不被贾后理会。杨太后遂绝食而死。

杨骏虽死，但汝南王司马亮等又把持了政权，贾南风不惜让生灵涂炭，再次发动战争，又召楚王玮入京，杀死司马亮，尔后又以司马玮擅杀司马亮为借口，将司马玮杀死。贾后达到了独掌国政的目的，为了久持国政，废黜了太子司马遹。以此为借口，赵王司马伦率兵入宫，矫诏废贾后为庶人。贾后遥呼惠帝说：“陛下使人废我，亦行自废。”行至宫西，见父亲贾谧的尸体，这才知道事情不可挽救，大放悲声，又遽然停止。赵王伦用金屑酒将贾后毒死，自己称帝。于是司马氏皇族之间又开始了追逐帝位的长期内战，史称晋室的内乱为八王之乱。

就在司马诸王们互相厮杀正酣时，北方匈奴刘汉政权逐渐强大，公元311年，北汉皇帝刘聪攻入洛阳，俘虏了晋皇帝怀帝司马炽，将之掳至平阳，让他身着青衣为北汉朝廷宴会行酒，不久又将之杀掉。五年之后，刘聪的兵马再次席卷洛阳，十八岁的晋愍帝司马邺乘坐羊拉的车，光着上身，绑着绳子，口衔玉璧，拉着棺材出降，被刘聪的大将刘曜带至平阳。刘聪对司马邺尽行侮辱玩笑，出猎时，让他身着戎装，执戟前导，在朝廷大会上，又令他倒酒和洗酒杯，尔后又令他返回更换衣服，为刘聪手执羽盖，晋朝在坐的大臣大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着司马邺放声痛哭，被刘聪杀死。此后不久，司马邺仍未免一死，被刘聪所杀。

愍帝司马邺死，晋的北方半壁江山几乎尽失，于是晋的天命自然而然转到南方。这时在南方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好友王导的帮助下，联合南方士族参与政治，在江南立下足来。愍帝死讯传到南方，百官劝进，司马睿遂即位为元帝。即位仪式上，

司马睿命王导与他共坐御床，王导固辞道：“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王导虽没有与元帝共坐御床，但却执掌了东晋的实权，故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然而，东晋王朝是一个不幸的朝代，从317年建立到420年灭亡，近一百年间，内乱屡起，建康频受战火。先是王敦、继而苏峻，接着是桓温，率兵以清君侧为名，对朝廷用兵。除了内忧，东晋还承受着沉重的外患压力。因此东晋立国一百年间，基本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得安宁。

东晋的江山最终被刘裕夺得。刘裕出身寒门，家境贫穷。据说他年青时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于讲堂前，便有五色龙纹出现在他身上。众僧人见后，惊以告诉刘裕，刘裕心中暗喜，自以为贵兆。后来在镇压孙恩、卢循的起义中，刘裕发展了自己的势力，继而消灭了东晋实力派人物桓玄，从而将东晋大权操在自己的手中。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兵至京师，逼晋恭帝禅位，当臣下将早已写好的禅位诏书拿给恭帝时，恭帝欣然谓左右侍从说：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拿起笔便在红纸上抄下禅位诏书。据《宋书·武帝纪》所言，刘裕虽是逼禅，但表面上却表示谦让，于是恭帝先下禅位诏书，再下禅位策文，又下禅位玺书。玺书中自然免不了天命所归，五运所致的话，玺书说：

昔土德告讫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于兹，亦以金德而传于宋。

意即：过去曹魏土德衰灭，故传位于我晋家，现在历运改变了，晋的德运终结于此时，故也以金德传位于宋。晋恭帝虽然退位，在皇后褚氏的保护下，深居简出，以求自保，但刘裕仍不肯

放过他。刘裕指使褚氏的哥哥请褚氏出见，趁此机会，刺客越墙而入，在内房杀死晋恭帝。晋朝以血腥屠杀曹魏氏起家，又以被后继者刘宋血腥屠杀而告终。

刘裕夺得政权后，建立刘宋王朝，以晋金德，宋禅让取之，金生水，是为水德，于当年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社以子，腊以辰，子为水，辰为水库，子社辰腊，正是刘宋政权水德的表示。刘宋既为水德，自然要编造水德的符瑞，刘宋太祖文帝刘义隆即位之前，有黑龙见西方，五色云随之。在赴京即位的路上，又有黑龙跃负刘义隆所乘的舟上。左右惊叹失色，而刘义隆则对随从说：“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自谦中寓以自负和夸耀。

但是，刘宋子孙一代不肖于一代，三传至前废帝刘子业手中，便江河日下了，刘子业刚即位，认为自己做太子时不受父亲喜欢，要掘父亲的陵寝，太史说掘陵于刘子业不利，刘子业虽停止掘陵，却让人把粪尽行泼在陵上，肆骂自己的父亲是“鬻奴”。母亲病重，派人来呼刘子业，刘子业说：“病人住的房子多鬼，可怕，哪里可以去。”太后非常气愤，对待者说：“拿刀来破我腹，那得生这样的宁馨儿。”由于刘子业的凶悖和滥杀，失去人心，帝位被叔父刘彧所篡夺，刘子业被侍从所杀，死时才17岁。

刘彧篡位后，晚年好鬼神，多忌讳，大臣犯忌讳者即行杀戮，朝臣人人自危。加上军旅不息，府藏空虚，宋的国力已日薄西山了。而刘彧的后继者后废帝又以超出乃父乃兄的凶残和荒淫，更把宋推向穷途末路。宋的大权落到了军事将领萧道成手中。

刘宋顺帝时，萧道成取宋而代之的条件已经成熟，便迫使顺帝禅位。此时顺帝已别无选择，只得以“水德迁谢”为由，“禅

位于齐”。萧以禅让得天下，按照五德相生的惯例，水生木，德运为木。萧道成在故作姿态，谦让一番后，便在群臣的劝进声中即帝位，柴燎告天。其祷文中说：

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焕诸方策，载在典谟。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济于厥艰。……。

祷文的意思是，天下是大家的天下，天命不常在一家，过去虞舜、夏禹时有禅让之制，从汉魏以来，更是以禅让更替朝代，记载在典策之中。现在刘宋水德既已衰弱，几代皇帝都逢多事之世，实赖萧道成的匡救。故萧道成之得天下，是功劳所致，天命所归，按前世的五德更替，天命禅让的惯例，萧道成理应登上皇帝的宝座。

萧道成以木德王天下，也同样必须有木德的符瑞来向天下人证实。于是便找到了萧道成旧宅的桑树上，在萧道成旧宅宅南有一桑树，树干高三丈，横生四枝，状似华盖，萧道成小时候便喜欢在树下游戏，他的从兄萧敬宗说：“这棵树是为你而生。”萧道成17岁时，又曾梦乘青龙上天，青为木德之色。在当时的讖书《河洛讖》中又有“历年七十水灭绪，风云俱起龙鳞举”“肃肃草成，道德尽备”，等语，宋以水德，立国六十六年而亡，萧字从草、草木为德，是萧道成为皇帝的讖语。所有这些都是萧道成自己或他的臣下为了神化他的皇权，证明他的天命所附会编造出来的。

萧齐朝在萧道成和儿子萧赜统治的十几年间，民众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萧赜死后，后继者均昏庸淫暴，特别是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更是惨无人道。他喜欢出宫游玩，又不想让人见到他，于是，所到之处，先行驱逐百姓，仅留下空宅。连病

重不能行动者，也必须抬走，没人抬的病人，在道侧爬行，又被官吏们捶打。有的出走不及，便将病人弃在青溪边，吏员惧怕监司责问，将病人推放在水中，用泥覆其面，病人须臾便死了。连太守一类的官员也同样在被驱逐之列。太守王敬宾家有人去世，还未来得及收殓，便被驱赶。等东昏侯萧宝卷游玩走后，家人回还，见死人的两眼都被老鼠所食。萧宝卷一次出游沈公城，有一孕妇临产来不及出走，萧宝卷走进其家，问孕妇为何不走，并用刀剖腹看男女。萧宝卷如此荒淫残暴，尽失民心，因此，当萧齐军事将领萧衍举兵讨伐东昏侯时，百姓愿从者有甲士3万人。

废帝东昏侯的部队被打败，萧宝卷被侍从所杀，萧衍立萧宝融为萧齐和帝，军政大权实握在萧衍手中。一年以后，萧衍便以禅让的形式，从萧齐手中夺取了帝位，建立了萧梁政权。和帝在被迫移交帝位时，下了禅位诏书、禅位策文和禅位玺书，其玺书中说：

昔水行告厌，我太祖既受命代终，在日天禄去谢，亦以木德而传于梁。

萧衍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一方面他故意造作，上表不接受禅让，于是以齐豫章王萧元琳为首的819人、梁侍中范云等亲信117人，一齐上表劝进，太史令蒋道秀陈述天文符谶六十四条，证明萧衍当皇帝的天命，萧衍这才表示不得已而顺从天意人愿，登基称帝。另一方面他又在背后搞阴谋，连已经禅位，年仅15岁的和帝也不放过，派遣人逼和帝吞金自杀，和帝说：“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于是饮酒一升，听任使者所杀。

无论萧衍生前何等地孝道，何等地礼佛虔诚，但他仍没有

得到善报，在他 86 岁时，部将侯景反叛，围困京城，软禁萧衍，萧衍被活活饿死。萧衍死后，反复无常的侯景一会儿立帝，一会儿废帝，梁朝廷无一日安宁。在平定侯景的过程中，另一位军事将领陈霸先掌握了实权。梁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16 岁的敬帝既奈何不得陈霸先，只得逊位于陈，梁敬帝与前几朝的末帝一样，在禅位之后，便被新君所杀。敬帝禅位给陈，同样也履行惯例，下禅位诏书、禅位策文和禅位玺书。玺书中说：

昔者木运斯尽，予高祖受焉，今历去炎精，神归枢纽，敬以火德，传于尔陈。

陈霸先也蹈前人的足迹，假作推辞一番后，便柴燎告天，登上龙基，也同样下诏，隆遇前朝逊帝，封其为王，行前朝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例，但实际上却将其置于死地。

上台以后的陈霸先，为了论证他的天命，先下诏书，后下玺书，大谈五德终始，诸如“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朕以寡虚，属当兴运”，等等充斥篇幅，其意是向国人证明，梁家火德衰微，五德流转，该是我陈家应天命乘土德而兴了。

从魏晋到南朝宋齐梁陈，政权的更替无一例外是采用了禅让的形式，新君依恃强权逼前朝末帝让位，然无论新旧君主都扯起了五德终始的旗帜作遮羞布，而在遮羞布后则是强者血腥的屠杀和弱者被凌辱的哀叹。五德终始虽然是借天命，言德运，然其真正的潜台词则是，谁有实力，谁就有“天命”和“德运”，天命固然不常，但唯实力是予。所谓依五德禅让不过是戏台上的老生常谈。

在东晋偏安江南的同时，北方黄河流域则正是“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十六国时期，这十六国是：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其中成（汉）由巴蜀地区的古巴族李氏所建，北燕、前凉、北凉、西凉为汉人政权，其余都是由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故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实际上除了上述十六国外，北方还建有代、冉魏、西燕等政权。“五胡十六国”历时 130 年，起自刘渊建国（公元 304 年），止至北魏统一北方（公元 439 年），十九个政权迭起或并存，七个民族互相厮杀，其生民涂炭，鸡犬不宁的景象可想而知。

奇怪的是，在这个离乱的时代，由汉人建立起的政权闭口不谈天命五德，而少数民族的建国者倒抓住五德终始的老调不放，大谈起来。究其个中原因，汉族政权自有苦衷，前凉张氏政权，原是西晋的凉州刺史，西晋灭亡，唯凉州得以保全，其立国之初，仍承认东晋朝廷的正统，其势不能明言自己应天命乘何德而兴。至于冉魏政权，得之于后赵石氏，仅存在两年，且两年中争斗不息，自然无遐论及自己的德运。而少数民族的建国者从边塞进入中原，抢夺汉族区域，一方面出于对先进的汉文物制度的景仰；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争夺华夏正统和运用天命的神圣，不仅证明自己是入主中原的唯一正统和其他力量的非正统，而且也可以争取汉族的民众，服从自己的领导。

首先认识到这种扯五德的虎皮，作天命的大旗的重要性，是匈奴政权汉（前赵）的统治者刘曜。刘曜是刘渊的侄儿。刘渊是匈奴冒顿的后裔，汉高祖以宗室女嫁给冒顿为妻，约为兄弟，故其子孙皆以刘为姓。刘渊自幼从汉人崔游学习经典和史汉、诸子等，故其起兵反晋时，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声称“吾

乃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表明自己是刘汉王朝的继承人，是华夏的正统。故其后来建国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刘渊死后9年，汉政权便落入刘曜的手中。刘曜改国号为“赵”，明定赵以水德承晋的金行，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刘曜既看重天命五德的意义，因而有关他的历史便不乏神话的色彩，当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时，曾有二童子入跪说：“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说完，将剑放在刘曜面前，再拜而去。刘曜在烛下看剑，剑长二尺，光泽非常，以赤玉为饰，背上有铭文曰“神剑御，除众毒”。刘曜佩服此剑，剑随四时而变五色。五德五色在古人心目中乃天命的表示。

刘曜称帝后，定都长安，立羊氏为皇后，羊氏原系晋惠帝皇后，刘曜为大将攻克西晋都城时，掳羊氏为妻。刘曜曾问羊氏：“我何如司马家儿？”羊氏回答说：“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彼贵为帝王，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于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尽管刘曜在羊氏的心目中，地位颇高，但实际上刘曜虽远远超出白痴皇帝司马衷，却仍算不得是英明君主。公元328年，刘曜率兵攻后赵石勒的洛阳城，石勒领兵来救，日夜兼程，而刘曜却在帐中与嬖臣饮酒游戏，左右侍从提出意见，便被视为妖言，予以处斩。结果在与石勒的战斗中，刘曜喝得醉醺醺地上阵，被石勒兵打败，身被创十余，被石勒部将活捉。不久前赵便彻底垮台了。

石勒原是刘渊部将，与刘曜同列，在刘汉内乱时，政权被刘曜夺得，石勒便领兵自立，称为赵王。石勒很景仰汉文化，重用汉族士人，法不得侮慢衣冠华族。尤其讨厌人说“胡”字，一次，一醉“胡”乘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宫门小执法冯

翥。翥惶惧忘讳，回答说：“刚才有一醉胡，乘马驰入，我虽力呵制止，而他根本不听道理。”石勒笑着说：“胡人的确难与讲理。”怒而不罪冯翥。

石勒虽然制天子仪仗，但一直慎于称帝。公元328年，在平县令获得一只黑兔，献于石勒，石勒的部下期遐等人乘机劝进，认为这是石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石勒鉴于自己的政权尚不稳定，只是以大赦和改元来应水德的符瑞，没有急于登上帝位。两年以后，前赵政权覆灭，前赵的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玺尽行归石勒，于是石勒的群臣再次劝进，说石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勒的从子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石勒于是号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是一位名不符其实的皇帝。侍中任播等参议，认为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石勒接受了臣下的建议，正式打出了后赵水德的旗帜。后赵上承晋金德，对前赵采用了不承认的态度，以子日和丑日分别举行社祭和腊祭，子为盛水，丑为水库，与后赵的水德相符。不久，石勒在群臣的固请下，即皇帝位，完成了他通向皇帝宝座的最后一步。

石勒的江山最后断送在从子石季龙之手。石季龙篡位后，残暴滥杀。太子石宣衔恨领军王朗，恰遇荧惑守心的天象，石宣命太史令赵揽报告石季龙说：“荧惑徘徊在房宿不去，是天子有难的天象，应该有一位尊贵的王姓官员，来代替皇帝承当这场灾难。”石季龙问：“谁来承当最恰当？”赵揽回答：“最尊贵的官员，没有人超过王朗。”石季龙舍不得杀死王朗，命赵揽再推荐另外的人，赵揽霎间无法反应，顺口说：“其次只有中书监王波。”于是石季龙随便找了个借口腰斩王波和他的四个儿子，将尸体投入漳水。王波和他的四子无缘无故做了屈死鬼。

石季龙的滥杀和拒谏给了他的养孙冉闵以可乘之机，冉闵在石季龙死后，夺取了后赵政权，其 38 个孙子均被冉闵所杀，石家覆灭。但冉闵的魏国政权只存在两年，便夭折于燕国之手。

燕国是鲜卑族慕容部政权。十六国时期，鲜卑分为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拓跋氏等许多分支。三国时，慕容氏被曹魏徙居辽西，从晋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为率义王，始建立政权。公元 337 年，慕容氏建都龙城（辽宁朝阳），招徕中原流民，按照魏晋制度实行屯田，引进汉文化，加速了慕容部的封建化。公元 348 年，慕容儁即燕王位，乘后赵内乱之际对其用兵，公元 352 年，慕容儁进攻邺城。是时慕容儁的正阳殿西椒房的燕巢中，燕生出三只雏燕，脖上有竖毛，而城中又有人献上五色成章的异鸟。慕容儁问群僚此是何祥？群僚都说，燕鸟首上有冠，是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而巢在正阳殿西椒房，是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三子数应三正之验，神鸟五色，表明圣朝将继五行之顺序以统治四海。慕容儁看了奏章十分高兴，恰恰此时他的部将在邺城外打了胜仗，因而群臣劝慕容儁称尊号，慕容回答说：

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祿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觐非望，实匪寡德所宜闻也。

慕容儁的意思是，自己是边远的少数民族人，天命历数没有他的份，群臣如果推举他做皇帝，实在不是他所应该听到的话。不久，前燕军队攻克邺城，冉闵在战斗中被俘，慕容儁质问冉闵，说他奴仆下才，为何敢妄自称天子，冉闵回答说：天下大乱，尔曹夷狄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慕容儁大怒，

将之鞭打三百，押送龙城。

在夺取邺城，俘虏冉闵妻子僚属之前，慕容儁已从冉闵的叛臣手中得到传国玺，但慕容儁为了神化其事业，说明历运在己，于是诈称该玺由冉闵的妻子所献，并煞有介事地赐她“奉玺君”的称号。公元352年慕容儁登上帝座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不再说自己是幽漠射乡、被发左衽，不宜闻天命的人，而是相当急迫地迈出登基的步子。在尊封任命完毕，功臣各得其所之后，群臣便建言说：

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

意即：大燕国承受天命，与天命五运中的黑帝水德相应承，按德运历数的传属，是在金德之后，金生水，为水德，故文物制度以黑色为尊。慕容儁接受群臣建议，定前燕的德运为水，对前朝的赵以及短命的冉魏一概不予承认，直接上承西晋金德，意在向人们宣示，自己才是中原政权的正统。

但是，尽管慕容儁否认石赵政权，他却没能走出石季龙的阴影，慕容儁晚年梦见石季龙咬自己的手臂，醒后感到不祥，于是命人发掘石季龙的墓，剖棺出尸，予以践踏和辱骂，将之弃于漳水。不久，慕容儁便因病去世了。慕容儁死后，子慕容暉继位。围绕要不要承认石赵政权，承认自己的德运应从石赵水德排下来为木德（水生木）的问题，前燕君臣展开了一场讨论。按照群臣的意思，还是“燕宜承晋为水德”，而韩恒则力排众议说：

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祈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

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

韩恒的意思是，赵政权曾据有中原，不仅是人的力量，而且也是天命，天曾予大运赵，而燕却不予承认，臣私下以为不可以。且燕国发迹于东方，于《易》，东方于五行为木，于神灵为青龙，燕受命之初，就有龙出现在都邑，龙为木德，这是天命的符应。主管天文律历的镇律郎郭钦也奏请燕承石季龙的水德为木德，于是慕容暉便接受他们的意见，定燕的德运为木。

就在慕容暉进入中原，自立为帝时，氐族首领苻健也建立了前秦政权，向关中拓展。公元351年，苻健自称天王，国号秦，定都长安。后来，秦在苻坚的领导下，于370年进攻前燕，攻下燕都邺城，俘虏慕容暉，次年灭前凉和代国，统一了北方。但前秦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失败，北方旋即四分五裂，苻坚的部将、羌族人姚萇重建秦国，史称后秦。

根据史书记载的情况看，苻氏政权似乎对自己所居德运不甚关心，没有明文规定自己的德运，倒是后秦的建立者姚萇于公元386年即皇帝位时声明，“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如姚氏所言，前秦的德运属木，而后秦的德运属火，仍然取自于五德相生之意。

北方的再次统一完成于北魏之手。北魏由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所建，原国号为代，后代国为苻坚所征服，公元386年，原代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其志不在一偏远的云代之地，而在号令中原，重兴前朝魏一统北方的事业，于其国号的更改中可见一斑。公元398年，拓跋珪在东征西讨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遂在平城（山西大同）建都，并在群臣的劝进下即皇帝位。下诏要

群臣讨论议定北魏所居德运，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正式确定了北魏的德运为土德。

北魏土德沿用了近一百年，传至魏孝文帝手中，公元490年，主持政权的文明冯太后去世，魏孝文帝亲政。他除了继续推行冯太后的改革新政（如均田制、三长制、户调制）外，又主持迁都洛阳，改易习俗的一系列改革。然而，在所有这些改革之前，孝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项改革便是改定北魏的德运。这年的8月，孝文帝颁发诏书，要求群臣重新讨论北魏的德运，希望“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要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出一个足以成万代法式的结果来。

首先是中书监高闾提出意见，认为北魏原来所定的土德是承后秦火德而来，如果否认后秦的火德、乃至前秦的木德，前秦以前各国的水德，而直接上承西晋的金德为水德，历史的中间就会有一段空缺。因此，魏的德运还是维持原来的土德比较好。但是，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诸等人不同意他意见，他们否认西晋以后，北魏以前，北方任何一个政权具有正统位置，只有北魏才是西晋金德的正统继承者。为了扩大这次议论德运的舆论影响，孝文帝对这两种意见都没表态，而是要“群官继续议之”。

公元491年正月，由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等十二人上言孝文帝，否决了高闾关于北魏应维持原来土德不变的提案，支持李彪的“宜承晋为水德”的提案。孝文帝见支持改德的人居多数，改变祖宗所定德运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向群臣亮出自己的底牌，下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腾能有违夺。便可依次为水德，祖申腊辰。”

孝文帝在改俗易都的大动作之前，先改祖宗定下的德运，

从表面上看是甚无谓也,但其深层用意是在为迁都造舆论,既然北魏直接上承西晋金德为中原正统,就不应避居在西北偏隅的平城,而应承继晋旧都洛阳,位于中央而统御四方。这才是孝文帝改德运的醉翁之意。而李彪、穆亮等人较之高闾更会揣摸皇帝的意向而已。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率师20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假装要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于是他顺水推舟,宣布定都洛阳。次年,他回平城巡视北方军镇,然后正式迁都。

孝文帝勃勃兴盛的事业传到他的孙子明帝元诩的手中,便被残败了。元诩5岁继位,政权落入母亲胡太后手中,胡太后荒淫放纵,不理朝政却又贪于弄权,在元诩长大成人以后,胡太后不惜以毒死自己的儿子元诩为代价,以达到久专国政的目的。又诈称明帝潘氏所生女儿为皇子,奉其即位,愚弄天下人。等事情稍稍平息后,胡太后又自己拆开骗局,另立宗室子三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以此为借口,率兵入京,将胡太后和元钊一起投入黄河而死,又在河阴以祭天为由,召集魏王公大臣二千余人齐集,尔朱荣派骑兵四面包围,下令将之全部杀死。北魏上层领导集团在这次事变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北魏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北魏一分为二,东魏的实权掌握在高欢、高澄父子手中,西魏的实权掌握在宇文泰手中。

东魏到静帝时,皇帝在高澄鼻息下讨生活,被高澄辱骂为:“朕!朕!狗脚朕!”静帝不堪忧辱,手下的亲信便在宫内挖地道通向北城,地道挖至千秋门,守门人感觉到地下响动,报告给高澄,高澄将静帝囚于含章堂,亲信皆被烹杀。

于是,高澄便指使手下人劝说静帝禅位,元旭对静帝说: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高澄圣德钦明,万姓归仰,希望陛下学习尧禅位于舜。静帝回答说:“此事推延已久,早就应逊位避让

了。”又说：“如果这样，是否要写诏书？”臣下说：“诏书早已写好”，静帝将之手抄一遍，东魏的江山便拱手送给了北齐高澄手中。

西魏也同样上演了逼禅的悲喜剧，宇文泰一死，其子宇文觉便要魏恭帝让位。新皇帝即位时，百官奏议云：

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兴起，没有不改变正朔，表明君权受之于天，改变民众的视听的。到了孔夫子时，查看阴阳，说行夏时，后来的王者都不改易，现在魏的天命历数告终，周室接受天命，用木德承水德实符合五运符录，所以周采用夏时，遵行圣道。周受魏禅让，水生木，故周为木德。至于魏用夏正，周也用夏正，没有改正朔，则都是遵从孔圣人之圣道。

但是，宇文觉的帝位还没坐稳，便在宫廷政变中被杀，他的哥哥宇文毓即位。宇文毓年寿不永，即位两年便一病呜呼，传位给弟弟宇文邕。在北周的历史上，宇文邕是继宇文泰之后的一代英才。他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止佛教，增加了国家的兵源和财源。公元576年，周武帝率兵进攻北齐，统一了北方。在这场战役中，周武帝见军士有光着脚行军者，便脱下自己的靴子以赐之。在作战中，他又亲临阵地，和士兵们在一起。宴会上必亲执酒杯，向将士们劝酒，故将士们作战时都以死效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军事胜利。

然后，伟人无后，周武帝死后，子宇文赟立，是为宣帝。周

宣帝荒淫无度，他同时立了四位皇后，出行时命四皇后并驾齐驱，如果出现了先后不齐的情况，便惩罚驭手和马，被打倒的人和马相连于道。他还禁止宫廷以外的妇女施用粉黛，不许人姓高，不许官职中称“上”或“大”。对臣下以及宫人，甚至后妃，动则笞捶，弄得内外恐惧，人不自安。故在宣帝时，便有记载说，荣州有黑龙和赤龙出现，二龙相斗于汴水之侧，黑龙斗败。周德为木，木生火，火色赤，故赤龙实际上是战胜周木德的征兆。它反映了当时民众不满周统治的心态。

周宣帝死后，他的不满9岁的儿子宇文衍即位，是为静帝。静帝名义上的外公是隋国公杨坚，宣帝将死之时，近臣刘昉、郑译等人矫诏以隋国公杨坚辅政，大权落入杨坚手中。周宗室王起兵反对杨坚，被杨坚用兵镇压。公元581年九岁的宇文衍奈何不得老谋深算的杨坚，不得不下诏禅位，诏书中说：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唯德。……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下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祇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汉、魏故事。

隋文帝杨坚也依惯例，封周静帝为介国公。但实际上却容不得这9岁的孩子，暗中将之害死。

就在杨坚即帝位的第二月，高平捕获了赤雀，太原捕获了苍鸟，长安捕获了白雀。这些都是新王朝的祥瑞。于是公元581年6月，杨坚下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禅，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

令尚赤。夺戎服以黄。”正式明文规定隋为火德。

公元589年，隋师南下，攻克南朝最后一朝——陈。而此时的陈后主犹自与他的近臣和文士游宴后庭，赋诗作词，谱以新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隋师水军东下，战报传来，陈后主还从容自得地对侍从们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至到隋军已至朱雀门下，陈后主这才惊惶失措，意欲躲藏。大臣袁宪劝他端正衣冠，坐正殿，见隋军，陈后主不听，跳下龙床边跑边说：“锋刃之下，不可以当，我自有计。”陈后主的计策是下到枯井去藏身，袁宪苦苦劝告，后阁（阁）舍人夏侯公韵甚至以身蔽井，陈后主与之争斗很久，才得下到井中。不一会儿隋军入宫，在井上呼喊，没人答应，准备往下扔石头，才听到井下叫声，军士们用绳子拉他出井，惊怪陈后主如此沉重，等拉上来一看，原来和他的宠妃张贵妃，孔贵嫔一起随吊绳而上。

陈家运属土德，隋以火德自命，以火克土，于五德终始的循环链中，无论相生或相克，皆不伦不类。但隋在此时要统一南方，好像也讲不得这许多了。南朝陈灭亡了，陈后主自恃的“王气”也不再保佑他了，真所谓杨素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 四、隋之后的春兰秋菊

隋灭陈统一南方，历时数百年的分裂战乱的场面落下帷幕。然隋与秦朝何乃相似，虽立下不世之功，却德运短暂，仅30多年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杨坚以武人出身，不好读书，所以读的书也不多，

但他的好处在于还能听得进文臣儒士的意见。他擅杀，但也还纳谏。他的刑部侍郎辛亶曾穿了一条红色的内裤，以为吉利，杨坚认为这是厌胜之术，要将之处斩，大理少卿赵绰以辛亶法不当死，拒绝接受命令。杨坚十分愤怒，说：“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令将赵绰拉出去斩首，赵绰说：“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亶。”就在行将行刑之际，杨坚派人问赵绰：“你到底是什么态度？”赵绰回答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杨坚气得拂衣而入，良久才传出话来，放掉赵绰，第二天又向赵绰道歉，赐给他三百段织物。

杨坚原立太子杨勇，杨勇好内，又不知矫饰自己。他的弟弟杨广与他不同，特别会讨好父亲杨坚和母后，杨坚和后一起至杨广府第，杨广将所有的美姬都藏到别室中，唯留下老丑者，穿上没有文彩的衣服，在宅中服务，屏帐改用缣素，故意将乐器的弦弄断，让上面积满灰尘。杨坚见了，认为这个儿子不好声色，对他特别喜爱，后来终于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后来杨坚病重，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杨广见皇上病重，须早作接掌皇权的准备，遂写书信给亲信杨素，讨论对策，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至杨坚手中，杨坚看后非常愤怒。他的宠妃陈夫人清晨出杨坚病房更衣，被杨广逼奸，陈夫人力拒得免，回到杨坚病房，杨坚见他神色不对，问其原因，陈夫人泫然泪下，说：“太子无礼！”杨坚气得以头触床说：“畜生何足以付大事。”命令臣下召废太子杨勇。杨广、杨素得知，封锁消息，赶走杨坚病房中的后宫嫔妃，不一会就传出杨坚去世的消息。陈夫人和后宫的人听说事变，相顾战栗失色。黄昏时，太子派使者送来一小金盒子赐给陈夫人，陈夫人见了，以为是毒药，不敢打开，使者催促，陈夫人不得已打开盒子，原来盒内是数枚同心结。当天夜里，陈夫人便被杨广所杀。

隋炀帝杨广的荒淫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他统治不几年，便天下大乱，造反者并起。当时社会上传说：“李氏当为天子”，故方士劝杨广尽诛国内凡李姓者。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杨广怀疑他的名字应讖音，当面对李敏说，要李敏自杀。李敏大惧，与伯父李浑等人商量。杨广遂下令将李浑全家收捕，尽行杀戮。

不久，远在太原做留守的李渊，在次子李世民的策动下，准备起兵反隋，其谋士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联系，借助其兵马声势，李渊遂卑辞厚礼，遣使至突厥的始毕可汗处通好。始毕可汗回书说，如果唐公李渊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否则不然。于是，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炀帝之孙代王为帝，改易旗帜，杂用红白。因为隋为火德，其旗帜尚赤，现在杂用红、白二色，是向突厥可汗表示，隋的德运已不纯，唐已不承认隋炀帝为帝了。李渊的这一做法，既可拢络突厥可汗，又不直接与隋对立，可谓一箭双雕。

次年，随隋炀帝行幸江都的近卫军官策动政变，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领，绞死了炀帝以及他的3个儿子，9个孙子，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实权由宇文化及掌握。

这年五月十四，隋恭帝下诏禅位，以隋“大运去矣”，“请避贤路”，让位于唐，李渊假意推辞，文武大臣两千人同时上表劝进，说“五运递兴，百王更王，春兰秋菊，绝无终古”，要李渊顺应天命德运当皇帝，于是，李渊遂于甲子日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派刑部尚书萧造在南郊报告上天，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武德。“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唐在名义上取自隋的禅让，隋朝火德，火生土，故唐土德。

李渊封禅位的皇帝为酈公，并下诏说：“近世以来，时运变革，前代的皇帝宗族，没有不被杀戮除灭的。但朝代所以兴亡，

岂只靠人力所为！隋朝的蔡王杨智积等王室子孙，都要由有关部门选择，量才使用。”李渊此诏一则表示自己不杀前朝遗余，二则诏示自己当皇帝是得自天命，非人力所为，所以前朝遗余即使想反抗也是没有用的。次年8月，酈公去世，酈公的死因，无论《隋史》还是《资治通鉴》都没明言，他是否死于李渊之手，这已是一个千古之谜了。

唐高宗时，便有人对唐的德运提出了问题，这人便是唐初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王勃6岁便会写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他的哥哥王勣、王勣也文才出众，故他父亲的朋友杜易简称之为“王氏三珠树”。沛王李贤听说王勃的才名，召他为沛府修撰，甚被爱重，当时诸皇子喜欢玩斗鸡游戏，各有胜负，王勃戏作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被唐高宗看到，动了龙颜，当天就将王勃逐出沛王府，不准再入。此后王勃仕途一直不得意，28岁时渡南海掉入水中淹死。王勃以文学天才闻名于世，于历法也有研究，他写的《大唐千岁历》便对唐的德运上承谁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王者运应土德而王者，可五十代，一千年；运应金德而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运应水德而王者，二十代，六百年；运应木德而王者，三十代，八百年；运应火德而王者，二十代，七百年。这是天地的常期，符历之数。从黄帝到汉朝，是真正应五德而王的真主，五运循环一周，土运复归，唐德承之，这是合符自然之理的。至于魏晋至北周隋朝，都非正统，是五行之沴气，故不可以承之。

王勃的意见是，唐的土德应直接上承汉的火德，越过魏晋至隋这一大段纷乱祚短的历史时期，对其德运不予承认。王勃的本意在于说明，唐的立国应与周、汉一样，得天命正统，故能国运长久。但王勃的好意没有被当权者所领受。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自己想当皇帝，于是便有一些见风使

舵的人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于是又有了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飞聚在左台梧桐树上,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的符瑞,于是武则天便同意了皇帝及群臣的请求,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赐皇帝为武氏,退居为皇嗣。不久又采用周历,旗帜尚赤。这一切说明,武则天虽没有明言改德,然她改正朔,易服色的做法,已经向人们宣告武周乃姬周的传人,武周的德运是承继姬周的火德。

正因为武则天以承周自命,故她晚年宠爱年青貌美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时,武三思便上奏说张昌宗是姬周灵王太子晋转世。太后便令张昌宗穿羽毛做的衣服,吹笙,在内庭院乘坐木鹤,来仿效传说中成为仙人的太子晋,而太后的文学侍从们都纷纷作诗来称颂这位“面若莲花”的宠臣。

后来武则天病重,太子李显在大臣张柬之、崔玄暉等人的策动下,发动政变,杀掉张氏兄弟,夺取了政权,恢复了大唐国号,其它文物制度全部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的旧制,不言而喻,唐的德运又由武周时的火德回到原来的土德。

至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有一位名叫崔昌的处士又拾王勃的牙慧,献《五行应运历》给玄宗,说“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北)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子孙为二王后。”玄宗将这件事下交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唐玄宗尊从天意,下诏决定,以唐承汉,立周武王、汉高祖庙于京师,废元魏、后周、隋三朝后裔的公爵爵位。

次年,唐军讨伐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官军大败,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仗没打胜,唐君臣不从自身找原因,只下令将各部队绯红色的旗帜改为赤黄,以符土运。但这并没有挽救唐由盛转衰的命运。五年以后,唐朝便遭安史之乱,从

此唐朝便一日不如一日了。

在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中，唐文宗被推上皇帝的位置，唐文宗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父亲穆宗和他本人都是由宦官拥立上台。文宗即位后，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他依靠郑注和李训打击了当权的宦官势力，但李训操之过急，在“甘露之变”中被宦官全面反扑，李、郑等人死于非命。

力图有所作为的文宗是相信五运终始说的，他拜以敦博著称的王起为太子少保，在便殿挂他的画像，号之为“当世仲尼”，令他增广《五运图》，总结五运的兴衰，好使“太子知古今治乱。”然而太子李永非文宗宠妃杨氏之子，故为杨氏所不容，不久便不明不白地突然去世了。

“甘露之变”给文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清除宦官专权的抱负也由此付之东流。他唯一的儿子李永死于非命更使他情绪郁结，两年后，文宗便在闷闷不乐中去世，看来，王起的五运图说并没有帮他的忙。

唐末农民起义领导黄巢也是五德终始说的信奉者，公元880年年底，黄巢起义军在席卷了半个中国以后，长驱直入，直指长安，潼关之战，黄巢军“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可见黄巢当时已确定自己的德运为金，故旗帜尚白。在长安的僖宗听说潼关失守，急忙驱驾狂逃，一些从官们都追赶不上。黄巢率军进入长安，“遇穷民于路，争行遗施”。12月13日，黄巢正式建立政权，自称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黄巢在楼上宣布大赦，并陈说自己的符命：

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夫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

为了进一步说明黄巢代唐而立也是出自天命，故群臣给黄巢所上的尊号是“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黄巢是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个封建农民，他的起义和革命所仿效的是被革命者的统治模式，他所要做的也仍然是一个封建皇帝。如此说来，他推崇五德终始说又有什么奇怪？他以金德自命，所以他在咏菊花诗中表达了他实行金德的理想：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然而，黄巢起义失败了，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一个分裂动荡的年代：五代十国。在中原，相继更替着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其历时共计五十三年，是五个短命的王朝，为了与前朝相区别，故历史上在五代的名称前面都冠以“后”字。

与五代并存的是周边十国，即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除北汉在黄河流域的太原立国外，其余九个国家都在南方。

梁、唐、晋、汉四朝，除梁明确宣布自己的德运为金外，其它三朝对此都语焉不详，只是从后周君臣的议论中，我们才知道后唐以恢复唐朝相号召，故沿用唐的德运为土德，认为后梁的所谓“金行”，不过是王莽式的闰统，不予承认。后晋由后唐的德运相生为金德，后汉便是水德了。

与前四朝相比，后周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五德终始的德运问题上也比较讲究。后周的建立者郭威还是一小小军士时，负气好斗。上党街市上有一屠夫，生得十分健壮，众人畏惮他，唯独郭威故意以气凌之，在醉中命屠夫割肉，稍不如意，

便叱责他。屠夫发怒，袒露胸腹对郭威说：“你敢刺我吗？”郭威马上刺开他的肚子。当时正值战乱，有关部门的头领见他勇敢，便放郭威一马，没有治他的罪。郭威后来也爱读书，请结拜兄弟李琼教他，袖书自随，遇暇辄读。

郭威后来做了天子，故自然也有关于他的神话，据说，郭威常白日睡觉，便有五色的小虫出入他的颧鼻之间，五色五德乃天命的象征。故后汉隐帝死后，后汉的太后无可奈何只好把皇权移交给实权派郭威，在禅位诰命中自然又少不了天命去就的旧话了。

郭威比较痛快，既然应天承运，所以也没有推辞谦让，当日便登上皇位。有关部门就德运问题上言皇帝：

今国家建号，以木德代水，准经法国以姓墓为腊，请以未日为腊。

意即：后周以木德代后汉水德，应以德运所属的库墓日为腊祭日，木德的库墓日为未，故请以未日为腊日（参见前《五行寄生十二宫》）。郭威采纳了这个意见。比较巧合的是，按五德相生的历史循环，姬周是木德、宇文氏的北周也是木德，现在的后周又是以木德王天下。后周的臣子们对这个巧合是颇为得意的。

周太祖郭威死后，他的养子郭荣（即柴荣）继位为世宗，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中国的再度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可惜世宗英年早逝，壮志不酬。

周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只有6岁。公元960年春，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朝会师南下，于是奉命带兵北上抵抗。部队夜宿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天未

亮,按计划举行兵变,推戴赵匡胤升帝位,回师都城。小皇帝只能顺水推舟,下诏让位于赵。故在周人撰写的《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中,史臣称赞恭帝说:夫四序之气,寒往则暑来;五行之数,金销则火盛,……况恭帝当纨绔之冲年,会笙簧之变响,听讴歌之所属,知命历之有在,能逊其位,不亦善乎。”这种御用帮腔文人的调子也离不开五运历数之类,以强欺弱,还振振有词。

赵匡胤夺权后,定国号为宋,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戌是火的库墓,故于戌日举行腊祭。但是,关于宋的德运问题,从太祖赵匡胤到真宗赵恒,近60年间,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比较集中的讨论有三次。首先是布衣赵垂庆于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上言,提出宋的德运是金而非木,他的理由是,宋应超越五代,上承大唐土德为金德。即使承认五代,从后梁金德算起,依次相生推下来,到宋恰好是一个循环,亦合为金德。且宋自受禅以来,符瑞纷至,多呈白色,也是宋金德之兆。赵垂庆的意见得到太宗的重视,命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右散骑常侍徐铉等人提出不同意见,其理由是,五运相承,乃国家大事,宋的火德在太祖立国之初便已明文确定,不能轻易更动。后梁朱氏属于闰统,不应纳入五运流转的正常系列。从后唐土德算起,经后晋金,后汉水,后周木,至宋朝,自然运应火德。况宋自立国伊始,便祀赤帝,自今二十五年来,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如若圣统不合天心,岂有今日太平?如果宋上继唐统为金德,则后唐以下诸朝的正统废绝,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岂能视而不见,予以屏除呢?因此,徐铉等人的意见,还是维持原来的火德不变。太宗接受了后一种意见,遵从原来的定制。

至宋真宗年间,大宋应为金德的问题又被开封府的功曹

参军张君房重新提出，他的理由是，在五代十国中，除了后唐和南唐堪为唐朝之后，是为正统外，其余各朝各国均属闰统，因此，宋应承后唐的土德为金德，张君房的“疏奏不报”，没有回音。不久，光禄寺丞谢绛上书，另持一端，认为宋应土德。坚持宋为金德的大理寺丞董行父，又引经据典，重申过去的观点。于是真宗下诏让群臣详议。群臣上追远古伏羲氏，下稽当代的符瑞，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仍维持宋的火德不变。

真宗以后，宋内忧外患，关于德运的问题便很少有人顾及，宋的火德也就一直维持到它的寿终正寝。

宋关于德运的讨论平息了，一百余年以后，与宋对恃的金朝臣子们为自己的德运又争论不休。金的开国皇帝阿骨打在登基之始，便向群臣宣告：

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

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可见阿骨打给本国命名为金时，并没有受汉人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所考虑的是他当时所面对的敌人——契丹辽国，他要用金去胜契丹辽国的铁。

金灭辽后，便直接面对宋朝，女真贵族一方面对宋发动了掠夺战争，一方面又吸收宋的文化。受汉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金人对自己的德运提出了疑问，金朝尚白，合为金德，而他的敌国宋国火德，依五行相胜说，火克金，使金国在德运方面居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金国立国近90年的时候，金的朝廷就金德运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金继灭亡了的北宋火运为土德。当时的皇帝金章宗于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11月，宣布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

尽管金的德运是由金章宗出面改定,但显然心怀疑问的还大有人在,于宣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1214年),又特下一道圣旨,指定几位公卿牵头,复议章宗朝已讨论过的德运问题,并将此次讨论的文章奏疏汇编成书,即《大金德运图说》。其中坚持金德运应为土德者4人,坚持应为金德者14人,双方各据其理力争,争得轰轰烈烈,而又危言耸听。

由于双方的理由都是那么充足,金宣宗要判断谁是谁非便相当困难,于是这个问题就被搁置起来。直到20年后,金朝皇帝的冠冕被蒙古军队的马蹄踏碎,金的德运问题还没得到最后解决,便不了了之了。

蒙古军队一路凯歌,灭掉了金,又灭掉了南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在灭宋以前,忽必烈已建国号“大元”,并为此特下诏进行说明,诏中说,秦、汉得名于初起之地名,隋、唐得名于所封之爵邑,而大元呢,则是“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为了表扬大元领导者的开创元始之功,忽必烈取于汉儒经典之义,命国名为大元,标新立异,不流于“庶品”。

元朝不仅在命名上别具一格,而且,它也别具一格不再侈谈天命五德,争论什么正统、闰统。较之前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元朝的领导人面对先进的汉文化,表现出空前的健康心态,它不拒绝吸收汉文化,但也不自卑,并不想远攀黄帝炎帝,近借五德终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当然的统治者,无需用正统不正统的观念来粉饰装扮。他们更在意,也更自得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的国家。

元朝以后,中国历史上更迭的是明、清二代。翻开明、清史籍,我们同样也难找到五德终始说的踪迹。明的建立者朱元璋

倒也不排斥天命，然而他奉天承运的标志，不是德运符应，而是天气变化。朱元璋在登帝位之前，曾告于上帝，其祷文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围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在这篇祷文中，朱元璋告诉上帝，他将于次年正月四日举行登基大典，上帝如果同意他做万民之主，则用“天朗气清”来表示，如果不同意，则用“烈风异景”来彰显。

当然，朱元璋并不太敢拿“有不测风云”的天气来作为他登基与否的赌注，事先他是让会推算天气的刘基推算过，正月初四这一天是个大晴天。我们不能不为当年的刘基捏一把汗，假如对天气预测不准，使朱元璋不能顺利接受“天命”，岂不是要掉脑袋吗？

继明而立的清朝，似乎对五德终始说也没有兴趣，在清初皇帝的诏书中，都没有提及清朝运应何德。在清朝文人儒士中，很多人对五德、五行都持否定态度。《四库全书总目》在注录《大金德运图说》时，认为：五德之运说并非出自儒家经典，后代泥于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之所以收录见识偏陋的《大金德运图说》，意在使“天下后世晓然知邹衍以下皆妄生臆解，用以祛曲说之惑焉”。

在清人所修的《明史·五行志》序中，批评五行感应学说曰：“天道远，人道近”，“彼刘董诸儒之学，颇近于术数机祥，本无足述。”《四库全书总目》和《明史》皆是馆臣手笔，所表达的也是当权者的意见。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朝国号“明”，是明火德的表示；清朝国号“清”，是清水德的表示。清以水德克明的火德。实际上，明之为明，并不来自于朱元璋所应的德运，而是来自于元末农民起义时所信奉的明教，也即弥勒教。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韩山童自称明王，他死后，儿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朱元璋及其部队原属韩林儿、刘福通的麾下，自然也是明教的信徒，其建国便以“明”为号了。况且，无论从相生或相克的循环来推算，从宋、元到明都不应是火德。清朝国号“大清”的由来，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既然明非火德，清也不存在以水克火的问题。从王莽以来，各朝代确定德运都采用了相生系列，独清采用相克系列，似乎也没道理。

应该说，五德终始说逐渐受到冷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参杂着神学的新儒学毕竟是思想哲学不够发展的产物。宋明理学较之于董仲舒的儒学是一个更精致、更注重实际的思想体系，它逐渐剔除已被正统儒生所鄙视的类似于术数机祥的天人感应（包括五德终始）的内容。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受阴阳五行宇宙观所控制的天文历数学科越来越暴露出它本身的缺陷，而在五德终始说中，天文和历法占有相当的分量，西方科学知识对传统的天文历法学的冲击，也使五德终始越来越难站住脚跟，最后不得不被扫出帝王殿堂的大门。

## 第六章 出神入化说五行

殷情与说年华，

如今处处生芳草

纵凭高不见天涯，

更消他，

几度东风，

几度飞花。

——宋·王沂孙

### 一、五行与五运六气

通常人们把办事顺利称为“运气”好，反之则曰“运气”不好，那么“运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运气”实际上是“五运六气”的简称。所谓“五运”实际上是天之五气与地之五行相互交感变化而形成的气流运动；所谓“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的总称，用以说明五行的阴阳属性。五运六气最初是用以推测天气气候的变化。

古人为了观察天象，特地从天球黄道和赤道附近一周天的恒星中选择了 100 多个星座，分为二十八组，作为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的坐标，称为“二十八宿”，宿即“停留”之意。二十八宿又划分为东北西南四象，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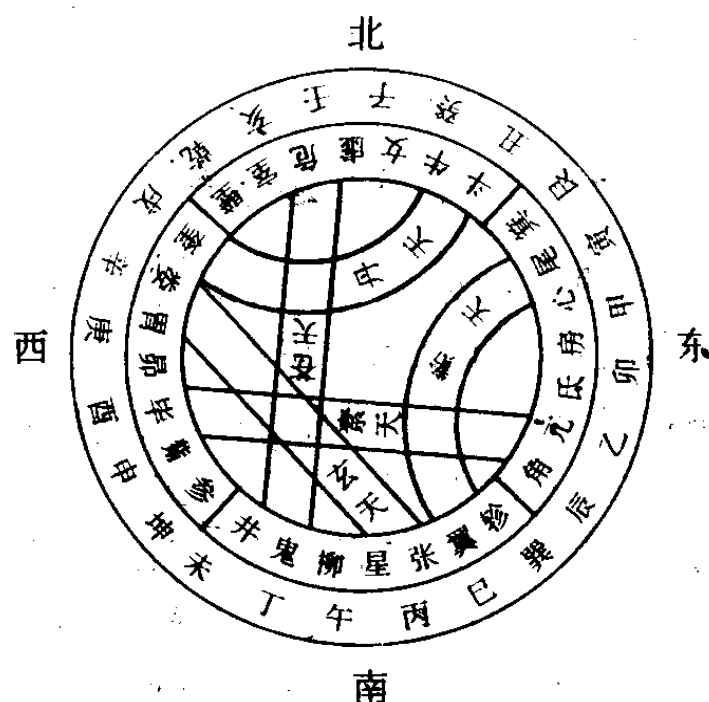
角亢氐房心尾箕——东方苍龙。

斗牛女虚危室壁——北方玄武。

奎娄胃昂毕觜参——西方白虎。

井鬼柳星张翼轸——南方朱雀。

二十八宿四象与五行四方相比附,东方木,色青;北方水,色黑;西方金,色白;南方火,色赤;;再加上中央土,色黄,一共五色。古人观察天象,认为天上有青、赤、黄、白、黑五色云气横亘天空,故称之为“苍(青)天”“丹天”、“黔(黄)天”、“素(白)天”、“玄(黑)天”,通称为“五天五气”,或“五气经天”,下面是“五气经天图”:



天气与二十八宿相连,苍天之气经危室至柳鬼;丹天之气经牛女至壁奎;黔天之气经心尾至轸角;素天之气经亢氐至卯毕;玄天之气经张翼至娄胃。

五气与五行相配,苍天象木气,丹天象火气,黔天象土气,

素天象金气，玄天象水气。将五天之气的运行与五行之气的变化结合起来，便构成五运。推演五运变化的基本法则是：将五运与天干相配合，甲己，土运；乙庚，金运；丙辛，水运；丁壬，木运；戊癸，火运。根据干支纪年便可以推知该年属于何运。土运主湿，金运主燥，水运主寒，木运主风，火运主热。

与一定纪年的天干相对应的那一运是主宰该年全年天气的主“运”。但一年又分为五个运季，推算五个运季称为推五步。其具体方法是：根据该年主运与客运的相生相克关系，来预测该年的气象变化。

主运：主运是恒定不变的。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初运起于大寒日。每一运占一年的五分之一的时间，假定一年的长度为  $365\frac{1}{4}$  日，那么，每运主七十三日零五刻（一刻为 0.24 小时）。初运木起于大寒日，二运火起于春分后十三日，三运土起于芒种后十日，四运金起于暑后七日，终点水起于立冬后四日。

客运：客运以本年的中运作为初运。所谓中运即与天干相对应的运，亦称大运。例如，甲年为阳土，故以阳土为初运，依次推下去。将客运的运行系统与主运的运行系统相联系。甲年客运的初运为土，主运为木，木克土，风克湿。客运的二运为金，主运为火，又相克，火克金。依次类推。

五运中还有“太过”与“不及”的说法。在十天干中，甲、丙、戊、庚、壬等五阳干当大运之年为太过，而乙、丁、己、辛、癸等五阴干当运之年为不及。太过的年分，其运气在大寒节前三日交运，不及的年分则在大寒节后十三日交运，正好相反。既然十天干以阴阳分为不及和太过，那么有没有“平气”之年呢？有。平气之年主要从干和支的五行属性相生相克来求平衡。如

癸巳年，癸为火运不及，但巳属风木，火木相生，相互支持，取得平衡。如丙午年，丙水太过，午为少阴君火，丙水与午火相克，互相制约，也为平气之年。所谓平气，也就是既不太过，亦非不及。

再说六气，六气与五行相配：

风——木，寒——水  
暑——君火，湿——土  
燥——金，火——相火

六气中又各有阴阳属性，推演六气变化的基本法则是以十二地支与六气相配：

子午——少阴君火  
丑未——太阴湿土  
寅申——太阳相火  
卯酉——阳明燥金  
辰戌——太阳寒水  
巳亥——厥阴风木

根据干支纪年中的地支，便知与之对应的气是主宰该年全年气候变化的主气，全年气候变化规律遵循的三阴三阳互相对应，即：

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

三阴三阳之序基本上是五行相生的顺序,只是中间多了一个君火而略有不同,依据六气与地支的对应,凡是子、午年,属君火年,气从热化,凡是丑、未年,属于太阴湿土,气候潮湿。这是算全年气候的方法。

推算半年气候的变化,则以主宰该年全年气候的气为该年上半年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而与它相对应的气则主该年下半年气候的变化。如果该年的主气是太阴湿土,与之相对的是太阳寒水,则上半年气候潮湿,下半年气温偏低。

推算一年中某一个具体时段的气候变化称为“推六步”,即将一年二十四节气总长度分为六等分,以一年的长度为 $365\frac{1}{4}$ 日,则六分之一等分为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每一气主一等分,一等分分为一步。从大寒开始,以该年所主之气的前二位为初气,以该年所主之气的对应气为当终之气,顺着三阴三阳的顺序便可推出六步气候的变异。例如,逢丑或逢未年,主气是太阴湿土,那么它的前两位的气是厥阴风木,与太阴湿土相对应的气是太阳寒水,这一年的六步顺序便是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依此类推。

五运六气结合起来便称为运气。天干纪五运即天之气,地支纪六气即地之气。一定的干支年有一定的运和气,运和气各有自己的五行属性,按照五行生克的原理,气生运则顺,称为顺化之年,气候变化平和。气克运则不顺,称为天刑,气候变化剧烈。凡运生气之年称为小逆,气候变化较大。运克气之年称为不和,气候变化也较大。例如丙巳这一年,天干为丙,属于水运,地支巳为木气,水运生木气,运盛气衰,为小逆之年。如果是甲子年,天干甲是土运,地支子是少阴君火(暑气),火气生

土运,是顺化之年。按照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凡是占了上风的运或气便为盛,居于被生被克的气便为衰,推断该年气候变化以盛方为主,衰方为次。

在六十甲子中,天干的运与地支的气如五行属性相同的年份,称为“天符”之年。如乙卯年,乙为金运,卯气为燥金,在五行上都属金,便是天符年。天符年的气候变化最大。六十甲子中属于天符年的有:乙卯、乙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戊子、戊午、己未、己丑、戊寅、戊申。

如果天干的运与地支的五行属性相同,则称为“岁会”。岁会之年气候变化较小。如甲辰年,天干甲为土运,地支辰属土,这便是岁会。岁会年有:甲辰、甲戌、乙丑、己未、乙酉、丁卯、戊午、丙子。

既逢天符,又为岁会,干支对应的运、气五行属性相同,而天干的运又与地支的五行相同,这样的年份称为“太乙天符”。逢太乙天符年,气候变化最为剧烈。太乙天符年有:己丑、己未、乙酉、戊午。

凡天干与地支皆属阳,而天干的运又和该年地支的气相对应的主宰下半年气候变异的气,在五行属性上相同,称为“同天符”年。如甲辰年,天干甲为土运,地支辰为太阳寒水,与太阳寒水相对应的是太阴湿土,这就是同天符年。同天符年的气候变化大。同天符年有:甲辰、甲戌、庚子、庚午、壬寅、壬申。

天干地支皆属阴,而天干的运又和主宰该年地支气相对应主下半年气候变化的气,在五行属性上相同的年份,称为“同岁会”年,如辛未年,辛属阴,水运;未,太阴湿土;与太阴湿土相对应的是太阳寒水,这便是同岁会。同岁会年有:辛未、辛丑、癸卯、癸酉、癸巳、癸亥。

在六十甲子中,除去天符、岁会、太乙天符、同天符、同岁

会外,余下的便是平和之年,风调雨顺。

五运六气中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构成了六十年一个气候变化的大周期,运用运气学说来推算近半个世纪一些地区的气候变化,有颇多近似之处。以1992年(壬申年)为例,这一年是同天符年,又是小逆之年。干支均为阳,壬为木运,申为少阴相火,木运生火气,因而这一年火气太过,夏季气温炎热,武汉、重庆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40℃。1993年(癸酉)是同岁会年,癸为阴火,酉为阳明燥金,癸以火克金,热克燥,热和燥在相克中被消耗掉,故该年气温不会偏高,同时,按照推六步的方法推算,从大暑(7月23日)起,便是太阴寒水为主气,因此,这一年的夏天便真是一个清凉的夏天,并以雨水多为特征。

古人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仪器,推测天气使用五运六气的方法。三国时的诸葛亮很精于此道,他能推算出某日将刮东风,帮助周瑜策划火攻连营的战略。后来司马懿率兵进攻蜀,诸葛亮仰观天象,俯推五步、六步,不仅预测将有大雨,而且雨期一月之久,于是仅派千人小部队去守陈仓,挡住40万魏兵。领命的将帅张嶷、王平不敢去,说:“丞相欲杀我们二人,请就此杀,我们是不敢去的。”诸葛亮笑着告诉他们,月内将有大雨淋漓,魏虽有40万大军,也无所作为。蜀军根据诸葛亮的推算,预备一月人干的草细粮,作好准备。后来,大雨连降30日,魏军马无粮草,死者无数,只得退军。

运气学说是建立在我国古代人民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基础上,应用五行思想来说明天象气候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以及在变异中保持的稳定性的学说。它对天气的预测虽缺乏现代科学依据,但也有实践经验作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五行学说在传统的自然科

学领域应用的成果。

传统的思维特点是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运六气既能推测天象，那么按照五运六气规律运行的自然世界势必对人体产生影响，古人把五运六气学说运用到人体自身的调节上，五运六气与人体的对应是：

天干	运	地支	气	五行	特性	人体器官
甲乙	土运	丑未	太阴湿土	土	湿	脾、胃
乙庚	金运	卯酉	阳明燥金	金	燥	肺、大肠
丙辛	水运	辰戌	太阳寒水	水	寒	肾、膀胱
丁壬	木运	巳亥	厥阴风木	木	风	肝、胆
戊癸	土运	子午	少阴君火	火	热	心、心包络、小肠
		寅申	少阳相火	火	热	心、心包络、小肠

根据运气五行特性与人体器官的对应关系，人们便可以对身体进行调节。运气逢土，以湿为特征，就要注意养脾胃，运气逢金，以燥为特征，就要注意对肺和大肠的保护，依次类推。

另外，根据人出生时的天干地支，算出所属的运气，也可以推测出该人的身体内气运的状况。

例：某男，1984年2月22日午时出生于东方。

其出生的年月日時换算为干支：

年：甲子

月：丙寅

日：丙戌

时：甲午

甲年的中运为土运太过，五运中的主运与客运步步相克，主运克客运，故本年四季中皆不够正常。

从六气来说,子年为少阴君火,与之相对的是阳明燥金。上半年少阴君火主事,下半年阳明燥金主事。从运与气的关系看,上半年主气火,运为土,气生运,火生土,故气象偏于湿热。下半年金为主气,运生气,土生金,故燥气上升,全年气象偏于湿热,而该男生于正月,其气候交接是初运与初气相交。即运偏湿热,气偏风热。故该男孩出生时,后天气候给他的影响是湿热,湿热有可能潜伏在他的体内,应当注意予以调节。

## 二、五行与食物养生学

古人将五行四季与五味、五臭相配,构建了古代食物养生的理论。

春天主木,其味酸,其臭(气味)羶,羶是羊所特有的气味,故春气与羊气相类。酸者,端也,为万物生长的始端。夏天主火,其味苦,其臭焦。因为处于生长过程中还未成熟的植物果实味道苦涩,故其味苦。而火燎之气是焦糊的气味,故其臭焦。季夏主土,其味甘,其臭香。因为土为五行之主,甘也相应为五味之主。土位于中央,中和各气,故其臭香。秋主金,其味辛,其臭腥,因为西方金主刑杀,故其气腥。冬天主水,其味咸,其臭朽。朽气是水的气味,北方物咸而坚,故其味咸。

根据五行,五味,古人对食物又进行了分类,如: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羶	焦	香	腥	朽

五种调料	醋	酒	蜜	姜	盐
五谷	麻	麦	米	黍	大豆
五果	李	杏	枣	桃	栗
五菜	韭	薤	葵	葱	藿
五畜	鸡	羊	牛	犬	彘
五石	曾青	雄黄	玉	金	赤石脂
五药	五味子	天门冬	茯苓	桂心	玄参
五虫	伊威	蛇蛻	蜚零	蛭蛭	蜥蜴

可食植物各部位与五行相配为：

木	火	金	水	土
芒	散	房	莢	萃
子	核	皮	壳	房

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体对食物的需求相应有所变化,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人的养生食物也需作相应的调节。春天属木,万物生长复苏,但春气犹寒,故此时食物以进补为主,味以省酸增甘为优。古人主张食麦和羊,麦有孚甲,是木性植物,羊为火畜,味甘,食之可以扶气安性,且木火相生,正是勃勃兴盛的时候。夏天属火,气候炎热,应省甘增辛,古人认为应食菽和鸡,菽有坚壳是水性谷物,热天食菽,以寒水克火,可以消暑。夏天体力消耗大,鸡是木畜,肉甘温平味辛,对于恢复体力,壮体养血,有很好的

效用。季夏属土，湿气渐多，古人主张食稷和牛，稷是五谷之长，寒性，牛是土畜，味甘和，能强胃脾去湿气。金秋空气干燥，体内需要水分，要多食水分多的食物，省辛增酸，古人主张食麻与犬，麻、犬味俱酸，用以调金气，以少阳之气调少阴之气。冬季属水，刚经过炎热的夏天和干燥的秋天，人体内潜藏伏热，故既要进温去寒，又要食寒去内中热毒，宜省咸增苦。古人主张食黍与豕，黍属火，是温性谷物，猪水畜，其肉微寒，兼用水火，驱寒去热。

五味对人体而言，酸养骨，苦养气，甘养肉，辛养筋，咸养脉。故病在筋，不食酸；病在气，不食辛；病在骨，不食咸；病在血，不食苦；病在肉，不食甘。《黄帝养生经》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故人食过咸，使肾（水）气盛心（火）气衰，令人发狂，喜衄、吐血、心神不定。人食过辛，使肺（金）气盛，肝（木）气衰，令人怯懦悲愁，目盲发白。人食过甘，使脾（土）气盛，肾（水）气衰，令人痴淫泄精，腰背疼，利脓血。人食过苦，使人心（火）气盛，肺（金）气衰，果敢轻死，咳逆，胸满。人食过酸，使肝（木）气盛，脾（金）气衰，令人消化不良，暗聋症固。这都是根据五脏、五味的五行属性，应用五行生克的原理，来加以辨证的。所以肝病禁辛，心病禁食咸，脾病禁苦，肾病禁甘。肺病者宜食糯米，牛肉、枣、葵等土性食物。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等火性食物。肾病者宜食大豆、黄黍、猪肉、藿等水性或金性食物。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等木性食物。脾病者宜食鸡、桃、黍、葱等木性和金性食物。肝（木）、心（火）、肾（水）各以其本味补之，脾（土）、肺（金）则以相生的五行养之。

按照古人养生的观点，五味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相生，谨和五味，则人长寿，五味有偏胜，则疾病生。

### 三、五行与中国医学

五行学说是中国医学的理论支柱之一。中国医学运用五行原理进行病理研究,在世界医学界独树一帜,是五行思想在传统自然科学领域里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

五行思想很早就被应用到中医领域,据徐春圃的《古今医统》说:“巫彭初作周医官,谓人惟五谷、五药养其病,五声、五色视其生,观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五脏之动,遂用五毒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气养之,以五味节之,以祛百病。”巫彭在《山海经》中是一个半人半仙的神医,他的名字在卜辞中也屡有出现,可见巫彭原实有其人。因其医术高明,渐被后人神化,巫彭为西周医官,按《古今医统》的说法,早在巫彭时,中医便已贯穿了以五行为系统的医疗思想。这个说法虽然尚待考据,但至少在春秋时代,五行就应用到人体病理分析中,则是十分肯定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患病,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名医和为晋侯诊治。医和诊断说,晋侯的病已不可治,因为他近女色太过,使体内机制失去平衡。医和分析道: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把五行说和气、阴阳理论结合在一起,来说明晋侯生病的原因。

至少在西汉末年,中医中的五行思想已形成体系,其标志便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黄帝内经》以气和阴阳五行说为指导,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的丰富经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在中国历史上延绵数千年直到今天,不仅没有衰落或被淘汰,而且被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所接受,特别是在疑难杂症方面,中医的疗效是拥有现代高精密医疗设备的西医也难企及的。

中国医学中将五行与人的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脏腑而言,其分配为: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肾;木胆、火小肠、土胃,金大肠、水膀胱。脏腑者,以其藏于人体之内,能接纳贮藏五气,故称为脏腑。五行与脏腑相对应,是根据比类取象的方法来分配的。肝喜条达,木有生发,故以肝属木;心阳温煦,火有阳热,故以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土能生化万物,故以脾属土;肺有肃降,金有清肃,故以肺属金;肾主水藏精,水有润下,故以肾属水。五行还与人体其它器官相关连,并且又与十天干相配,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对应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相对应的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参看下图:

木	火	土	金	水
肝	心	脾	肺	肾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目	舌	口	鼻	耳
魂	神	志	魄	精
骨	气	肉	精	脉
爪	面	唇	毛	发
弦脉	钩脉	缓脉	毛脉	石脉

将军之官	君主之官	仓廩之官	相传之官	作强之官
静	躁	力	坚	敬
甲乙	丙辛	戊癸	乙庚	丁壬
青	赤	黄	白	黑

中医认为,人生百病,皆因于风(木)、寒(水)、暑(君火)、湿(土)、燥(金)、火(相火)六气,病的外部征候皆根于脏腑,六气侵入脏腑而病,都可以用五行生克的原理来医治。《内经》说:“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这是讲人体内五行相胜的一面。五行还有相生的一面,据《内经》所说,五脏受气于其所生,肝受气于心(木生火);心受气于脾(火生土),脾受气于肺(土生金),肺受气于肾(金生水),肾受气于肝(水生木)。所谓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也即病气按五行相生的关系由“子”脏传及“母”脏。当然,如果母脏有病,也可殃及子脏,这是“母病及子”。在五行系统中,每一行都与其它四行发生一定联系,任何两行之间总有相生或相克的关系,所以是不平衡的。但就五行整体而言,生和胜都在总和中表现出相对的平衡。中医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药物和其它方法来调节,使整个系统保持相对平衡。

一旦这个相对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太过”或“不及”的现象,人便表现出病态。“太过”即“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不及”即“见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乘是乘虚而袭害,侮是恃强而欺侮。例如木气太过,便会对它所胜的土发生超过正常限度的克制,这叫相乘;并反过来欺侮本来克制自己的金,这就叫反侮。假如木气不及,则金会来伐木,土要反过来侮火,受木所生的火也会异常。以此看来,当五行中某一行出现太过或不及时,五行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与这一行

相联系的其它四行也会出现异常情况。

一般来说,人体内这种异常是可以通常人体内的自身调节机制来进行调节,使之恢复平衡,但如果自身的调节机制无能为力时,便需要用外来的五行进行调治。比如肝,肝在人体内相当于将军之官,与春气相通,木生风,凡病肝木者皆以热为本,以风为标,犹如野火本不燎燔,但大风一吹便烈焰熊熊,肝本不热,但由于肺金衰不胜心火,肝木侮于肺金,故引发诸风掉眩、胃脘当心痛,上肢两胁隔咽不通,饮食不下,耳鸣目眩,目不识丁,胁痛呕吐,人易怒善惊等。其治疗方法是以金克木,风因木生,燥由金化,以燥治风,以金的凉气来降肝水,并注意对肺金的调治。

再如心火,心火为君火,心静则神明,心热则肿痛。心与夏气相通,在体内相当于君主之官。由于心火引起的病为胸中热,嗌干左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吐血、身热、惊惑、恶寒、战栗、谵妄等等。治心火病用寒胜热,水胜火,用咸寒治之,以甘苦佐之,以酸收之,则可收效。

诸湿肿满皆属脾土所致。脾在五脏中是仓廪之官。土气湿;脾土的病征为肤肿骨痛、腰脊头颈痛,大便难,咳吐有血,喜饮不喜食,霍乱吐下,积食不化等。其为治,湿由土而生,风可胜湿,木可克土,用风将湿气驱出。

诸气闷郁病痿皆属肺金,肺金在体内是相傅之官,与秋气通。金气燥,燥盛则干。其为病骨节内变,左胁肋痛,咳嗽,腹鸣,小腹剧痛,嗌干、喘逆、肩背痛、多汗等。治疗的方法用热胜燥,燥自金生,热为火化,金用火制,火味苦,以苦温治之,以苦辛佐之。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肾主封藏之本,在体内是作强之官。肾在六气中属相火,火居水位,分而言之,左肾属水,右肾

属火。凡寒客心痛,腰腿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腹满、寝汗、腹胫肿、憎风、意不乐,这是左肾水病。右肾相火为病则少气,疮痛,疥癣,胸背面四肢浮肿、腹胀、心热、呕涌、结核等,其为治用寒胜热,用燥胜寒。若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是以水胜火。如果寒淫于内,治以甘寒,佐以甘辛,是用土胜水。

由于中医以五行为网络,将人体与自然环境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大系统,除了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肝胜脾,脾胜肾,肾胜心,心胜肺,肺胜肝的相生相克关系外,五脏与人体的其它器官和情态、自然环境也存在着同行的联系。例如,肝与胆、目、筋、怒与自然界的春天、东风、青色、酸味等同属木这一行,同行之间也就有了相类相连的关系。如:肝与胆相照,有经络相连;肝开窍与目,主生筋,筋色青;情态中的怒与肝密切相关,如暴怒伤肝;肝病常在春天发作,而春天多东风,主生发,风又能伤筋;酸味入口,先走肝脏,酸味适量养肝,过则伤肝;等等。木行系列如此,其它四行系列也莫不如此。

正因为每行对应系列具有内在联系,所以中医在望诊和把脉中,往往根据五色来判断人的病症。肝脉色青白,心脉色赤黑,脾脉色黄青,肺脉色白赤,肾脉色黑黄。若肺伤于风则眉白,心伤于风而口赤,肝伤于风而目青,脾伤于风而鼻黄,肾伤于风而肌黑。肝热左颊赤,肺热右颊赤,心热而颜赤,脾热而鼻赤,肾热而颐赤。面色黄白为体内有热,青白为寒,青黑为痛。

中医在进行病理分析时,还把病因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考虑。《黄帝内经》中说: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

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俞”即输，传输。也当经穴讲。风气侵入人体的途径是经俞至经，最后到脏。通常的情形，春天起东风，人多得肝病，病发于颈项；夏天吹南风，人多得心病，病生于胸胁；秋天西风萧萧，人多得肺病，病发于肩脊；冬天刮北风，人多得肾病，病发于腰股；中央属土，时当季夏，人多得脾病，病发于脊。由此看来，人体与五方、五季、五气也息息相通，相呼相应。

在中医理论中，人的体形也被纳入五行的框架，中医根据人的体形把人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又根据角、徵、宫、商、羽五音的阴阳多少和左右上下将每一类再分成二十五类。其分类的方法也是取象比类，按各行的特征加以区分的。以木形人为例：木形人整个外形象木一样瘦长，头小、肩宽、背挺，手脚灵活，肤色青。木形人的品质为有才干，好思索，气力不足、常发忧愁，做事勤恳。木形人的体质是，春夏健壮，秋冬易病。将木形人再分为五类，属于“上角”的人，神情“佗佗然”，意态从容自得；属于“大角之人”，处事“遗遗然”，迟疑不前；属于“左角之人”，处事“随随然”，随和顺从；属于“钛角之人”，处事“推推然”前进；属于“判角之人”，神情“括括然”方正。中医由人的天赋体质进而分析人在社会品格方面的共性和个性，固然是基于经验基础之上，缺乏理论根据，但也是人类学上具有意义的探索。

中医还运用五行生克的理论对人的精神进行调节，其方法就是用相生相胜的情绪对另一种情绪进行调整，人的怒喜忧悲恐分别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怒属木，喜属火，忧属土，悲属金，恐属水。因此，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忧伤脾，怒胜忧，悲伤肺，喜胜悲，恐伤肾，忧胜恐。五情与五脏相通，又

与五行相应,所以当一种情绪过度伤及有关的脏器,就可以设法让病人将情绪转移到能对原情绪起克制作用的新情绪上,这种“移情”法对病的治疗有很大帮助。比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在新婚之夜发现新娘子并不是自己的爱人林黛玉时,一时间又怨又怒,病势更重。薛宝钗干脆将林黛玉已死的真实情况告诉贾宝玉,贾宝玉由怒转悲,大哭一场,病情反而好转。

五行学说也是中国药学的理论主干。中国药学的集大成者是明代的李时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荑,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

李时珍明确地肯定了五行是世界万物的物质形态,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五行作了个案分析,他认为:水为万物之源,“其体纯阴,其用纯阴”;火为万物之先,“有气无质,造化两间,生杀万物,显仁藏用,神妙无穷”;土为万物之母,五行之主,“至柔而刚,至静有常,兼五行生万物而不与其能”;金石从土,“石者,气之核,土之骨,……其精为金”;木为五行之一,“性有土宜,山谷原隰。肇由气化,爰受形质。”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把五行学说用于对药性的分析,例如,参在中药中是一种常用的药物,但参的品种很多,药性也各不相同,人参属土,沙参属金,玄参属水,壮蒙属木,丹参属火。五参五色配五脏,则人参入脾曰黄参,沙参入肺曰白参,玄参入肾曰黑参,壮蒙入肝曰紫参,丹参入心曰赤参。五参的药性不同,其用途也不一。

除了植物可以用五行进行分类外,动物同样也可以有五  
行之分。李时珍在对鸡的分析中说:

丹雄鸡得离火阳阴之象,白雄鸡得庚金太白之象,故  
辟邪者宜之;乌雄鸡属木,乌雌鸡属水,故胎产宜之;黄雄  
鸡属土,故脾胃宜之;而乌骨者,又得水木之精气,故虚热  
者宜之,各从其类。

这是根据鸡的五色与五行比类,来说明鸡的药用功能。

不特动物如此,人也禀五行之气而生,所处的地方风土气  
习不同,则其得五行之气也不同。李时珍认为,山林之民毛而  
瘦,得木气多。川泽之民黑而津,得水气多。丘陵之民团而长,  
得火气多。坟衍之民皙而方,得金气多。原隰之民丰而痹,得  
土气多。五行之气在人体内相济相合,则百病不生。一旦失调,  
其用药根据五气所郁,各有不同,“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  
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  
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无论是诊断还是用药,都要对  
病因和药性进行五行归类,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对症下  
药,生其不足,制其旺盛。

几千年的中国医学发展的实践证明,运用五行学说进行  
医学和药学的辩证,是行之有效的中医哲学和方法,在西医眼  
里,人体被解剖到一个个具体的器官;而在中医眼里,人体是  
由看不见的五行之气生克运行组成的系统,其所具有的抽象  
意义和思辨意义,使中国医学蕴含着独特的魅力和奥秘。

## 四、五行与炼丹术

古人炼丹(外丹)以求长生,从秦始皇开始,便有方士欲炼以求奇药,此后炼丹、服丹的风气泛滥,不仅一班昏庸的皇帝、官僚迷信丹药,甚至英明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君主,俊杰如韩愈、元稹、杜牧这样的诗人文豪也不例外。但“邀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死于丹药者不计其数,但得长生者未闻其一。所以,从宋代开始,丹药便不再拥有昔日那么多的信徒,逐渐走向衰亡。

炼丹虽然不可能求到不死之药,但炼丹术却是近代化学的先驱,炼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从化学的角度来审视炼丹术,其科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古人炼丹也有其思想体系,气和阴阳五行是其理论基础。气论学说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本体;阴阳学说回答事物变化的原因;五行学说解释事物变化的过程。

中国现存最早、最重要的炼丹术著作是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在这本书中,谈到了五行生克论在炼丹术中的运用,炼丹术中的龙虎化合,便是五行生克变化的典型例子。其中“青龙”居东方,为木;“白虎”居西方,为金。因此,龙虎的化合是从金克木开始。金去伐木,木生火以抵抗,火能销金,金遇火便想法自救,生水以灭火,最后“水盛火消灭,俱死归厚土。”因为水的克者是土,土镇水不起,这个化合反应链便告一段落,龙虎便化合成“丹砂”。

丹砂既由五行化合而成,其成分便是“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在这个化合过程中,东方木和西方金,分别处于相对立的“龙虎”两方,当

龙虎相斗时，金之子行水，便由北方转到西方助金作战，故曰“金水合处”；而木之子行火，便也从南方赶到东方帮助母行木抵抗金水，故曰“木火为侣”，四者混战，龙腾虎跃，斗来斗去就俱化合归为土，成为丹砂了。这个龙虎化合的过程，实际上便是五行生克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过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是以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为基础作出的相对合理的结论。

魏伯阳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以他的炼丹实验为根据的。《周易参同契》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提炼“还丹”的过程，即先将金（金属铅）与水（水银）化合，再加入炭火，金、水、木、火相互含受，由固体而液体，再凝固成为“黄舆”。随着岁月的流逝，“黄舆”崩解为粉尘，再将粉尘在鼎器中长时间的反复加热，便成为“还丹”。还丹的作用，用魏伯阳的话说，便是

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  
……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  
发白更生黑，齿落出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  
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也就是说，由于金性不败朽，将之移入人体内，可以使人长生和返老还童。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幻想，所以引得许许多多的人如醉如痴，执迷不悟。

## 五、五行与古代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自然科学，在上古之书《尚书》中，便有《禹贡》一篇专门论述地理的文件。春秋战国年间，五行思想大盛，逐渐向地理学渗透，人们在论述地理环境时，便运用了

五行思想。

例如，五行与五气相配，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种配法很明显是来自于人们对地理气候的直观经验，根据了一部分中国大陆气候的特点：东边多海风，南方暑热，中部黄河长江一带温湿，西部地带干燥少雨，北部地区寒冷。五行五气五方明确而又直观地对中国大陆的气候地理进行了分区。

五行与五色相配，东方木色苍，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黄，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这种五色方位的规定，也是参照中国大陆的土壤分布而来。万国鼎先生在《中国古代对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一文中说：

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陕西与河南是黄土区域，南方有红壤，北方有黑色灰化土，都很明显，西方有盐渍土，干燥时土面现白色，西北大面积的沙丘、灰钙土、漠钙土等颜色也较浅，东方则湿润时土现青灰色，也还勉强说得通。也许古代创建五色方位的时候，是参照实际土色分布的。

由于一方土代表一方的疆域，故古代帝王使用五色土作为封建仪式中必备的道具。《周书》说，分封一方的诸侯在接受周天子的封建时，在国中建立大社坛，坛上堆放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黄土。将被分封为诸侯者从坛上凿取属于自己那一方色的土，作为取得对那块地方的管理权的象征，这一块色土便被诸侯拿回封国，放在社坛上，受到国人的顶礼膜拜。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内，便有一座被人们称为“五色土”的大土坛，它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五色土象征五方，五方归属中

央，它是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象征。这座五色土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年间，坛分三阶，用汉白玉砌成，坛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泥土。坛北的木结构大殿中山堂，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

五行除了与五方、五气、五色相配，它还与五音、五味相对应。木音角，其味酸；火音徵，其味苦；土音宫，其味甘；金音商，其味辛；水音羽，其味咸；《管子·地员篇》便根据五行与五音、五味的配置，对江淮河济间大平原的五类壤与水泉深浅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息土，呼音中音，其水苍，三十五尺至泉。赤垆土，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二十八尺至泉。黄唐土，呼音中宫，其泉黄而臭，二十一尺至泉。斥埴土，呼音中羽，其泉咸赤，一十四尺至泉。黑埴土，呼音中征，其水黑而苦，七尺至泉。这种对泉水颜色和味道的描述，是关于地下水分类的观察认识。不同的土有不同的水色和味道，其水位高低也各不相同。但由于这种认识被生硬地拉入五行的框架，便有附会和不真实的成分。

《管子·地员篇》还对九州之土进行了述论，将土壤的种类和它们对农业生产的等次优劣进行了分类。九州的土壤有十八类。即粟（息）土、沃土、位土、蔭（隱）土、壤土、糈（浮）土、忒土、𦵏（垆）土、塏土、𦵏土、沙土、埴土、犹土、𦵏（壮）土、殖土、𦵏土、𦵏（鸟）土、桀土。这十八类土壤又各依据五种品色，分为五种，共九十种。其分类法完全受五行框架的影响，每类土都分青、赤、白、黑、黄五色五品，这就使本来有实际意义的土壤分类和土壤性状认识，流于生搬硬套和牵强。

除了《管子·地员》外篇，汉代著作《淮南子》在论述五方的矿物时，也同样受五行思维框架的影响，它以正中配黄色，有黄埃、黄颡、黄金、黄龙、黄泉、黄云、黄海。东方土配青色，有

青天、青曾、青灏、青金、青龙、青泉、青云、青海。南方土配赤色，有赤天、赤丹、赤灏、赤金、赤龙、赤泉、赤云、赤海。西方土配白色，有白天、白晷、白灏、白金、白龙、白泉、白云、白海。北方土配玄色，有玄天、玄砥、玄灏、玄金、玄龙、玄云、玄海。这种分类显然是沿着五行五色的惯性思维轨道作随意性的滑动，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由上述可知，五行学说在地理学方面的应用，有些内容体现了古人对地理知识上的认识，但由于古人试图用五行框架去对复杂的自然现象作简单划一的归类，用五行公式去支配和解释一切个别事物和现象，便走不出牵强附会的迷宫，得不到事实的真相。

## 六、《五行志》与自然的奥秘

从班固撰《汉书》，创立《五行志》，记载天灾人祸，怪诞变异，将之与五行相配，以示天谴之后，历代正史史家多沿用其例。如果剔除《五行志》中天人感应的唯心观点，《五行志》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绳绳续续两千余年的自然灾异史，它所记载的地震史、水旱史，天象变化史、蝗螟灾害史等等，为我们研究自然的变异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它所记载的一些怪诞现象在当代也时有发生，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因此，历代的《五行志》是一系列记载自然奥秘的极有价值的文件，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历代《五行志》关于天象的记载，保存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例如，世界上一致公认的第一次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在《汉书·五行志》中，书中记：“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更大的

太阳黑子出现在东汉中平四年,《后汉书·五行志》说:“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次年五月,又“日色赤黄,日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如此之大,形状不一的太阳黑子,在历史记载中是十分罕见的。它为太阳黑子的研究提供了特例。

在历代《五行志》中,还有关于日蚀和日晕的不间断的记载,中华民族广褒的国土为日蚀的观察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有的日蚀负责观察记载的京城史官看不到,便由地方有关官员观察上报,这些情况在《五行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为今人了解两千余年的日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五行志》中,报道了一种奇特的天象。《汉书·五行志》记:

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现。

《后汉书·五行志》记:

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前者是关于两月重现的记载,后者是关于太阳同一日反复在东方和西方多次出现的记载,太阳和月亮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和速度,不可能在运行中又倒退回去重走,那么《五行志》中这种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究竟怎么去解释呢?它极有可能是UFO即所谓“不明飞行物”或“飞碟”,古人不了解航天技术,误把在天空飞行且有光的圆形物体认作为太阳或月亮。

从《五行志》记载来看,不仅 UFO 可能光临过地球,外星人也可能在地球着陆,进行过实地考察。《新唐书·五行志》记载:

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六月,……,宣州大雨震电,有物堕地如猪,手足各两指,执斑斑蛇食之,顷之,云合不復见。

从这段记载分析,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生物面像似猪,可能是头带了面罩,手足有区别,又手执赤斑蛇,可见是直立的生物,手执的赤斑蛇或许是什么尖端武器,它在隆隆的响声中着地,又在云雾烟气中不见,极类似飞行器的起落情况,这个从天而降的生物会不会是来访的外星人呢?

历代《五行志》同时又是一部地震史,两千年来中国境内的地震几乎没有遗漏地汇集其中,整理这份资料,对于我们认识地震的规律将很有帮助。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年份地震十分密集,例如东汉从永初元年至延光四年(公元 113 年—125 年),除永初六年(公元 112 年)外,年年发生较大面积的地震,个中原因是值得探讨的。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 171 年)四月,河东发生地裂十二处,裂口长十里余,最宽处三十余步,深不见底。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京城发生地震,佛殿门锁都被震开,铜佛像都被震出门外。

除了地震外,《五行志》还记载了历代自然灾害,如风雨雷电,旱涝蝗灾等。其中一些罕见的反常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气候的异常。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六月,正当暑天刮起寒风,气温下降如冬天,后齐天保八年(公元 557 年)三月,时值孟春,天气突然大热,至有人受暴热中暑而死。唐代

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六月伏日,本应为酷暑,天气却寒冷。引起气候的异常应该是有原因可寻,例如,现代科学研究揭示,火山爆发将会带来一定地区的气候变化。如 1982 年 3 月和 4 月墨西哥的埃尔奇琼火山先后 7 次大爆发,它的喷射物质给整个北半球形成了火山灰云带,厚达 3 千米。它使日光变色,地面温度降低。在《汉书·五行志》中,也记载有与这一现象极相似的情况:

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 43 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无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

太阳的变色无光,当是厚厚的火山灰云带吸收了太阳的射线,削弱太阳对地面的直射所致,太阳的光不能直接到达地面,气温便会下降,出现夏寒的现象。

雨肉、雨木和雨血。雨通常是雨水,但据《五行志》所记,雨的内容似远不止水一样。东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 149 年)秋七月,北地廉这个地方下起了肉雨,从天上掉下的肉颇似羊肋,有的大如手。无独有偶,晋朝愍帝建兴元年(公元 313 年)十二月,河东地震,也下起肉雨。唐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正月,在陈留方圆十里的地方下起了木雨,木棍皆粗如手指,长寸余,中心空。至于雨血,则历代《五行志》中几乎皆有记载,与其说是雨血,不如说是红雨,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红雨的成分进行化验,古人见雨为红色,便认为是雨血。除了下水雨以外,近现代也发生过下其它物品的雨,如钱雨、鱼虾雨等,科学家们对此已经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这些从天上掉下来的肉、木棍、钱、鱼虾等,都来自于地上,只是被风卷到天空,当风力减弱便落了下来。只是历代屡次出现的红雨现象,其生成原

因还待科学家作出合理的解答。

关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历代《五行志》中还有雨土、雨灰、雨草、雨尘、黄雾、黑雾、酸雾的记载。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 23 年)四月,便曾出现过“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的现象。《隋书·五行志》记,梁大同元年(公元 535 年),天雨土,次年,天雨黄灰。大宝元年(公元 550 年),天又雨黄沙。后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正月,天雨黄土。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京师雨土。这一系列的黄土尘埃下降的记录表明,在公元 6 世纪中的 50 年间,我国的生态环境曾有过较大的变化。公元 589 年正月,隋军挥师南下,江南建康下起了酸雾,酸雾弥漫,入鼻辛酸,陈后主被酸雾所迷,昏睡至晡时(下午 3、4 时)才醒。这些黄土尘埃和酸雨生成的原因何在,如果说近年来西北不少地方下过黄土尘埃,从西、北一直到长江流域的刮黄天气,其缘由是盲目开垦滥砍滥伐所致,世界上某些地区下过的酸雨,是工业污染所致,那么对于《隋书·五行志》中所记的雨土和酸雾将作何解释?用上述原因来回答显然是不够的。追寻古代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获得我国古代生态环境变化的时间、范围的全面科学认识,将会对我们现行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不无裨益。

历代《五行志》中,有关生物的变异等奇特现象也是其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诸如人的性别转化,人体的返祖或异常现象,畸形胎儿,人死复生,鸡的雌雄转化,牛、马、犬的畸形等等。这些古人无法理解和解释,只能视作天遣灾祥的生物奥秘,有很多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破译,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和解释,不再是不可思议值得惊怪的事了。例如,连体婴儿的诞生,在古代被看作是不祥之兆,《后汉书·五行志》记,光和二

年(公元179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了一个连体婴儿,以为不祥,一出世便被扔弃。《五行志》认为,连体婴儿两头共胸,是朝廷政治混乱,权臣秉政,二头之象。其应在董卓乱汉之上。与古代相比,在现代社会降生的连体婴儿要幸福得多,他们不再被看作是灾难的征兆,得到社会公平的对待,而且现代医学还能成功地进行分体手术,使他们恢复常态,作为正常人生活。人死而复生也是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在《隋书·五行志》中,记载了一件中国的朱丽叶与罗密欧的爱情故事,晋元康中,梁国有一女子已经订下结婚的日子,准备出嫁。不巧她的未婚夫被征去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子的父母只好将她另嫁,这个女孩子不愿意嫁给别人,一心要等自己的未婚夫,但在父母的强迫下,不得已出嫁,不久便在郁郁中病亡。女孩子的丧事办完后,她的心上人从长安归来,得知她已病死,便至她的墓前痛哭,不胜哀伤,一心要见她一面,遂发冢开棺,女孩子竟然活过来,和她的心上人一起回到家中。她的丈夫得知此事,至官府告状,争夺此女,官府不知该将她判给谁好。幸而当时著名的政治家秘书郎王导出来说话,认为“此是~~非~~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将女子断给了她的心上人,使这对有情人终成伉俪。当然,在历代《五行志》记载中,还有一些令现代人也觉不可思议的生命现象,例如,这些《五行志》中多次提到老妇人化为龟的事情,这究竟是荒诞,还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待证的问题。

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的奇闻怪事在历代《五行志》中也不乏记载,诸如动物中的鼠患,巨蛇、大鱼、异鸟等等,植物界的树非时令而华发,树上生树,瓜异本共生,树一夜之间暴长丈余等等。《隋书·五行志》载,陈祯明二年(公元588年)四月,群鼠无数,自蔡州岸入石头滩,至青塘两岸,数日死,随流出江。无独有偶,1993年8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曾播过

一条消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处草原上,到处可见死鼠的尸体,这些鼠既不是死于鼠药,也未发现患有流行鼠病。研究大批鼠死的原因,显然是个有趣又有意义的科学课题。《新唐书·五行志》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安南都护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横出两岸,经日而腐,寸寸自断,结果江中的鱼都被毒死,鱼尸蔽江而下,江水为之臭。安南热带地区本来就多蛇,但蛇如此之大,其毒如此之巨,确属罕见。《汉书·五行志》中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关于鲸鱼自杀的信息。书中说:

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

这样大的巨鱼当是鲸鱼。我国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很早就有鲸鱼出没游栖,秦始皇就曾将巨鱼作为海神的物象加以射杀。公元前4年的7条鲸鱼俱死,当是现代人们所说的鲸鱼集体自杀的实例。西方有关鲸鱼集体自杀的最早记录是1784年3月13日法国奥栋港32条抹香鲸的集体自杀,与之相较,我国的此类记载比西方早了1700多年,它对于研究鲸类集体自杀的原因将提供有益的资料。

由于历代《五行志》将所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与天人感应相联系,将五种自然之物金木水火土与人君的品质表现相联系,使《五行志》中大批极富价值的有关古代科学技术及自然现象的信息记录,蒙上了先验和迷信的灰尘,我们不能因为它表面上的灰尘而抛弃它内在的宝藏,这批宝藏正等待着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去开发和研究。

## 第七章 通神通灵五行术

火透波穿不计春，  
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唐·韩愈

### 一、五行与占星术

五行很早便与术数联袂，早在汉代，五行便作为一门独立的术数行世。汉武帝时，曾召各类占家聚会朝廷，询问皇子某日可否娶妇。经过一番推算，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不决，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汇报上去，请皇帝裁决。汉武帝当即下了一道制令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汉武帝一言定乾坤。此后“人取於五行者也”。

汉武帝推崇五行术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已臻成熟的五行理论包容万物，千变万化，无终无始，提供了物质世界构成和变化的答案，是当时中国人高度智慧的结晶，闪耀着思辨哲学的光芒。将五行导入术数虽然是误入歧途，但较之其它术数，五行术的包容性和思辨性显然高出许多筹了。正因为如此，汉代以后的各种术数多借五行观念以高其术，五行思想遂

成为中国古代术数的理论基础。

占星术是古人根据星象活动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人间事务变化因果的方术体系。与其它术数相比,占星术不属于民间术数,而属于宫廷御用术数,专门为朝廷政治提供服务。占星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与五行建立对应关系也很早,几乎五行思想一面世,便与占星术结下不解之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用五行给五大行星命名,建立起五行与五星的对应关系。正因为这样,包容在占星术内的五行理论便以质朴简单为特点,不象在其它术数中那样繁杂多变,而且它的许多概念也被其它术数所借用和发展。

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先秦人的天文知识相当普及,并形成一系列天文概念,这也是占星术的基础概念。古人把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后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自右而左旋转运行,又称五纬。金星古名明星,又名太白,它黎明见于东方为启明,黄昏见于西方称长庚。木星古名岁星,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区,因此以之纪年。水星又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

古人观测到的行星运行是以恒星为参照的,古人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参见《五行与五运六气》篇)。据此坐标,行星运行到某一区域就比较容易标示了。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便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标法。

除了二十八宿外,还有所谓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以北极星为中心,集合周围其它各星,合为一区,是与人间帝王对应的星区。明郎瑛在《七修类稿·天文类》中说:

紫乃赤黑相合而生，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水火相交，万物以之为生。万物以之为生，是万物之主宰。故垣具天枢星、天皇帝星。所以天子之居，亦谓之紫宸。

帝星所在的紫微垣，之所以称紫微，是因为紫色乃是火的赤色、水的黑色相交而成，水火相交生成万物，是万物的主宰。故紫微垣便成为天上诸星宿的中枢，人间帝王便是地上生灵的主宰。紫微垣以南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太微垣以西房心尾箕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五星在三垣、二十八宿中运行，其运行所成的天象，便产生了一定的生克凶吉关系。五行与五星的关系，用东汉张衡的话说便是：

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

也就是说，五行在地为体，其精气上聚于天，成为五星。五行与五星是一个统一体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一致的。而五行同时又与社会、人文、地理有许多相对应的关系，因此，以五行为纽带，组成了由五行、五星、五事、五常、五方等事物配合而成的一个天、人、地合一的大体系。天人互相感应，这种感应又是双向和互动的，人的活动会引起星象的变化，星象的变化又预示着人事的变化。在天、人、地三方中，天是主动，人是被动，地是辅助，人必须看天帝的脸色行事，根据星象的变化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政策。

五星的运行有自己正常的轨道，一旦它超前（称为赢）或滞后（称为缩），光色过亮或过暗，光线过长或过短，都预示着

人间的凶吉。并且,五星与五行一样,在不同的季节也有旺相休囚死之分,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其中某星处于旺的状态,则此星所在星宿的分野之国(与之相对应的地区或国家)有王者之事;某星处于相的状态,则此星所在星宿的分野之国则有与卿相相关的事;某星处于囚的状态,则此星所在星宿的分野之国有与囚犯有关的事,某星处于废(休、死)的状态,则此星所在星宿的分野之国将有与万民有关的事。五星在旺、相、休、囚、死各阶段有各不相同的星色,如果星色有变,如相时出现旺时的星色,地上则有相应的灾异或变化。

五星与五行对应,具有不同的使命,金星主兵事战争;木星主谷物收成;火星主天气干旱;水星主水涝天灾;土星主得地失地。木、土星逆向行驶为凶;火星运行路线弯曲为凶,金星出入不时为凶,水星隐没不现为凶,如果这五种星象并出,这一年必定是一个大恶年。五星之间也存在着生克关系,但不及其它术数那么繁杂。

以木星而言,木星又称岁星,主东方,在十干上属甲乙,地上人君在“义”方面有缺失,天上的惩罚便出自岁星,岁星的运行就会出现异常。岁星运行赢速,所在星宿的对应地区将有兵事不得停息,岁星运行缩速,所在之国将有忧患,亡国倾败。岁星停留在某星宿,其余四星也跟随岁星聚会在同一星宿,则这一星宿所主的国家将会以义而得到整个天下。岁星与太白金星相碰撞,金伤木,则其分野之国将要打败仗。

火星又称荧惑,主南方、夏季,在十干中为丙丁,人君的“礼”失,则上天的惩罚出自火星。火星的运行将会出现异常。火星出现意味着战争,火星沉入西方则战事消散,根据火星出入某宿的分野,可以确定战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在占星术中,火星主勃乱,如残害、贼害、疾病、死丧、饥馑、战争等。火星逆

行超过二宿以上，并停止不动，其停留的时间越长，灾殃便越大。五大行星如果都跟从火星聚集在一个星宿中则该宿之下的分野之国可以凭借它在礼方面的优势而获得天下。如果火星跟在金星之后，火克金，则正在作战的军队会遭受不利。星家认为，凡出现“荧惑守心”即火星在心宿徘徊不去的星象，便是帝王将死的征兆，这一类记载在正史中反复出现，有的帝王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便杀重臣自代以应天象。荧惑如犯相星，则宰相有难，如犯将星，则将军有灾。

土星又名填星，每年填(经)一宿，故名之。中央土，主季夏，在十干中作戊己，主德。填星是吉星，它运行所在的星宿分野对应之国在该年处于吉利状态。它的停留或不停留，停留的时间长短，都预示着该国是否得地与失地，福厚或福薄。五星如果随土星停留在同一宿，则该宿分野之国可以依靠它的厚“德”获得天下。

金星又称太白，主西方、秋天，在十干中为庚辛。凡人君在刑杀方面出现过失，天之惩罚出自金星。金星运行二十八宿，当出不出，当入不入则有破军或篡国之事出现。金星当隐行而不隐行，天下就会发生战争。金星不当隐行而隐行则天下刀枪入库，境外军队班师回国，古人用兵打仗特别注意金星的星象。由于金星含有杀气，故当它运行到某些星附近，某些星所代表的人事便会有凶事。例如，汉安帝永初四年，太白入舆鬼，占星家认为，太白入鬼宿不利于三公和武将，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中郎将任尚坐贪赃千万，槛车征至京城，在街市上斩首示众，被占星家看作是凶象之应。金星与其它四大行星相会相犯，一般都有大的变动或战事发生。张璠的《汉纪》载：

初，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轹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金火相逢，火锻金流，故王立称之为革命之象。汉以火德自命，与天上的火星相应，金星与火星相犯，是朝代更替的象征。火生土，故曹操以土运相应，移都许昌，许昌位于天下之中，地理位置上属土。由于金星是颗战星，故金星所在的方位往往是预测该方位国家或地区战争胜利的表象。五星随金星聚于一舍，其下方国家可以以武力纵横天下。

水星又称辰星，主北方、冬天，在十干中是壬癸，主刑。凡与人君用刑有失，罚出自水星。水星不出，天下气候不调，水星色黄，五谷丰熟，水星色红有兵事，色黑有水灾，色白有旱灾。五星随水星聚于一舍，其下方国家可以以法治得天下。水星出而不与金星相从，野虽有军，但终无战事发生。如水星与金星相从相斗，则战争不可避免。若水星不出，金星独耀，则先起兵者败。东晋时期，王敦反叛朝廷，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向占星家戴洋求问其胜败，戴洋回道说：

太白在东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者为主，应者为客。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客。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先起者败。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后，宜传檄所部应诏伐之。”

戴洋之言是以《史记·天官书》为根据的，该书云：“辰星不出，

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祖约接受戴洋的建议，起兵讨伐祖约，不久，王敦病死军中，叛军兵败。

由星象、五行、天、人、地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是古代占星术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人为臆想比附而成，它既无道理，也无根据，更无法加以验证。但古人在“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支配下，在惧天顺天的传统心理习惯作用下，包括一些正统的儒士在内，人们对占星术的信任、尊崇有加，如唐后期牛李党争中，儒士派首领李德裕时位居宰相，占星家观察星象，说荧惑犯上相星宿，上相下应宰相，故李德裕再次恳请辞去宰相职务，以求全身远祸，但不被唐武宗批准。在历代正史书中，史家们虽多以不语“怪、力、乱、神”相标榜，但对星象却独有所钟，将天象与社会、人事的变动互相联系和观照，认为上天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顺应天意则兴旺，违背天意则祸殃。它既表现了古人对深不可测的昊天的畏惧情绪，也是古人对至高无上的“天子”在思想上有所制约的手段。

由于占星术所预测的只是帝王将相和国家的命运，因而它是一种宫廷秘术，平民百姓是被禁止掌握和运用的，随着清代最后一任皇帝的下台，这项宫廷秘术已寿终正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二、五行与相术

相术是通过观察人的面貌长相、身材、声音等因素来预测人的吉凶的术数。人的音容相貌与自己的吉凶休咎发生联系，其中间桥梁便是阴阳八卦和五行。五行的抽象理论被相术借来解释有关人体与命运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大清神鉴》中说：“大凡相法识根源，金木水火土相连，相克相刑多破败，忽

若相生富有年。”可见五行生克理论是相术的根源。相术将五行与人的身体部位相配,运用五行生克原理来编排人未来的吉凶。五行在相术中,木为仁,主荣华茂秀,定人贵贱;火为礼,主势威猛烈,定人刚柔;金为义,主诛伐刑法,厄难灾危,定人寿夭;水为智,主聪慧明敏,定人贤愚;土为信,主德载万物,定人贫富。

相术首先相人面部,人的面部有五官,五官与五行、天干、四方相配为:

五官:眉(舌)	眼	鼻	口	耳
五行:火	木	金	土	水
天干:丙丁	甲乙	庚辛	戊己	壬癸
五方:南方	东方	西方	中	北方

相术认为,人的眉宜疏秀高细曲横,不宜低浓压眼斜。眼要黑白分明,长而凝然不动。鼻要高隆正直,不能左右偏曲山根断。口唇宜颜色鲜明,长而齿白细多齐。耳要轮廓好,色白红,下有垂珠,长过口。这便是五行的正形。五官既与五行相属,自然也有相生相克。如耳有轮珠,鼻梁正直高隆,则金水相生主大昌;眼明耳好则水生木,主富强;口方鼻直则土生金,主官运;唇红眼黑木生火,主财粮足;眉长唇正则火生土,主中年有福;眼长眉秀木生火,主文官显贵。耳大唇薄或唇大耳薄,土克水,主衣食贫寒;鼻大眼小金克木,主一世贫寒孤独;眼大耳小水不生木,主学业无成,虽有资财,寿命短促;眉小口大水克火,主性急孤单;耳小鼻蠢金水不相生,主悭贫心恶多灾祸;眉大鼻小火克金,主钱帛方盛祸来侵;鼻大眉小招贫苦,寿长无子;眼大唇小木克土,主无富贵;唇大眼小木克土,贫寒至死。

古人对相面之术相当信服,无论正史、野史都记载了不少有关相面术的故事。据宋人笔记《默记》记载,宋初名臣吕蒙正、张齐贤、王随、钱若水、刘烨等人未出道之前,一起跟郭延卿学词作赋,众人相约请道士王抱一为之相面,不料王道士外出未归,只留一僧人留守道观。众人对僧人师从道士感到很奇怪。僧人解释说,他师从王道士非学道,而是学相术,已经跟他学了30年了。众人听说,便纷纷请他相面,被僧人婉拒,请大家明日再来。次日,众人又一起来了,果然见到了王抱一,王抱一请众人入坐,然后挨个认真看了一番,不由得长叹说:“我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达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终未遇得,岂料到今日贵人尽在座中!”接着,他缓缓道来,说:“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道士相遍弟子,独不及其师郭延卿,郭忿忿说:“座中有这么多宰相吗?”道士便转为郭延卿相面,说:“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开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郭延卿听说自己反落在学生之后,虽登科而不能做京官,更是沮丧和愤怒交集,岂料后来众人命运皆如道士所言。《默记》属野史之流,所记当不乏道听途说的成分。作为煌煌正史巨著的《宋史》内中也有相面故事。据《宋史》载,前面所提到的钱若水:

幼聪悟,十岁能属文,华山陈抟见之,谓曰:“子神清,可以学道,不然当富贵,但忌太速尔。”

后钱若水以儒臣而知兵事,受到皇帝重用,惜辛劳太过,英年

早逝。可见，作为朝廷正统史家，《宋史》的作者们也是相当信奉相术的。

《宋史》中提到的陈抟是宋初著名的隐士和术士，传说五代末年，天下动乱，陈抟下华山访真龙天子，骑着毛驴周游天下，在长安遇见了赵匡胤、赵炅、赵普三人，乐得仰天大笑；几乎将头巾笑掉。他左手拉着赵匡胤，右手拉着赵炅，兴冲冲地邀他们同饮几杯，赵匡胤见独撇下赵普，于理不周，因此要求三人同往，陈抟仔细审视了赵普很久，方说：“可以，可以，换个人就不行。”到了酒店，赵普腿脚不方便，坐在了左边的位子上，陈抟一把将他揪起来，让赵匡胤坐了上首，赵炅次之，赵普叨陪末座。后来赵匡胤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赵炅为宋太宗，赵普为辅臣。当然这段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其真伪难以考辨。但陈抟的相术在当时拥有盛名当是事实，故宋太宗赐他名号“希夷先生”。

相术其次看人身材，身材也有五行之分：木瘦、金方、水圆、土厚、火尖长。根据人的形体可以分为木形人、金形人、水形人、土形人、火形人。形体与气色骨肉相应，谓之正局，反之则非正形。如金形人方形身材，骨坚肉实，色白气刚，便是金形人得金局，为人刚毅深沉，如果金形人兼有土局，色黄气荣，则金土相生，主有财富。土形人得土之正局，则得财库主富厚，如果兼得火局形气，色赤气枯，火土相生，亦主财富。木形人修长挺拔，色清气秀为木形正局，得之则资财足，但木形人得火局或金局，火焚木，金克木，则钱财消散。火形人得红活之气色，则主进家财，若兼清秀瘦直、色清气秀木局者，木能生火，主超荣之相。水形人圆厚而色黑气静，便是得水局，主增福寿，文学上有成就，如果兼方正色白气刚的金局，金生水，主一生发达无困滞。土形人得木局，虽然相克，但若土多木少，气色润泽也

无大害。木形人兼少许金气，虽然金能伐木，但木多金少，形貌轩昂，则木待金砍削而后成材。人的体形变化若先木后水，先瘦后肥，为水生木，是好的变化。若先方后尖是金见火，则为有灾。瘦木人若又变得干枯，为木带金气有灾。始方正金形后转为背隆肥厚，金人有土也是贵相。

相术甚至对各形人的发迹与沮滞的年龄都作了规定。金形人发迹在巳年，申年，酉年进入旺盛发达期，如果修有学业，则24岁上发禄，34岁上食禄。木形人若长得清秀，24岁发禄。水形人31岁发迹，41~51岁方能入仕做官。火形人21岁以前行运凶恶，中年有厄，至45岁方旺。土形人35岁发禄，50岁以前得禄。

相术讲究富贵在于骨法，忧喜在于气色，骨法气色中也有五行。骨与肉为君臣，骨不得多，肉不得少。金骨细肉滑如绵，多贵有钱；木骨瘦而青黑色，两头粗大多穷厄；水骨两头尖，“富贵不可言”；火骨两头粗，“无德贱於奴”；土骨大而皮粗厚，“子繁并富有”。春天的面色青为木旺，有喜事；面泛红色为木生火，也主吉；面出白色为金克木，主官鬼相扰；面出黑色水生木，有死亡事发生；黄色出面木克土，得财。夏天面有红色火旺，主有贵人提携；青色面容木生火，父母有喜庆事；白色出面火克金，有刑害；黑色出面水克火，诸事欠吉；黄色出面火生土，子孙有喜。秋天白色出面金旺，得阴财；面有青色金克木，主得横财；面泛红色火克金，因讼损财；黑色出面金生水，主兄弟哭泣；黄色面容土生金，父母有封赠，常人得财；冬天黑色出面水旺，得者不善也不忧；白色面容金生水，得贵人扶持；紫色面容水克火，水火相交为水家得地，得阴财，亦宜交易；青色面容水生木，父母有喜庆；面有黄色土克水；主失财。若四季有黑色，死亡将至。面有赤色火气的人，不宜往北方水位，反之亦

然。所谓：“面分金木水火土，色映东南西北中”，就是这个意思。

相骨(揣骨)术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很流行，《北齐书·神武纪》载，神武帝高欢还是一普通将士时，曾与朋友一起带着白鹰出外狩猎；

见一赤兔，每转则逸，遂至迴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囊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

这位盲姬，摸众人骨骼来推测富贵，说众人皆贵，且皆由神武而得。这当然是高欢的御用文人编出来神化高欢的故事，但它说明相骨术于南北朝时便流行于世。宋真宗做开封府君时，曾呼一盲人善相骨者到府中，令揣听僚属张耆、杨崇勋等人声骨，以为娱乐。盲相者揣听众人，有中有不中，唯揣听王继忠声骨时，惊骇道：“此人很奇怪，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后王继忠为观察使，高阳总管，在一次抗御辽兵的激战中，寡不敌众，兵败被俘。众人皆以为王继忠已死难，真宗闻之，十分悲伤。景德初年，宋辽构和，王继忠为辽撰奏章，促使宋辽和约，出力不小。此时宋朝廷方知王继忠尚在辽国任职。以后宋朝廷每年遣使赴辽，宋真宗皆亲封御带、药茗赐给王继忠，王继忠也不避嫌忌，南望宋廷方向，自称“未死臣”，哭拜不起，问宋真宗起居。辽朝皇帝欣赏王继忠的德仪雄美，招他为婿，封为吴王，改姓耶律，终老辽国，真的如盲相骨者所言，半生在汉食汉禄，半生在辽为辽臣。

宋朝的皇甫世通是一个善于相色的相士，据《夷坚志》补志卷十九中说，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洪适以司农少卿身份总领镇江，世通前往谒见，后返衢州，衢州太守刘兴甫邀世通至书院，恰有人报汤歧公拜左相，张魏公拜右相，刘兴甫评道：“二公归旧厅，从此福禄应未艾。”世通反驳说：“近来多次在马上觐见汤、张二公，色枯而促，岂宜进步，未必能一年，必有不可讳者。”刘兴甫问：“陈鲁公如何？”世通道：“也是短数。正使再入，仍不佳。”刘兴甫复问谁可为相，世通答道：“有一官员必为相，但地位尚远，言之公亦弗信，此人乃镇江洪总领。”刘兴甫大不以为然，指责皇甫世通一派胡言，说：“执政侍从甚众，岂无一人作相，反求在外一使者？”世通拱手道：“可与公立约，自今以后，除原来的丞相之外，有别的贵人先于洪公为相者，吾从此不再相人。”次年，汤、张二公辞相，不久相继亡故，陈鲁拜相在位也只两个月，而洪适果然于1165年冬擢为宰相，果如皇甫世通所言。

相术除了骨法、气色之外，还可从声音中推测富贵祸福，声音的五行特征是，“金声和润木声高，水音圆急火声焦，土声如居深瓮里，韵出丹田富贵饶”。木声远实鸣亮，火声焦散，土声深沉，金声远妙，水声清静为五行正音，若木声焦破，火声飘远，土声响亮，金声破败，水声微焦涩则为败运。《三国典略》记载，后魏末年，吴士目盲而善相声，丞相高澄命他试之，吴士闻刘桃枝之声，说：“当代贵王将相将死于其乎，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的声音，认为其“亦贵人也”。听到太原公高洋的声音，曰：“当为人主。”听到高澄的声音，则没有反应，有人在底下掐吴士以提醒，吴士只得谎说高澄亦当为国王。高澄后被膳奴兰京杀死，后齐诸大臣多因刘桃枝的附会牵扯而被赐死，高洋则做了北齐的文宣王。

相声之术发展到后来，相士们不仅可以根据人的声音来判断人的前途命运，甚至人所使用的器物发出的声音都成为预测人的祸福凶吉的依据。《夷坚志》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位神奇的相士俞翁。有一次俞翁在田间行走，听到田中流水声，便对人说：“水声悲，田将易主”。后来这块田果然被卖给别人。他曾入街市，闻乐声而预测道：“金声亢，其有兵，当在申酉间。然我无伤，兵四人当溺死。”后申酉期至，有戍卒自汀州还，过市群饮酗酒，争夺倡女，至抽戈相伐。有的恐祸及己身，乘暮色渡水而逃，正值春水方兴，戍卒落水溺死。有人问俞翁何以能预测其事，俞翁回答说：“日在子，又属水，水旺于子，金至此死焉。”俞翁推测声音凶吉所用的正是五行生克原理，但金水本相生，何以金至子水便会死亡？这是颇令人费解的解释。

相术也包括看手相，看手相也是运用八卦五行的原理，将手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等八卦位二十宫，又将八卦与五行相应，乾为天门属金，坎为海门为根基属水，艮为田宅坟墓属土，震为妻妾主身属木，巽为财帛为禄马属木，离为龙虎为官禄属火，坤为福德为父母属土，兑为奴仆为子息属金。这些部位如若肥润隆起，所主的事情昌吉，若低陷有乱纹则破败。

相术中引入五行观念较早，大约在战国时期即已有这种观念的萌芽。据《汲冢书·周书》记载，师旷为周太子晋相面看寿年，师旷说太子晋声清汗，色赤白，火色不寿，因为火性易灭。《易经·说卦·巽》也说人多白眼，相扬四白者，兵死，因为金主兵气，眼为木属，是金伐木之象。当然，作为一整套术数理论，相术中的五行生克原理完成当稍晚一些。五行与相术的结合，“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象取类，作没有根据的比附，是不可信的。事实上，人间许多长的一模一样的孪生子，命运却

不一样,有的长寿,有的夭折,有的富贵,有的贫贱。个人性格、能力、机遇,以及后天的努力不一样,即使相貌相同,也往往同貌而不同命。

历史文献资料中著录了不少相士预测灵验的例子,似乎相术具有神奇的命中率,但实际上书中所记的例子,只是相士预测实例中的几十万分之一,甚至更多,偶尔说中,便被人记载下来,而那些大量的没有被说中或似是而非的例证却被人忘掉。并且有许多例子根本就是人为了某种目的附会编造出来的。皇帝以及皇家贵戚为了神化皇权,自然要把自己的相貌说得非同一般,以证明自己今日的富贵权势乃是命中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许多相士也想攀龙附凤,充当天命定数的吹鼓手,一些御用文人或者相信天命和喜欢猎奇的文士,或有意编造,或不辨真伪,成为这些神奇故事的传播载体,致使那些本来很严肃的史家也被其迷惑,以疑传疑,载入史册。所以我们对文献所记载的神奇相术故事,应持慎重态度,不可相信。

### 三、五行与风水术

风水术是选择阴宅(坟墓)、阳宅(住宅)择吉避凶的术数。选阴宅是为了荫庇子孙,择阳宅是为了人丁兴旺,福禄双全。五行是风水术的理论基础。古人认为,人和水土、五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前面提到过的《管子·地员篇》便将水、土与五行相配进行分类,五行又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配,以五行为桥梁,便建立起了水土、五行与人的联系,因此,人们便试图探究水土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其所用的原理自然离不开贯穿这一系列因素的主线——五行理论。

在风水术中,五行理论运用是十分驳杂,除了正五行和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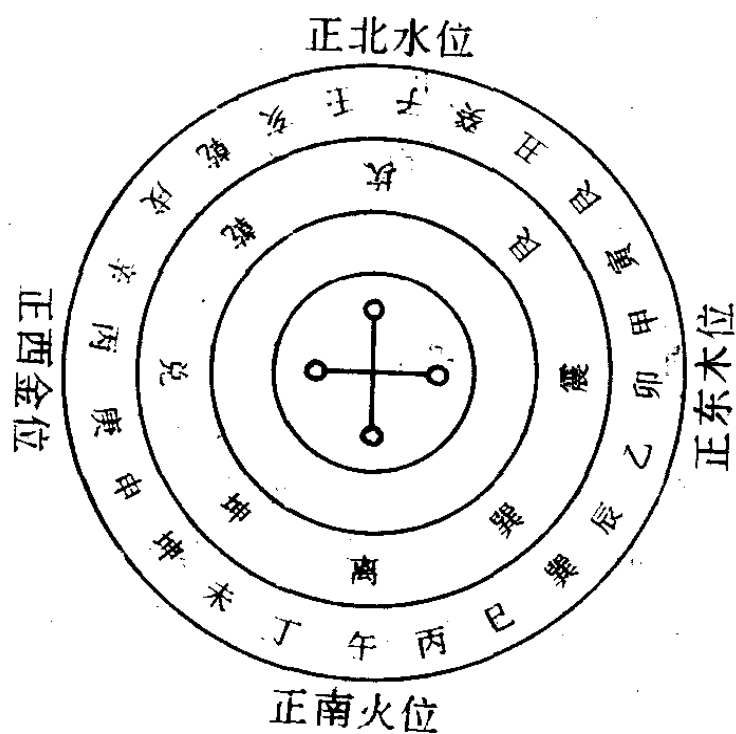
音五行外,还有四经五行、二十四山五行、三合五行、双山五行、八卦五行等等。

风水术中常用正五行以定方位,正五行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即将五行与五方、干支相配,形成东方木甲乙寅卯、南方火丙丁巳午、西方金庚辛申酉、北方水壬癸亥子、中央土辰戌丑未的配合。但在风水术中讲究坐山、向上,舍弃中宫,所以中宫土辰戌丑未便无定位,也有的术士将水与土合居一宫,五行实际上只用了四行,故称四经五行。

风水术既是选择吉地,所以特别讲究辨别方向,风水师辨别方向一般用的是大五行,将大五行与二十四位相配。所谓大五行也称“洪范五行”“宗庙五行”,它与二十四位的配法是:甲寅辰巽大江水,戌坎申辛水亦同,震艮巳三原属木,离壬丙乙火为宗,兑了乾亥金生处,丑癸坤庚未土中。洪范五行是由八卦爻变而来,甲本属木,纳于乾宫与坤交,以坤之上下二爻,交换乾之上下二爻,化成坎象,甲随坎化,遂属水。乙原也属木,纳于坤宫,与乾交,以乾之上下二爻,交换坤之上下二爻,化成离象,乙受离化,遂属火。丙本属火,纳于艮宫,艮与兑对,以兑之下爻,交换艮之下爻,化成离象,丙随离化,遂属火。丁本属火,纳配艮宫,兑与艮对,以兑之上爻交换艮之上爻,化成乾象,丁受乾化,遂属金。庚本属金,纳配于震,震与巽对,以巽之下爻交换震之下爻,化成坤象,庚受坤化,遂属土。辛本属金,纳配于巽,巽与震对,以震之上爻交换巽之上爻,化成坎象,辛受坎化,遂属水。壬本属水,纳配于离,离与坎对,以离中爻交换坎中爻,化成乾象,壬受乾化,当属金,因纳于离火,火焰金消,不能自立,退而附于离,遂属火。癸本属水,纳配于坎,坎与离对,以离之中爻交换坎之中爻,化成坤象,癸受坤化,遂属土。大五行中二十四位表示方向,根据五行生克来判断吉方凶方。

如巽方(水)水流向乾方(金),是水生金,吉方。乙方(火)水流向艮方(木),是艮木生乙火,也是吉方。

除了用大五行辨明方位外,近古的一些风水师如蒋文举等人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来定地理方位。二十四位是依天地成数推演得出,天数二十有五去一,地数三十去六,得数都是二十四。二十四上应天时二十四节气,下行地中二十四山方。正五行与二十四位的排列,不同的风水流派也各有不同,没有完全统一,以蒋文举的排法,则由八天干(去掉戊己),加乾、坤、艮、巽四位,加十二地支组成,正北水位坎卦壬子癸;东北艮卦丑艮寅;正东方木位震卦甲卯乙;东南巽卦辰巽巳;正南水位离卦丙午丁;西南坤卦未坤申;正西金位兑卦庚酉辛;西北乾卦戌乾亥,其具体方位如下图:



二十四位中每隔一位为一个地支,十二地支不问其坐向,用于放水来去并凶。因为子午卯酉是桃花咸池之地,辰戌丑未乃墓库魁罡之地,寅申巳亥乃神劫杀之地。再用五行生克的原理,

根据水流方向来判断凶吉，流向生方为吉，流向克方为凶。

三合五行运用的是五行生旺死绝的原理。将五行的长生、帝旺、墓的三宫支合在一起，如水的长生地是申，帝旺是子，墓是辰，申子辰合起来就是水局，同样寅午戌合起来便是火局，巳酉丑合成金局，辛卯未合成木局，土无方位，与水合并。

在三合五行的基础上，风水师又推衍出双山五行，将坤壬乙与申子辰合为水，艮丙辛合寅午戌为火，巽庚癸合巳酉丑为金，乾甲乙合辛亥卯为木，十二支中亥子属水，水的长生是申，申原本属金，金生水，故将申划归水，而申的同室坤也以类合。水墓于辰，辰原是土位，既为水墓，也归属水，同室的乙也以类合。这里申子辰是地支，属先天之气，坤壬乙是天干，属后天之气，天干寄生于地支。三合五行和双山五行都是用来推山水生旺之气，如水（包括土）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生是气之始，旺是气之盛，墓是气之终。天干与地支的结合正是气运的结合，水自旺方而来往墓方而去，则有吉无凶。

风水术中还有八卦五行和玄空五行等，因为用得比较少，这里就不赘述了。

五行用于拔砂推星相对简单些，主要看山的形体而判断该山属于何星（与五大行星比附），五星的正体是：金星头圆而足阔，木星头圆而身直，水星头平而生浪，火星头尖而足润，土星土平而体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木逢金折，金遇火伤，水见土不利，土见木不良，若火遇金得水无妨，凡有救则不伤，金水相生，木火通明，火土相济，水木相扶，金土相助。木居东方必旺，火居南方多兴，金属西方水居北方皆称得位。反之，金星山处东方木位，是金星克木宫，或伤长男长妇，或主生病，当然，金盛而得微火不算为克，因为金得火锻成器，木得弱金可制成材，燥火若无水制为凶。从五星本身形体来判断吉凶，则：“金

星形体净而圆，弓起浑如月半边。秀丽笃生忠义士，高雄威武掌兵权。木星身耸万人惊，倒地人看一树横，有木令人身贵显，欹斜不正反遭刑。涨天水星浪交加，或落平洋曲似蛇，智巧聪明多度量，荡然无制败人家。火星作祖似莲花，贪臣相承宰相家，只有开红堪作穴，亦须平地出萌芽。土星高大厚而端，半背屏风总一般，若在后龙兼照穴，兄弟父子并为官。火南水北木居东，西有金星土在中，此谓五星来聚讲，天壤正气福无穷。”

不同的山形，其葬法也有讲究，比如金形山体，则宜下水穴，穴内直外勾，象水的形状，是为金水泡穴，取其金生水之义。再如木形山，水生木，其穴同样也应作水形，称作水窝。

风水师对水的形状也很注意，将水分为金城水、木城水、火城水、土城水。金城水如月如弓，弯曲环抱阴宅，据说占有如此水形，则后人出凤产麟，如果水形反弓，则要受贫。木城水长直形如木，如果直冲穴位而来则人不安宁，如横过则有情绪懒散之嫌，如果从穴前斜飞而过则吉。水城水屈曲弯弯，向穴来去皆可，只是水口要窄不容船槎。火城水斗角尖斜象火焰一般，这样的水临穴则不吉。土城水像棋盘，从穴一边流过，则无不吉。

风水术比附五行理论，扯虎皮作大旗，倒也增添了其术的神秘效果。古代社会上至帝王，下至奴婢，多有信奉者。以帝王而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皆不惜巨资，为自己营建陵墓，他们的陵墓占天下吉地，以求江山千世万世皆为己有。那些贫贱至为人奴婢者，不甘于自己的处境低下，也希望借风水宝地，营葬先人，以求荫庇。《玉照新志》记，有一名黄进者，原为富室苍头奴，随主人为父择葬地，在山野间与风水师同行，风水师选得一处好穴，对主人说：“葬此地，他日定出名将。”黄进在旁听见，暗暗将地址记下，当夜携其父的遗骸埋在其处。不久黄

进便逃走，扯旗造反，被朝廷收降，后累立功勋，官至防御使。

风水术既将人的际遇与阴宅阳宅的凶吉联在一起，这就使许多人宁信其有而不得不加意小心，宋李略的《该闻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畋生者，家有一幢旧宅，房屋敞亮，可是却没人敢住。宅中每到傍晚，堂壁之下便有响声，听起来像铜铃，一晚上要响四五次，到天亮才停。后来一姓焦的道士点破其中原因，说：“妖祥之气，都是阴阳五行之气相生相克造成的，二气相博形成声音，你家中的响声，肯定是二气不和造成的。”畋生的父亲按照道士的指点，在偏室中屋的墙壁狭隘处开了一个洞，散发滞留之气，然后重新修好，铃声果然消失。焦道士的话不无道理，只不过古人仅凭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用声学原理去加以科学的解释，反而与阴阳五行妖祥之气牵扯上，将之作为禳除阳宅灾祸的普遍方法，不分缘由地加以使用，遂使科学变成为迷信。

在专制的封建社会，封建官员的发达与败落往往在倏忽之间，人们不了解这是专制社会人治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反把这种人生的无常归结为阴阳宅的风水五行冲克。《择尘三录》记：

绍兴庚申岁清明，侍亲居山阴，方总角，有学者张尧叟唐老自九江来从先人，适闻岳侯父子伏诛，尧叟云，仆去岁在羌庐，正睹岳侯葬母，仪卫甚盛，观者填塞，山间如市。邈后一僧为仆言，岳葬地虽佳，但与王枢密之先茔坐向既同，龙虎无异，掩塘之后，子孙须有非命者，然经数十年再当昌盛，予其识之。今乃果然，未知后如何耳。王枢密乃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乡里，有十子。辅道既罹横逆，而有名字者，为开封幕，过桥坠马死。名端者侍漏禁

门，檐瓴冰柱折坠，穿顶而没。后数十年，辅道之子炎弼、彦融以勋德之裔，朝廷录用，以官把麾持节，升直内阁。炎弼二子万全、万枢，今皆正郎，而诸位登进士第者接踵。岳自非辜之后，凡三十年满洗冤诬，诸子若孙骤从纆绁进蹕清华，昔日之言犹在耳也。

岳飞父子被秦桧等人陷害身死，30年后方得平反，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但风水师以及信风水术的人们将之归结为阴宅凶刑的原因，这种不辨是非，只信天命术数的观点，于岳飞父子何其不公！

风水术是不可信的，假如可信，风水师的后人应该作皇帝，居显要，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相一块风水宝地安葬先人，以荫庇后人富贵荣华。但实际上大凡风水师一般也不过以此混口饭吃，其后人也未见有飞黄腾达者，足以说明风水术之不经。即便在风水术盛行的古代社会，不信风水术者也大有人在，《后汉书·郭镇传》记，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案公平，从一下级职员做到司徒。雄小时候家境贫寒，母死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一些懂风水的术士们都说，葬在这里，后人当族灭，吴雄高不予理会。后来他的子孙三世官为廷尉，以法名家。肃宗时的司隶校尉赵光也不信风水，营建修缮阳宅，故犯风水禁忌，而家人爵禄兴盛，子孙均为高官。与之相反，桓帝时汝南人陈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陈伯敬如此守规矩禁忌，然终老寝滞，仕不过举孝廉，后又被女婿牵连，被太守所杀。时人不信风水禁忌者多举以为证。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看穿了风水术之不经，纷纷著文予

以批判。明人唐顺之著文批判道：

诸家之中，其尤炽者曰堪輿，其指划天地，支离五行八卦，奇中之说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验气、测量水脉，以宁死者而赞慈孝，如是而已。盖未有鬼荫之说也，自此说之行，至使子孙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与吉日，致其久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数十年之陈腐，非有一崩水齿而好数徙之。甚者，豫章饶歙之间盗地以葬，往往至于杀人而不止。然则，堪輿家之说，吾惧其不为祥而为孽也。

宋人司马光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风水术的欺骗性，他在《葬论》一文中说，他父亲死时，族人都说：“葬亲是一家大事，不看风水阴阳是不行的。”他的哥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一位姓张的风水师来，告诉风水师将给他高于一般酬劳 20 倍的钱，条件是必须听从自己的安排，风水师十分高兴的答应了。于是司马光的哥哥按照自己的意思选定了年月日時，又规定了墓穴的深浅大小以及送葬的道路，都以方便事宜为准。叫张某根据葬书加以论证，然后得出“大吉大利”的结论，拿给族人们看，族人们自然信以为真，没有人反对。司马光家这次安葬父亲，实际上并没有用风水家言，但也没有给司马光家带来什么祸害，他和兄长均得寿龄，全家做官的有 23 人。而那些信葬书的人家也未必强于司马家。司马光用事实证明了风水术的不可信。

风水术虽然是迷信，但作为一项拥有众多信从者的术数，它内中也不乏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份来自于人们对居住环境调节适应的经验总结，风水术借用吸收了这些经验，将之改

头换貌,以先验迷信的面目出现,但由于它本身内在的合理性,因而多有效验。《齐东野语》记:

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制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四舍,皆极宏丽。落成之日,纵外人游观,一僧善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凶。”和王方被殊眷,从容闻奏,欲引湖水以环其居,思陵首肯,曰:“朕无不可,第恐外庭有语,宜密速为之。”退即督濠寨兵数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继昼,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萦绕凡数百丈,三昼夜即竣事。……自此百余年间无闻火灾,人皆神之。

古代建筑乃砖木结构,极易发生火灾,杨和王建起如此宏大的建筑群,如果没有水源,一旦失火,将束手无策,故这位僧人提出要引水的建议,从保证住宅安全的角度,是有道理的。但它与运数凶吉无关。风水术虽然始于宿命归于宿命,纯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从整体上应该抛弃,但珠混于鱼目,从中甄别其合理的成分,也是有益的。

#### 四、五行与测字

测字就是将汉字进行分析离合,以判断凶吉。测字也吸收了五行学说中的一些理论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但相对算命和风水等术数来看,测字术在实际运用中对五行的依重不似前者那样须臾不可分离。

测字术将汉字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格式。以木式看,“有直不斜方是木”,即(十)形,凡字中不偏不倚的一竖才可以

看作是木，但是丨木若上下左右无依无靠又称为冷木。直丨横放，三横平行即(三)形，称为湿木，湿木必须是两横短，一横长，左右无钩，如“春”字上三横，才是湿木，凡左右有钩及三横不分短长的字都不能作木看。乙形是舟船木，用于占水面上行事，如用在占别的事上，则作土看。

火式。“撇长撇短皆为火”，笔画是撇，无论长短都作火看。“点边得撇为炎火”，即(ㄣ)形，但如果点不与撇相联，点则属水，不能看作炎火。“八字相须火可求”，(八)形为余火，但八字形中撇捺两笔必须一样长，否则八字中捺长作金看，撇长作火看。“四点不连真化火”，即(灬)形，称为真火，如点点笔法相连不断则属水。

土式。“横画连勾作土称”，即(一)形，如横画无勾，直无撇捺相辅便是寒土，化为水用，如“二”“旦”等字。像“血”“土”等字横与竖相连，则非寒土。“横直交加土最深”，即(十)形，称为深土，因横中有一直木，非深厚之土不能培木，所以称深土。“一点悬空土进尘”，即(丶)形，像沙尘土，但是这一点必须悬空，一般都是末笔一点，如果点与其它笔画相连则不是土而属水了。比如“求”字，“戈”字，都是末笔一点悬空便是土，而“文”“户”等字，都以起头一点，与横相连，故属水。“点挑撇捺同相聚，共总将来化土言”，(火)形也作土看，如“必”字。

金式。“一挑一捺俱为金”，即(乚)和(ㄥ)形，但(乚)挑起定要有锋尖，如踢起无尖则不看金看。“捺要下垂始为金”，即(ㄥ)形，如果捺的走向平平，如“乚”旁，那么这样的捺便不是土而属水了。“口小金方莫错谈”，(口)形也是金，但必须是小口，如果是国字框，像“因”“国”等字，则不能作金看。“腹中横短是囊金”，即(目)形，假如目中两横长满，便变成了无源水，如果目中是两点而不是两短横，也是水而非金了。“两点加挑

金在水”，即(𠂔)形，意即这种金乃水中之金。“空云独作寒金断”，即(𠂔)形，称作寒金。“穿心撇捺火陶金”，即(义)形，意即金在火中。

水式。“一点当头称作水”，即(丶)形，这一点水是雨露水。三直相连也是水，即(川)形，因为川为河流山川，它本身象水，故川字也归水类。中央一满横乃无源之水，即(曰)形，如横短不满则作金看。走之形是平捺，即(乚)形，称为“平稳水”。数点相连，即(~~~~)形，称为“野水”。(一)形是土寒化水，但如果横上有其它笔画依附，则仍看作土，不作水。

汉字除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式外，还有些笔划属于五行全备的笔画，比如(丶)点，点得端正无破绽，呈鸦嘴形，则是五行全备的笔画，如不合上式仍作水看。(一)字形，也五行全备混元一气之形。(o)圆形是五行全天之象，(口)国字框“四匡无风全五行”，也就是说，国字框四匡紧密严不透风也是五行全备，如笔画稀疏漏风则不是，它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而五行乃天地万物之本，故圆和方都是五行全备之象。

与其它术数一样，测字术同样也将五行与天干、八卦配合，形成自己独特内容的五行干支和五行八卦汉字分类体系。

天干中的甲乙、地支中的寅卯属木，与汉字木式笔相配，字中直长者为甲寅，是阳木，细短者为乙卯，为阴木，但(三)形湿木，(乙)形心钩木则在干支中无位，不能与干支配。如“車”字中央一直，彻上彻下，强健无损，则是甲寅木，“幸”字上一直，下一直皆短弱，则作乙卯木看。

干中丙丁，支中巳午属火，与字中火式笔画相配，撇长丙巳属阳，撇短丁午属阴。如“庐”字中一撇较长，是丙巳火，“从”字撇虽多，但比较短，是丁午火，而八字形以及四点之类皆是火之余，不作干支论。

干中戊巳，支中辰戌丑未属土，与字中土式笔相配，横中有直是戊土属阳，画短横轻是己土，属阴。长而粗者为戌辰，属阳，末点勾陈皆丑未，属阴。如“聿”字中第二画长，最后一画长，其余都比较短，那么长者为宜土，短者为阴土。必须以横中有直者为准，如无直画或没有依辅者，则另当别论。轻细笔画虽长也作阴土看。

干中庚辛支中申酉属金，与字中金式笔画相配，则口字为庚申，是阳金，挑从酉，捺从辛，是阴金。空云寒金和囊中金都不在干支数内。

干中壬癸，支中亥子属水，与水字中水式笔配，点在当头作癸，腹中为子，点在腰中为亥，点在足下为壬，其余野水不入干支。如“文”字一点当头是癸水，“月”字腹中两点是子水，“景”字中腰一点是亥水，下面两点是壬水。

五行与八卦相配是：口形为兑捺为乾（金），三画无伤乾亦然（水），三点同来方是坎（金），撇如双见作离占（火），土山居上名为艮（土），居下为坤不必言（土），蛇形孤撇皆从巽（木、火），云首龙头震占先（金），详明八卦知凶事，学者参求理自全。

在测字术中，五行与六神相配为，木配青龙，朱雀腾蛇属火，勾陈属土，白虎属金，元武为水。

测字术既将汉字分化为五行格式，则同一字中可能同时有几行并存，测字先生便根据五行生克原理加以推算，如“水在木中流，替人涤垢”，“木从水中出，脱体犹难”，“金两重临微火，熔金难成器皿”，“弱金克木反自损伤”，“金多子多，非土不得”，“土厚财厚，无火不生”，“水冷木孤兄弟难靠”，“金寒土薄祖业漂零”等等。

除了将汉字分为五行格式外，从字的整体形状看，也有五

行之分，“上大阔方，火乃发用。坚瘦有力，木乃生荣。金要方而水要圆，土要肥而木要正。炎炎火旺，玉堂拜相；洋洋水秀，金阙朝元。木盛兮仁全义广，金旺兮性急心刚，土薄而离巢破祖，土厚而福禄绵长，木少水多根根折挫，金多火多两窟三窝，金斜而定然少子，木曲而中不财丰。”不同的人写字都有轻重粗细方圆坚瘦之分，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命相，命相与笔迹也就产生了五行生克的关系。如金命相逢火笔主克陷妻儿，木命亦怕逢金，破财常有；水命不宜土笔，不见男儿；火命若见水笔定生口舌；土命若见木笔祖产自消。

另外，测字术中也引入了五行四季休囚生旺的理论，五行与四季的对应是，春木夏火秋金水冬，而土则与四季之月相配，写字如草木，写在春夏则生旺有财，秋冬则衰替多灾，其它也如此类推。

测字术中也讲究四方与五行，例如，行人测字，所去的方向与字的五行属性便存在生克制化的关系。据测字书记载说，江南有一富人带一小伙计去京师，临行前又增添了另一小伙计，为了测此行凶吉，便写了一个“火”字去问测，测字先生说：“此去大吉，因为火字叠见是炎字，北方是水乡，此去有既济之义，故利。”那人说：“北方水旺，炎字旁加水，乃是淡字，财气不是淡泊了吗？”测字先生解释说：“你的两个小伙计是南方人，南方在五行上属火地，跟官之人势必炎炎，而字中又有两重火，其势太过。所幸是远游北方水旺之乡，得水来制止其火旺之势，正是吉利之象。”这个例子正是把五行与五方之间的生克关系运用于测字中。

将五行生克运用于测字术，当然不外乎是高深其术，使其预测有理论依据，但在历史笔记小说或人物传记中，有关测字术的实例中，真正涉及五行笔式生克分析的故事很少，往往是

就字的分合增减而言凶吉。例如两宋之交著名的测字术士谢石，有一次为一朝中官员测字，这位官员之妻怀孕已经13个月，尚未分娩，故其妻写了一个“也”字，请丈夫持来问测。谢石见字说：“这字是你的内人所写的吧？”官员问道：“此说的依据是什么呢？”谢石道：“焉哉乎也，都是说话的语助词，故知是你的内助所书”。谢石还据也字推知其妻年纪31岁，因为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谢石又分析道：官人让拆此字，是欲有所动而不能也。“也字着池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这样如何动得了呢？再者，你内人的父母兄弟及近亲已无存者，因为也字着人是他字，但是却不见有人；你内人家的物产资财也已荡尽，因为也字着土为地字，但是却未见有土，其事是否如我所说？”官员道：“的确都像你说的那样，但这些都不是我想求问的，只是因为贱内怀孕过月，至今不产，心中忧虑，想问问先生有何结果。”谢石说：“你的妻子怀孕已十三个月吧？”官员答是。谢石接着说：“也字分而为十三，故知妊娠十三个月，只是尊夫人并非吉兆，所怀是一怪胎。也字加虫为虵字，需及早医治才是。”并授治疗之法。官员回去依法而行，其妻果产下一大蛇（虵即古蛇字）。从这个例子可见，谢石测“也”字，并没有分析也字的五行属性，而是将也字加以分析组合，预测福祸。之所以古籍中记载测字的实例言及五行的不多，其原因有二，其一是用五行笔画测字，专业性太强，为笔记传记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所不取。其二是汉字与五行联系，实乃牵强附会，两者的契合并不严密，可以各自分离。由于拆字术不受成法拘束，言者尽可就字而论字，只要术者懂得汉字特点，善于察颜观色，随机应变，便可以挂出招牌，为人测字了，故一些沦落书生在万般无奈之中，无须多的训练，就能以此为业，混口饭吃。

测字术士们的信口雌黄，是不值听信的。《夷坚志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闽士曹仁杰，淳熙末预秋榜待补，明年入都。资无蕪资，假卖卜自给，在市售卦，一人来卜，为画一官人发怒，一“事”字甚大，而无挑脚，“忧”字半缺，一“喜”字下画不满。解之曰“君恐当官事，其祸大如天，然忧不戒，出此月，翻有获财之喜。”客请其说，曰“官既怒为可忧，而事不圆，故知无害。忧去则喜至，以下缺画，须候改月乃吉。”客曰：“诚如所言，吾必奉谢。”欣然而去。后旬日，持二万钱来馈，不谈曲折，但云：“足下之术神通，都城卦肆满街，无如公者，当广扬盛名，少效寸力耳。”曹之友叩之，答曰：“我本不能卜筮，而粗晓相法，认彼是公吏，非有公事不卜，视其面色，不见有灾厄，以是言之。”后访其人，果是府吏，因治狱受赇，怨家将告之，惧甚，府尹置不理，遂得钱三百千。

曹仁杰为筹足旅费而卖卜街头，并非真的能测字，但他认出求卜者是府中小吏，又猜知其“非有公事不卜”，又了解官场官官相护的弊端，故虽雌黄却非信口，又能自圆其说，由不得人不信服。

## 五、五行与择吉

择吉是人们进行各种生产生活活动时选择吉日吉时吉方的一种术数。它以干支历法为基础，以八卦、五行、九星、二十八宿、十二直、六曜等为内容，根据年、月、日、时各种神煞进行

推算,来寻找吉时良辰。

用五行来推算吉时良辰,其原理不外乎五行的生、克、刑、冲、害、化、合和五行的旺相休囚死、寄生十二宫的生墓死绝。择吉术以此作为判断吉凶的准则,制造出自己的吉凶体系。

### 1. 据五行生克原理推衍出的吉凶

在择吉术中,干支所属五行相生相合,天地和合者即为吉利,反之,相克相冲相害,天地之气发生冲突,辄是凶恶。

天干生地支称为宝日,如丁丑(火生土)、丙戌(火生土)、甲午(木生火)、庚子(金生水)、壬寅(水生木)、癸卯(水生木)、乙巳(木生火)、丁未(火生土)、戊申(土生金)、己酉(土生金)、辛亥(金生水)、丙辰(火生土)、干生支的日子是上上吉。

地支生天干称为义日,如甲子(水生木)、丙寅(木生火)、丁卯(木生火)、己巳(火生土)、辛未(土生金)、壬申(金生水)、癸酉(金生水)、乙亥(水生木)、庚辰(土生金)、辛丑(土生金)、庚戌(土生金)、戊午(火生土)、支生干是次吉。

天干克地支称为制日,如乙丑(木克土)、甲戌(木克土)、壬午(水克火)、戊子(土克水)、庚寅(金克木)、辛卯(金克木)、癸巳(水克火)、乙未(木克土)、丙申(火克金)、丁酉(火克金)、己亥(土克水)、甲辰(木克土)、干克支为小凶。

地支克天干称为伐日,庚午(火克金)、丙子(水克火)、戊寅(木克土)、己卯(木克土)、辛巳(火克金)、癸未(土克水)、甲申(金克木)、乙酉(金克木)、丁亥(水克火)、壬辰(土克水)、癸丑(土克火)、壬戌(土克水)、支克干为大凶。

择吉术中规定,一年四季中每季有一天为赦日,这四天天赦日由于干支相生,天地和平,因而是大吉之日,它们分别为:

立春后戊寅(土木)日

立夏后甲午(木火)日

立秋后戊申(土金)日

立冬后甲子(木水)日

五个地支为土的日子为五墓日,即戊辰、壬辰、丙戌、辛丑、乙未,五墓日是大凶日,原因是这五天天干地支相克。但实际上丙戌为火生土,辛丑为土生金,是干支五行相生的好日子,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择吉术中经常可以见到。

从甲申到癸巳之间的十日在择吉术中被定为十方墓日,这十日是:

甲申(木金) 乙酉(木金)

丙戌(火土) 丁亥(火水)

戊子(土水) 己丑(土土)

庚寅(金木) 辛卯(金木)

壬辰(水土) 癸巳(水土)

上述十日除丙戌和己丑外,其余八天都是干支相克,这些干支在二十四位中分别代表八个方位,加上天方、地方,共有十方,故称十方墓日,由于天地不和,因而这十天是凶日。

时干克日干称为“五不遇时”,在五不遇时,不可行军作战。

2. 据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五行休旺的原理推衍出吉凶。

无禄日。即甲辰、乙巳、庚辰、辛巳、丙申、戊戌、丁亥、己丑、壬申、癸亥十日。因为甲木的临官在寅,甲木行至寅称坐禄,乙木的禄在卯,但在甲辰旬中,寅、卯为“空亡”,寅卯所对的辰巳为“虚”,所以甲辰、乙巳二日为无禄,其余类推。由于这

些日子无禄空亡，凡有关求财的事情就应回避。

岁禄日。岁干恰逢自己的临官地支，称为岁禄。如甲木临官在寅，甲逢禄便是岁禄，因为临官意味着方兴未艾，较之帝旺极盛转衰之象吉利，所以岁禄是吉日。

土王用事日。五行在一年四季中有旺、相、休、囚、死五种运动变化形态，其中木、火、金、水分别旺于春、夏、秋、冬各七十二天，土则旺于四季之末的各十八天，加起来也是七十二天，这七十二天便是土王用事日，查土王用事的日子可以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开始，各上推十八日，就是土王用事日，在这些日子里是不可以犯土的。

男女益退财。择吉术将五行寄生的十二宫划为益财和退财两部分，从长生至衰为益财，从病至养为退财，绝为鳏寡，死墓为多厄，死墓绝为妨夫妨妻。如水命男以火命为妻，火生于寅而衰于未，故正月至六月生者为益财；火病于申而养于丑，故七月至十二月生者为退财；火绝于亥，故十月生者为望门鳏；火死于酉，墓于戌，故八九月生者为多厄，而八、九、十月生者又为死墓绝妨妻，其余均依次类推。

### 3. 根据五行冲合原理推衍出的吉凶。

四不祥日，择吉黄历以每月的初四、初七、十六、十九、二十八共五日称为“四不祥日”，忌上官赴任、临政亲民。因为这几天都是月朔地支的冲破之日，譬如月朔为子日，子隔三即为“破卯”，对七即为“冲午”，则此月的初四、初七、十六、十九、二十八非卯即午，其余亦可由此推出。

八专日。六十甲子日中最后十二个是：壬子（水水）、癸丑（水土）、甲寅（木木）、乙卯（木木）、丙辰（火土）、丁巳（火火）、戊午（土火）、己未（土土）、庚申（金金）、辛酉（金金）、壬戌（水土）、癸亥（水水），这十二日里有八个是同气相重，称为八专

日，五行理论中讲究和为贵，某行过于旺盛的日子，天地有所偏枯，则天地失去调和，人缘失于和顺，因而八专日是凶日。

每日冲煞。冲即十二地支两两相冲，将十二地支配十二属相，依次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因为子午相冲，称为冲马，丑未相冲，称为冲羊，寅申相冲，称为冲猴，卯与酉冲，称为冲鸡，依六冲类推。人们根据自己的属相，不要选用那些与自己属相相冲的日子。

三合。异位而同气称为三合。在十二地支中，每一行所属十二宫的生、壮、老三辰相合，便是三合。十二支中有四组三合，即寅午戌火之三合；巳酉丑金之三合；申子辰水之三合；亥卯未木之三合。所谓三合之日，即年、月、日三个干支中，若它的三个支恰逢上面四组三合之一，便是三合之日，在三合日里宜结婚亲，和合交易，修营起土，立柱上梁。

每年的一、三、九月是三合之月。《淮南子·天文训》云：

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一，壮五，终九。

换句话说，五行十二支依十二宫为序，每一行的生、壮、老三辰都是隔三合一，序数恰好都是一、五、九，配以月份就是正、五、九月。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向来视正、五、九三月为百官上任的忌月，因为根据三合之说，不论哪个朝代，其所应的德运生、壮、老三宫位都在正、五、九月，这三个月上任，施刑论责，

冲犯所应德运的三合,视为大忌。

五月忌。中国古代社会民间流传忌五月的习俗,这一习俗的来源,可能是五月属火,正值仲夏,火最炽烈,火味最苦,故俗忌之。明代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俗忌五月,官历不与焉,此是正当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忌者,太祖以闰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难之师;建文一支,灰飞不必言,而文皇之劳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日立皇后钱氏,皇后遂多病,无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在宫中伏地祝天,昼夜不辍,因而流湿折股,又幽栖南城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国,寻卒,无子,归葬西山。帝王如此,而况民家!则忌之未尝不是也。”

可见五月是忌婚、丧、嫁、娶、远行等大事。朱国桢作为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本不应信民间的俗忌,但在俗文化的强大感染力的影响下,他也不得不将信将疑,宁愿信从了。

反支日。与每月初一日的支发生对冲的第一个日子称为反支日,如初一有戌亥,一日是反支日,初一有申酉,二日是反支日,初一有午未,三日是反支日,初一有辰巳,四日是反支日,初一有寅卯,五日反支日,初一有子丑,六日是反支日。东汉明帝刘庄时,宫门管理处每逢反支日都拒绝接受奏章和官民陈诉,刘庄知道这件事后,奇怪说:“人民荒废田里耕作,千里迢迢,前来宫门投诉,却用这种禁忌来增加他们的困难,岂是设立政府的本意?”下令取消了这项规定。刘庄在对待择吉忌凶问题上的态度无疑是明智的,取消反支日禁忌也并没有给刘庄的政府带来什么灾难。

#### 4、据五行制化原理推衍出的吉凶。

制煞。在择吉术中,对于大的凶煞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中小凶煞则用制和化来对付。制煞即是根据凶煞的五行属性,用相克的五行来制服它。如煞属金,则用火制之,煞属火,则用水制之。煞的五行属性由所居的方位决定,煞居西方庚酉辛属金,则用丙火来制,如果年、月、日、时的干均为丙,那么丙火力盛,金煞被火神所克,无法为虐,其余类推。

化煞。化煞是根据凶煞的五行属性,用相生相亲者化之。如煞属木,用火日,使木生火化为土;如煞属水,用水日,同类相亲,煞成为比辅之神。若凶煞在东方寅位,用甲日,甲属木,同类相亲,而且甲禄在寅,煞即转为甲之禄,甲命用之,便是生命之禄,甲山甲向用之,并为山向之禄。余皆类推。化煞可以逢凶化吉,使凶神化为吉曜,所以古时择吉书常说:“若要发,修三煞”。便是这个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择吉术虽然以五行原理作为它的理论基础,但它本身又存在一些与五行理论相矛盾的地方。有些本是干支相生的宝日义日,却被定为凶日,如十方墓日中的丙戌。有些干支相克的日子又被看作是吉日,如“可得五男二女,利益大吉”的丙子日,却支水克干火,本应是大凶的伐日。像这一类吉日不吉,凶日不凶,吉凶无据,自相矛盾的情况在择吉术中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是来自术士们的胡编乱造。一方面他们用五行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使之更具欺骗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使自己的术数更高深玄妙,便又编出一些让人不得其所以然的吉日、凶日。

如果说风水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有益作用的话,那么择吉术则可以说是百害无益,妨碍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有时不仅没有给信奉者带来吉利,反而引咎获灾。西汉时,匈奴酋长来访,政府将之安排在居凶煞

之方的宾馆住宿,借之来镇压凶煞,匈奴酋长知道后,虽没明言,但却对汉政府有了意见,影响了民族关系。东汉初年(公元25年),邓禹与新市农民军作战,邓禹败。次日正好是癸亥,人们认为癸亥是六甲穷日,农民军首领王匡等人为了避免凶险,不愿出战,而邓禹则利用这一天时间重新整顿部署,第二天,王匡发动进攻,邓禹下令军中,不准作任何反应,等王匡大军逼近营垒时,邓禹悄悄传令,突然间战鼓雷鸣,全军反扑,大破新市农民军,王匡等人溃散。如果王匡等人不信择吉术,抓住战机,穷追猛打,不给邓禹喘息休整的时间,则不会遭此惨败。

历史上不乏不信择吉术的有识之士。《浪迹续谈》的作者梁章钜便例举事实和自己的经历来批驳择吉术的不经。他说,孔子、唐代宗、宋孝宗、孟尝君、崔信明,苏东坡等君王贤哲皆生于忌日,并没有什么灾难,而他自己也是于忌日娶亲,家中亲友都反对,认为必不可用。但是他的父亲毅然用之,他自己也不介意,后他的夫人膺封二品诰命,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寿,族人皆公认她为有福完人。由此可见,择吉术是无益无聊、不足为信的迷信。

## 六、五行与算命术

算命术是根据人的出生时间推测人命运的术数,其推测的依据是人生辰年月日时八个干支所涵阴阳五行不同的变化。算命术中的主要素是三元、四柱和运气,三元即天元、人元、地元。天元即天干,天干主禄,看人兴亡盛衰,职务高低、权力大小。人元即地支,地支主命,看人贵贱贫富。地元即纳音五行,主人的才能器识。三元中以天元、人元为主,地元作补充。四柱即年、月、日、时(也有用年、月、日、时、胎)的干支。运

即人在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气运,它也是通过人的生辰八字推算出来的。算命术中用五行原理运算可以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

1. 五行生克原理在算命术中的运用。算一个人的命,首先要确定人的四柱即年、月、日、时的干支,四柱中一般是以日柱为主,从日柱干支所含的五行属性出发,进行分析推论。这里我们只举木为例,凡日柱属木如甲乙寅卯类,必须先看木势的盛衰,木重水多为盛,太盛则其它三柱宜有金来伐木,如果金不足,遇土也可生金制水,且木用于克土,则木本身的盛势有了发泄处所。如果日柱中木微金强则是衰木,其它三柱宜有火制金,火少逢木也可挽救,因为木与木为同类比肩,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又可生火制金。如果日柱上水盛木漂,则取土制水为上策,无土遇火也可因火生土。如果日柱上是土与木配,土太重则木弱,难以制约土,则取其它三柱上的木帮助克土,没有木有水来生木制土也可挽救。如果日柱上是火与木配,火太多则木焚,取水克火相救,没有水则用金生水。在命理学原理中,分析八字中五行盛衰是断定一个人一生命运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其总的原则是求得五行动态平衡,一派和平景象,便是好命,自身五行太过与不及,便要力求扶抑补救,如果不能扶抑补救,便是坏命。

推完命还要推运,这对于人来说十分重要。有的人尽管生辰八字干支天地气和,莺歌燕舞,可是一生行运不好,只能在衣食无缺中碌碌无为过一辈子。有的人尽管生辰八字偏枯,一生屡有逆境,但运行得好,也有可能达到事业的高峰,出人头地,占一时之风流。推算运气通过一定的公式起运,然后按照起运的干支顺或逆排下去,每对干支管人生十年的大运,其中干主上五年,支主下五年,根据干支的五行属性确定人是行木

运抑或金运或其它运,再将运的五行属性与命的八字生辰五行属性参照,如果一个人命中缺木,而大运恰好行木运,则这个人有可能走运。当然五行生克在算命术中推算相当复杂,本章只能简而言之。

## 2. 五行四季在算命术中的运用

命理学家在算命时还要将人的生辰八字所涵五行与四季结合起来推算。五行在四季中各有旺相休囚死,如果一个人的日干碰上它旺、相的月支,便是得时,遇上休、囚、死的月支就是失时。例如,日干是甲木,木生于春,水能生木,所以月支如果是春月就属于旺,冬月就是相,都属得时;如果日干甲木不生于冬春之月,而生于火旺、土旺、金旺的月份,则火生木休,土旺木囚,金盛木死,都属失时。得时之木为强盛之木,不得时的木便是衰弱之木。

## 3. 五行寄生十二宫在算命术中的运用。

前面我们讲过,推八字以日柱为主,日柱中又要看日干与何地支相配,地支不仅本身具有五行属性,而且它还表示日干寄生十二宫中的何宫,是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还是衰、病、死、墓、绝、胎、养。天干逢临官为坐禄,遇冠带为向禄,坐禄向禄是富贵命,反之,天干逢绝,则为破禄,逢帝旺标志着盛极而衰,称为背禄,破禄背禄是不贫则夭的命。

## 4. 干支五行的刑冲化合在算命术中的运用。

干支五行的刑冲化合在算命术中运用得出神入化,变化多端,这里只择其要而述之:其一,两干相合,贵乎得中。这主要是指天干两两相化的情况。两天干相化合,一定要彼此状态相当,才能中而不偏。一方太过,一方不及,就不能中和了。其二,天干相合,有吉有凶。天干化合后,大多自身的五行属性还有五六或六七分力量,如甲己合木,木虽被合,但自身的五行

性质多半还存在。天干化合后的吉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三,地支六合,区别对待。五行地支中有六合,人的命中出现六合,有吉有凶,如命局中所喜的地支被六合合去之后,就要减吉,所忌的地支被合掉后,就会减凶。此外,地支合局还可以解除刑冲不吉。其四,地支三合,论吉论凶。在地支申子辰合水,亥卯木合木,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三合中,如果合局为命中所喜则吉,所忌则凶。其五,地支六冲,本气为重。命中地支相冲,首先表现在本气的冲克上,如果命局所喜的地支冲败则凶,所忌的地支冲败则吉。其六,地支刑害,略微摇动。地支子刑卯,卯刑子,原是水木相生;巳刑申,巳申本合;丑刑戌,戌刑未,都是同类的土;故上述地支虽相刑,但从根本上无大的矛盾。至于申刑寅,未刑丑,只是彼此相冲,并不激烈,同样地支相害也与相刑一样,彼此冲害不大,故只是略微动摇而已。

#### 5. 五行五方在算命术中的运用

通过对人的生辰八字所涵阴阳五行推算后,可以看出他行运的方向,以及该在什么方位生活活动最为有利。如有人利于行东方木运,不利西方金运,如果行运碰上西方金运,就会倒运,又如外出,有利于行东方木运者,最好往东方去而忌西方。

算命术在中国社会拥有极广泛的市场,上至君王贤哲,下至平民百姓均有信奉者。北齐武成帝曾通过他人请星士魏宁为自己算命,魏宁根据所送的生辰八字推算,说:“此人富贵至极,然今年入墓”。武成帝果然死于该年。洪迈的《夷坚志补》记,南宋时,何清源调赴京城,途中在汴河岸边稍作休息,遇一能推三命的术士,于是何清源便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交给术士推算,术士看后,急忙起而施礼说:“君自此始,可官至宰相而封王。”何清源只当他是阿谀骗钱之词,付之一笑。既而一市

井少年亦来问命，将生年月日时交术士推算，术士直言相告：“汝命甚恶，法当死。”少年大怒，对术士大打出手，术士当时殒命，少年也被人执送官府，以杀人罪被斩。这位鲁莽的小伙子虽以拳对术士，大大的不敬，但却反映了他对算命术的深深迷信，以至赔掉了自己的生命。

在许多人迷信算命术，言吉则喜，报凶则忧的同时，也有不少有理性者对之予以分析批驳。《铁围山丛谈》载，鲁公蔡京生于庆历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时。蔡京少时，有算命先生为之论命，说他位极人臣，但时不过三数，后蔡京逢时遇主，受皇帝重用。于是，术士们争谈其命格局之高，实乃其富贵之缘由。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逢丁亥年，东都顺天门内有一家面粉店的郑老板于正月初五亥时喜得一子，推其生辰八字，刚好与蔡京相同，合家欢喜，以为是蔡京第二，有锦绣般前程，故宠爱无比，不事管教，任其成长为浪荡公子一个。结果郑子非但没有官极人臣之命，反而在十八岁那年春天，与玩友们携妓纵马，酗酒游乐，在归途中因马惊奔跑，坠马落水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生辰八字相同而境遇遭际不同，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眼前可见的事实为言，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与国家领导人生辰八字相同的人当不是个别，然有的人能当国家总理，有的人做普通老百姓，其命运何其不同，足见生辰八字五行定命运是不可信的。

《夷坚志补》中曾以事实揭穿了五行推命的骗术，文中说：

临安人孙自虚，好谈阴阳星术，于将军桥瓦市僦屋设卜肆自给。初无奇术，俗谓之“沙卦”是也。最善钩致客言，然后快语。有道士年四十余，来占命。视其颜状，似与岁

数相合。又恐他人假手，先试探之曰：“此是入格好命，若时辰正当，今已通显，未作侍从，亦须持使节，典大藩。如只沾时初，气数尚浅；至于时末，则又迥然不同。且年龄将半百，子息不遂，定飘飘如孤云野鹤，始可安身。更有一说，其人固碌碌，却在公侯将相之前，亦可抗礼，殊非闺阁细民所能及也”。道士谛听首肯，拱手而言曰：“此是贫道贱命，平生不娶，无由有子，栖遁道门二十载矣”。孙曰：“既是尊师庚甲，请毕其愚，不出今年，当随分奋发，在常流中，便居道职。不尔，则就近主持宫观，其应不远，宜早图之”。道士曰：“吾乃平江天庆观朱令然也，适知宫虚席，欲经营住持耳”。孙贺其必获，曰：“如此，则是角音姓人占事，百发百中。吾言不诬。”道士喜谢而去。

这位孙自虚虽无算命推运的真本事，但却善于套求问者的心事，通过对问的观察、探询，然后再下判断，使问者在不知不觉中中其圈套，暴露了自己的心事，被算命师利用，反过来还要称他神奇。其实是拿钱买欺骗，甚无谓也！

算命术是通过人的生辰八字所涵阴阳五行来推算人的命运，建立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紧密联系，但是它们为什么会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加以说明和验证。这种术数将人的一生际遇归结于他出生的时间，否定人后天的努力，培养一种听天由命的堕性情绪，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害的。

## 七、五行与战争术数

五行作为一种神秘的法术，同样也渗透到古代军事战争

中。它利用五方、五色、五牲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来祭祀战神和布置军阵。五行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神秘的威慑力无疑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巨大的心理辅助作用。

将五行作为战争术数用于战争的做法，在墨子那里已露端倪。《墨子·旗帜篇》中说：“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这种分法，实际上已将五行五色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在其《迎敌祠篇》中，这种联系便又更进一步：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  
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  
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白旗，白神长九尺者九。  
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  
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也就是说，当敌人从某方来进攻，便在某方设立祭祀战神的神坛，采用与该方对应的五行成数，颜色和牲畜作为牺牲。这实际上是在开战之前借助五行神力来进行的心理战术。

墨子以鸡、狗、羊、猪四种动物来对应东、南、西、北四方作为战神献牲仪式，其渊源来自于商朝。商人祖先为东夷，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商人迁移中原后，其他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人仍留在东方。鸟中的家畜最典型地莫过于鸡，于是，在商人心中，便将已被人驯养的鸟——鸡，与东方夷人认同。在商人的南方，活动着以犬为图腾的南方氏族如苗、黎等族。在这些南

方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都奉盘瓠为祖先,盘瓠又叫瓠犬,其原型便是狗的形貌,于是商人便以犬来充当代表南方方位和民族的动物符号。在商人的西方居住着羌人,羌人以羊为图腾信仰,于是羊便成为西方方位和民族的象征性编码。商人的北方是以“豕”命名的豕韦部落,北方民族以猪为图腾起源很早,在五千年前的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白玉猪龙的文物,反映了猪图腾向龙图腾过渡的图腾形象。豕韦部落是商人的北方强敌,后被商人吞灭。商人使用猪来代表北方方位和民族。正因为商人将动物与方位和民族建立起联系,故他们在与某方民族作战时,便杀代表该方民族的动物来献牲,其隐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墨子作为商人的后裔,保留了商人的这一习俗,并将商人的五行、五方、五色、五牲的观点进一步发展联贯在一起。

战国年间,按五行方色来布阵的作法已普遍流行,至迟到秦代或秦汉之交时期已流传到匈奴。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率军北伐匈奴,在平城白登被匈奴团团围住,匈奴首领冒顿所布的阵法便是五行阵。《史记·匈奴传》记: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骅骝马。

骅骝即赤马。冒顿用五行阵法来对付汉军,可谓“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邦万般无奈,只得采用陈平之计,说动匈奴阏氏,由匈奴阏氏出面为刘邦说情,冒顿这才解围之一角,于是刘邦令将士手持上满弦的箭面对外,从解围的一角中出,得以生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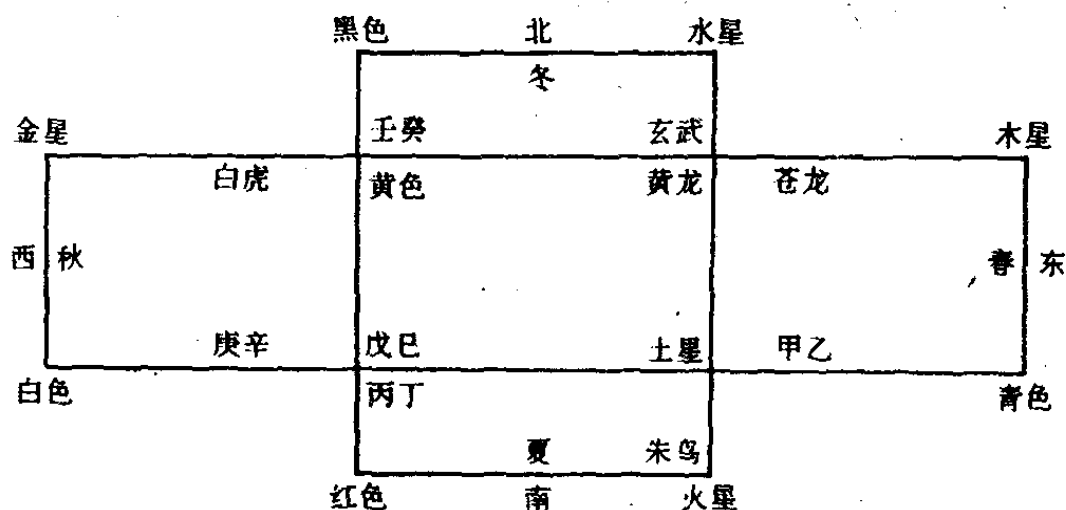
五行阵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影响深远，特别是在描写古代战争场面的小说中，更是屡见迭现。读过《水浒》的人都记得，第八十八回《颜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授玄女法》中，宋江领兵破辽，辽帅兀颜布下混天象阵，宋兵多次攻打，皆损军折将，败下阵来。正在宋江无计可施的危急之际，玄女娘娘遂在宋江梦中授以破阵之法。玄女娘娘曰：

汝知混天象阵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晓其法，望乞娘娘赐教。”玄女娘娘曰：“此阵之法，聚阳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且如前面皂旗军马内设水星，按上界北方五气辰星。你宋兵中，可选大将七员，黄旗黄甲，黄衣黄马，撞破辽兵皂旗七门。续后命猛将一员，身披黄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克水之义也。却以白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左边青旗军阵，此乃金克木之义也。却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右边白旗军阵，此乃火克金之义也。却以皂旗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此乃水克火之义也。却命一枝青旗军马，选将九员，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此乃木克土之义也。再选两枝军马，命一枝绣旗花袍军马，扮作罗喉，独破辽兵太阳军阵。命一枝素旗银甲军马，扮作计都，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二十四部雷车，按二十四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中车。令公孙胜布起风雷天罡正法，径奔入辽主驾前，可行此计，足取全胜。……。

九天玄女娘娘授给宋江的破辽阵法，显然贯穿了五行生克的思想，《水浒》虽然是小说家言，其中不乏故弄玄虚的成分，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战术思想。

再以《说唐三传》为例，该书大部分战争场面的描写都与五行有关。第十五回苏宝同二困锁阳，便是“按下四方五色旗号，排开八卦营盘。”这五色排开，形成“东门青似三春柳，西接旗幡白似银，南首兵丁如火焰，北边盔甲暗层层，中间戊巳黄金色”的壮观景象。

五行阵除了在心理上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外，恐怕其实用价值在于区分各方部队，便于统一指挥调动。那方部队战利或不利，一看颜色趋向便知，这在古代通讯和观察设备落后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如果把五行军阵绘制成图，则是：



很凑巧的是，这个五行阵恰好是甲骨文“行”字的形象，甲骨文“行”为“𠂔”，因此，丁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便认为行字的起源正是“象方阵的𠂔行”，“五行所以为五行者，殆因古代的军阵常以五色旗裳分别为东、西、南、北、中五个行列。”丁山先生的这一说法虽然有些本末倒置，应该是先有五行、五色的观念，然后才有五行阵的产生，然而它也说明五行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很早便已发生。